

[法] 卡特琳·迪朗丹 著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法〕卡特琳·迪朗丹 著

王新连 舒怡 郭庆岚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CATHERINE DURANDIN
NICOLAE CEAUSESCU

Albin Michel 1990

根据法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 1990 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许淑珍

封面设计：孙 敏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法〕卡特琳·迪朗丹 著

王新连 舒 怡 郭庆岚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5 字数：138000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012-0397-0 / K · 76 定价：3.20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齐奥塞斯库领导罗马尼亚长达1/4世纪之久，为维护国家独立作出了贡献。他执政前期，采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加强经济贸易关系等措施，使罗马尼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建树。但是后来他的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逐步暴露出不少严重问题。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剧变，齐奥塞斯库领导的政权数日内即告倾覆，他本人也死于非命。这固然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得手的结果，但在罗马尼亚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与齐奥塞斯库的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发生剧变之后出版的一本新书，作者从政权更迭时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入手，概述了齐奥塞斯库70余年人生旅途的几个重要里程，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研究罗马尼亚剧变的背景材料。为此，我们将这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供内部阅读参考。

本书作者卡特琳·迪朗丹是法国近几年崭露头角的罗马尼亚问题专家，著有《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法国式革命还是俄国式革命》、《一个罗马尼亚女人之死》等书。作者是位资产阶级学者，她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事业和齐奥塞斯库其人的叙述和评价，有不少虚妄之处，这在书中显露得比较明显，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本书第一至第三章由王新连译，第四、五章由舒怡译，第六、七章和结束语由郭庆岚译，全书由王新连统校。

——呼吁投票	61
——大获全胜	64
——安娜·普克案件	67
——执掌国防部	70
——赫鲁晓夫上台	72
——非斯大林化运动	75
——匈牙利的起义	78
——深刻的教训	80
——天伦之乐	84
——同莫斯科摊牌	86
第五章 为国操劳 (1965—1969 年)	89
——德治病危	90
——继承德治之位	93
——跻身于权贵之列	97
——作风革新，教条依旧	100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104
——深入群众	107
——道德秩序常在	110
——翦除异己	112
——知识分子的归顺	114
——与戴高乐合奏	117
——布拉格之春	121
——尼克松的点缀	123
第六章 以进为退的思想家 (1969—1987 年)	127
——埃列娜步步青云	128
——荣耀的美国之行	130
——国际声望日隆	132

——呼吁投票	61
——大获全胜	64
——安娜·普克案件	67
——执掌国防部	70
——赫鲁晓夫上台	72
——非斯大林化运动	75
——匈牙利的起义	78
——深刻的教训	80
——天伦之乐	84
——同莫斯科摊牌	86
第五章 为国操劳 (1965—1969 年)	89
——德治病危	90
——继承德治之位	93
——跻身于权贵之列	97
——作风革新，教条依旧	100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104
——深入群众	107
——道德秩序常在	110
——翦除异己	112
——知识分子的归顺	114
——与戴高乐合奏	117
——布拉格之春	121
——尼克松的点缀	123
第六章 以进为退的思想家 (1969—1987 年)	127
——埃列娜步步青云	128
——荣耀的美国之行	130
——国际声望日隆	132

——亚洲样板	135
——更上一层楼	138
——只有一种哲学，只有一部历史	140
——埃列娜显露头角	143
——良师	145
——标准化	147
——以进为退	149
——同莫斯科和解	152
——地震	154
——罗马尼亚人食量大	157
——一位“共产党国王”	159
第七章 千夫所指（1987—1989年）	163
——齐奥塞斯库老了	164
——向埃列娜致敬	166
——家庭相互保护	169
——学习游击战	171
——摧毁古老的布加勒斯特	173
——布拉索夫事件	176
——好人与坏人	179
——同匈牙利的思想战	182
——铁人	185
——谴责	187
——齐奥塞斯库的一代	189
结束语 一个世纪的悲剧	193

第 一 章

政 变 剖 析

(1989 年)

死刑的宣判¹

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电台宣布判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与他的妻子埃列娜死刑。布加勒斯特电台广播员欢呼：“多好的消息啊！伪基督死亡、真基督诞生的日子到了。”长达一周的起义以君王的殒灭而告终。

12月26日至27日夜間，疲惫、惶恐，最后总算松了一口气的罗马尼亚人从电视中收看了审判他们的总统及其妻子的实况录像。在此之前，电视台已经向仍然怀疑的人民宣称，它将把审判与行刑的有关资料公诸于世。录像摄制得很随便，布景也过于简单。失势的总统与妻子坐在一张课桌式的小桌后面。尼古拉把臂肘撑在桌面上，埃列娜则放下了她的小手包。这缺少隆重仪式的场面令电视观众惊诧不已，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总统的排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显得疲惫不堪，大概觉得冷，所以还穿着大衣，系着头巾。齐奥塞斯库流露出儿许萎靡，脸也没刮，头发蓬乱。但他看起来无病无灾，炯炯的目光里满含嘲笑。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他对自己的失败表述得十分清楚：他遭到了挑衅与政变。

观众在电视荧屏上看不到法庭，他们只能听到对齐奥塞斯库的指控：“25年来，你一直在羞辱人民。25年来，你只说不做。”

他们听见齐奥塞斯库回答：“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大国民议会。这是一次政变。”

¹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指控的声音继续：“到今天为止，全国各地已有 6.4 万人被杀害。你把人民引向了贫困……”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反驳：“这是挑衅。”

指控的声音强调：“什么原因妨碍你回答？”

齐奥塞斯库重申：“我只回答大国民议会与工人阶级。我只承认工人阶级。在政变者面前，我永远不会回答……全国上下没人承认你们。正因为如此，人民至今还在战斗。”

齐奥塞斯库认为自己无罪。当指控问：“是谁下令向布加勒斯特的群众开枪，甚至现在还在向无辜的人们开枪？谁那么热衷于开枪？”他回答说，没有人向王宫广场开枪，也没有人被杀死。

然而，他们死了。12月28日，罗马尼亚青年的报纸《自由青年》向死难者致意：“牺牲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了。你留在我们心中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形象，你那热血沸腾的躯体弹痕累累，只有一面旗帜护卫着你……”然而，他们死了。死难者家属在《自由罗马尼亚》报刊登死难者的照片，呼吁公众予以哀悼。他们是12月21日至23日在布加勒斯特牺牲的。阿德里亚·丹·乌卢库，在电视转播台；米库·欧仁、彼特·阿斯塔非、米尔恰·德拉戈米雷斯库、科尔奈勒·兰布卢、安娜·吉达纳克、维克多·斯特法诺夫，以及其他的人……他们是在暴乱的那些日子里被杀害的。从革命中诞生的新政权以简朴的方式向公众介绍并高度地评价了他们。这是一场自发的革命。它源于距匈牙利边界 80 公里的蒂米什瓦拉市。在那里，发生了声援匈牙利牧师拉兹罗·托科斯的群众运动。当时，牧师面临被驱逐出城的威胁。12月16日，牧师受到了 5000 名群众的支持。12月17日，事态扩大，蒂米什瓦拉市 10 万人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占领了

该市党部大楼，焚烧了所有书店里的齐奥塞斯库著作，撕毁了他的巨幅画像。暴乱又蔓延到附近的城市，如阿拉德市以及1987年曾发生过抗议运动的城市，如布拉索夫市。12月19日至20日，终于波及气氛已经十分紧张的布加勒斯特。

革命犹如一场熊熊烈火。年轻的大学生、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工人乃至少数民族，所有被压迫者，为结束独裁而聚集在一起。革命是暴风骤雨。从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反对派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军人——勇敢地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组织群众与那些依然为维护独裁而负隅顽抗的一伙进行斗争。随后，他们又号召人们为建立新的制度自由地进行公民投票。1848年法国革命的模式被承认并重新出现。

这一切进行得是那么戏剧化，又那么奇妙地宣告结束了。

12月22日，电台被布加勒斯特起义者控制，成为《革命之声》。11时50分，宣布罗马尼亚处于紧急状态，群众占领了齐奥塞斯库的总统府。13时05分，持不同政见的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在罗马尼亚电台宣布齐奥塞斯库出逃。

救国阵线委员会掌握了政权，电台与电视台被起义者控制，新的面孔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扬·伊利埃斯库、多伊娜·科尔内亚、安娜·布兰迪亚纳、米尔恰·迪内斯库、拉兹罗·托科斯、科尔内留·曼内斯库、杜米特鲁·马济鲁、格鲁·沃坎……其他面孔也很快地出现了，希尔维乌·布鲁坎、彼得·罗曼……

15时30分，形势突变。电台宣布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与埃列娜在距布加勒斯特70公里处被抓获。这对夫妇的儿子尼库于16时10分在锡比乌市被捕。最后，在蒂米什瓦

拉，人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万人坑，那里弃尸达 4360 具之多；有一个图像曾反复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一具衣服被剥光的妇女尸体，她满身泥土，腹部还躺着个死了的孩子。新闻界竞相报道了这一惨不忍睹的场面。法国各报都刊登了这类惨不忍睹的照片。真的太惨了。新闻报道清晰明了，人们的悬念得到了正确引导，解释性的图表也颇具说服力。敌对一方，总统与他的妻子及其追随者受到了他的私人警卫部队、内政部（安全部）所属部队的保卫。另一方是与人民友好的爱国部队。孩子们爬到他们在市中心的坦克上便是这一友谊的象征。在革命的一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为自由而战，他们在安全部打手们的自动武器的疯狂扫射下前仆后继。安全部的人按照不可告人的计划，或卑鄙地埋伏在暗处，或突然出现在群众面前。

头版头条上的流血事件

悲剧性的报道。充斥报纸与电台的最新消息令人毛骨悚然。在被称为烈士城的蒂米什瓦拉，据东德意志通讯社报道，12月20日死亡人数达 3000 至 4000 人。士兵们向孩子、妇女甚至孕妇开枪。据说，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因拒绝向市民开枪而被枪毙。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在同一天，30 多名孩子在大教堂前被罗马尼亚警察射杀，当时孩子们正手捧蜡烛，祈求面包、自由与人权。还有一幕可怕的情景，这完全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一手导演的：一辆冷藏大卡车满载游行示威者的尸体连夜开向布加勒斯特，以便将尸体秘密火化。报纸上那淋漓尽致的描绘令人不寒而栗。人们

传说，在蒂米什瓦拉市，父母们因子女失踪而焦虑不安，于是便在城郊挖掘公墓，在尸体堆中寻找辨认自己的亲人。死人、鲜血、万人坑、陈尸所，太可怕了！在布加勒斯特，氛围同样凄楚。12月21日，这个大都会里发生了血腥的屠杀。据苏联塔斯社与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的报道，安全部的武装部队向聚集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游行队伍开了枪，因为示威者们高喊反对其领导人的口号：“要自由”、“打倒独裁”、“支持蒂米什瓦拉”等。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一些目击者说：“有很多人受伤，可能还有些人死亡”……头版上的流血事件！新闻界迅速报道。

暴动的第一阶段结束了。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与他的妻子乘飞机逃跑了，他们掠过这座城市里最现代化的、云集着世界各国记者的洲际饭店。他们在群众的嘘声中飞向蓝天，群众嘲笑他们的怯懦。

然而，紧张的形势并未缓解，第二个行动开始了。这是一场确保救国阵线掌权并惩治齐奥塞斯库与其妻子的革命战争。齐奥塞斯库夫妇失踪后又很快被找到了。救国阵线的政治地位迅速确立。旨在粉碎齐奥塞斯库制度的意向性声明与第一批施政纲领相继问世。12月28日，《自由青年》一篇报道的标题是：《齐奥塞斯库死了，他那令人厌恶的法律也失效了》。

事态迅速发展。星期六，23日中午，电视台宣称首都的战斗在继续。前内政部长被捕，他呼吁部下官兵停止荒唐的抵抗。晚上，宣布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的消息。他们在一个军营被看管起来。在哪里？

12月24日，救国阵线头号人物扬·伊利埃斯库——人们很快获悉他可能亲戈尔巴乔夫——宣告革命已经取得胜

利。人们相信他。战斗在继续。伊利埃斯库拒绝透露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监禁的确切地点。革命在发展。悲剧再度掀起高潮。12月24日，伊利埃斯库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曾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场自发运动，因而缺少经验。旧的国家机器的反抗是严酷的。”记者提到了某些外国人在罗马尼亚国家全部武装部队参战、这次革命的伤亡人数、齐奥塞斯库被监禁的地点等问题，伊利埃斯库拒绝回答。这使形势又笼罩了一层疑惑、朦胧与神秘的气氛。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正如伊利埃斯库宣称的那样，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不复存在了。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至于蒂米什瓦拉，一位法国记者说，这座“烈士城”成了种种传闻的发源地。胜利了的革命要求为群众办实事，以便平息不安情绪并防范暴力事件的重演。新政权已下定决心：被新闻界称为“七头隼”的齐奥塞斯库不能再伤人了，处死他！

12月25日，星期一，差几分钟21点，电视台宣布：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与他的妻子死刑。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被突然荡涤殆尽。两位领导人被枪决，财产充公。罗马尼亚没有时间设立纽伦堡式法庭，但特别军事法庭所起的作用却没有两样。电视荧屏上映出了齐奥塞斯库与他妻子的尸体。他们面部已经肿胀，埃列娜额头中了弹。一位评论员证实这两具骇人的尸体确实是他们夫妇。与此同时，革命者组织起来。救国阵线委员会根据它自己确定的程序任命了首批政府成员：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副总统杜米特鲁·马济鲁；总理彼得·罗曼；国防部长米利塔鲁将军。后者代替了前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米列亚于12月22日因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而自杀或被杀害了。在他的

故乡，瓦西里·米列亚被隆重安葬。代替罗马尼亚官方报纸《火花报》的《曲折报》1989年12月31日高度评价了他。米列亚被称为“伟大的英雄”。这是军队的荣誉。

对齐奥塞斯库迅雷不及掩耳的处决震动了某些墨守常规的人。但罗马尼亚新政府欣然表示，它要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对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处决属于战争行动。他们的主要罪行归纳为：

血腥屠杀6万余人。

通过对人民与国家政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手段建立中央集权。

损坏公共财物。

破坏国民经济。

企图逃亡并非法卷走在外国银行的10亿多美元存款。

总理彼得·罗曼就新政府所选择的处置齐奥塞斯库的方式阐明了原因。他说：“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不稳定，不允许我们再等待，因为有压力。我们获得情报，齐奥塞斯库住地可能受到攻击。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他们的镇压机器规模多么宏大，装备多么精良。”

所以，1989年12月30日，被人们称为新政权军师的希尔维乌·布鲁坎才会向《解放报》宣布：“一句话，共产党垮台了。”1989年结束了，齐奥塞斯库死了，他的党也不复存在了。安全部的武装部队被解散，其职权并入国防部。12月31日，在接见《曲折报》记者时，彼得·罗曼呼吁把协调一致作为实现民主的第一步。同一天，新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为恢复正常秩序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如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

总之，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这场革命的一幕幕情景在

人们心目中树立了尊崇斗争以及必须周密地发动群众的观念。有这样一幕：在布加勒斯特某公园的一个公墓，一个大学生躺在一个敞开的棺材里，他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儿子那柔软的头发。

总之，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前总统悄然无声地死了。不管如何评价他，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齐奥塞斯库如是说

12月17日、20日及21日，齐奥塞斯库连续3次解释了他对罗马尼亚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政变。他指出了政变的策划者与煽动者。他还猜测并指出了同谋者。20日与21日人们直接收看的两次电视讲话旨在动员罗马尼亚人民，齐奥塞斯库企图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原本保密的17日的讲话后来也播放了。

齐奥塞斯库12月17日的讲话措辞相当严厉。1990年1月10日，颇具独立性的《自由罗马尼亚》报全文刊登了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会议的速记记录。这次会议是齐奥塞斯库紧急召开的，旨在讨论蒂米什瓦拉事态的发展与当前形势。《新观察家》^①1990年1月11日至17日以《齐奥塞斯库最后的愤怒》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为了充实上述新闻报道，与会者之一保尔·尼古列斯库·米齐尔于1990年1月16日向《自由罗马尼亚》报写信，提供了新的更确切的情况。保尔·尼古列斯库·米齐尔证实，这次会议秩序相当混

^① 《新观察家》，法国一家有影响的周刊，创办于1950年。——译者

乱，与会者情绪激烈。齐奥塞斯库惊慌失措，暴跳如雷，以至于用辞职相威胁。他站起身，收拾起文件，佯作离去状。当时不少与会者赶忙拦住他，恳求他留下来。于是，会议进入第二阶段：齐奥塞斯库控制住了会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争吵？齐奥塞斯库指责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与内政部长图多尔·波斯特尔尼库在蒂米什瓦拉市失职。首先，他叙述了事情的由来：“在蒂米什瓦拉发生的事件直至今天中午仍在发展。起因是一个被教会处分的所谓‘新教牧师’。他被调离蒂米什瓦拉，去另一个州。他应该从他原来住的房子搬走，但他拒不腾房。于是主教向法庭起诉，法庭判他搬家……他便组织了一伙人闹事。”齐奥塞斯库随之得出了以下结论：“这是从布达佩斯开始的、由外国人与间谍混合组成的俱乐部，因为他（牧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人都说罗马尼亚的事情要改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东、西方的人们决定改变罗马尼亚的事情，并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齐奥塞斯库的根据是：如果东、西方都千方百计地动摇他的统治，如果内政与国防两位部长都不采取有力手段进行反击，那么其中必有阴谋。

据保尔·尼古列斯库·米齐尔证实，齐奥塞斯库在会议过程中寻找罪魁祸首。他确信叛徒就在会场。他轮番讯问瓦西里·米列亚与波斯特尔尼库，怒火中烧。他从他们的回答中得出了结论：他们的部队虽然自东向西，即向蒂米什瓦拉方向移动，但并未进入该市中心。齐奥塞斯库咆哮起来：“军队应当到市中心占领阵地，这是我事先的命令。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了。”他接着说：“我的印象是内政部的队伍以前没有武器。”埃列娜火上浇油：“他们确实没有武器。”波

斯特尔尼库承认：“除了边防部队外，其余的都没武装起来。”齐奥塞斯库怒不可遏，他呵叱米列亚：“你的军官干什么了？米列亚！他们为什么不立即干预？他们应该开枪！应该把那些人打倒！先向他们鸣枪警告，然后朝腿上开枪！”

会议即将结束。齐奥塞斯库就震撼东欧的事件进行了总结。他的讲话与希尔维乌·布鲁坎讲的完全相悖。布鲁坎认为，罗马尼亚的形势以及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方式与东欧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毫无共同之处。齐奥塞斯库则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目前处于战斗状态。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事情与在波兰、匈牙利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样，都是苏联一手制造的，是它在美国与西方的援助下策划的。”齐奥塞斯库一字一句地说：“最近在这三个国家发生的都是政变，都是在社会渣滓与外国人援助下组织的政变。”

1968年故技重演

齐奥塞斯库已是忍无可忍，但他还没有决定进行反击。1968年，苏联人对杜布切克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诉诸武力。当时，齐奥塞斯库未雨绸缪：为了维护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立性，他把象征着民权的大国民议会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果赢得了布加勒斯特群众的热烈拥戴。20年以后，他打算故技重演。12月17日，他说：“我们必定会摆脱目前的处境。1968年我们曾遇到过类似情况，但现在比那时更糟，因为他们在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在欺骗人民。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这就是事实。”

齐奥塞斯库 12 月 17 日的讲话使人如堕烟海。倘若说军队不在蒂米什瓦拉，倘若说安全部队没有武器，那么，为什么匈牙利电台 12 月 16 日星期六会说罗马尼亚士兵用刺刀对付群众，并动用了作战坦克与直升机？然而，齐奥塞斯库 16 日至 17 日的愤怒恰恰是因为军队还没有进驻蒂米什瓦拉、安全部队没有武器一事引发的。对同一事件如此矛盾的看法实在令人惊讶。这是出于恐惧，还是有意使形势激化，使其更具爆炸性？它至今仍然是个谜。

听了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人们会更加理解救国阵线领导人过分的谨小慎微。新政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说明这次革命运动是自发的。正如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军事法庭上那样，人们在思忖指控大屠杀的重要性和在蒂米什瓦拉事件中死亡 6 万人这一数字的可信性。人们发现，救国阵线在维护 12 月 16 日至 25 日发生的伟大革命一说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维持秩序，使形势恢复正常。希尔维乌·布鲁坎宣称罗马尼亚共产党结束了，难道不是告诉人们：革命到此结束，无需再继续下去了吗？

齐奥塞斯库认为这是一次政变，也许不无道理，但他错在 1989 年重演 1968 年的故技。他讲过两次话。1989 年 12 月 20 日，他身体僵直地站着，声音嘶哑，在电视荧屏上大喊大叫足足 25 分钟：“面对当前万分严重的形势，我们应该行动起来……调动一切力量，以维护罗马尼亚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但没人听他的，他心里自然清楚。正因为如此，他才命令冷酷无情地去镇压，他的儿子尼库当时在锡比乌市任第一书记，他说：“从现在起，我们进入战争状态，不再是临战状态……军队、安全部、地方武装、警察，无条件地行动起来！按你们熟悉的方式去占领你们的阵地。你们

可以随时开枪，无需警告。”

实际上，齐奥塞斯库一伙的行动导致了一场内战。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打出了他最有力的一张王牌——至少他自以为如此。他的弟弟伊利耶匆匆赶到蒂米什瓦拉，而他自己则让人在电台播放爱国歌曲以及一些会议上支持他的发言。其实那些支持他的会议都是特意召开的。随后，齐奥塞斯库来到了共和国广场。他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埃列娜站在他背后。群众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但现在已经不是1968年了。齐奥塞斯库姿势僵硬，声音嘶哑。他一面作手势，一面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身着一件深色大衣，显得耸肩缩颈。电视台在录像，电台在录音。突然，最高统帅举起胳膊，可又不知该如何是好。短暂的等待，因为广场深处响起了敌对的喊声。“打倒齐奥塞斯库！”，“蒂米什瓦拉！”。这反抗的呼声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埃列娜小声提醒：“说啊，快说。”齐奥塞斯库尖声尖气地接着说下去。他宣布增加工资，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

布加勒斯特在动荡。对齐奥塞斯库而言，大势已去。他的讲话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了。12月22日，面对倒向群众的军队——如同在蒂米什瓦拉那样，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出逃。他的小直升机嗡嗡作响地飞上了蓝天。然而对他们的追捕也从此开始了。

电视荧屏上映出了齐奥塞斯库的尸体，太阳穴下面的血迹已干。然后是埃列娜的尸体。是他。是她。对他们死亡的一系列报道非常成功。这一工作是在副总理杰鲁·沃坎的领导下进行的。

12月25日15点，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判处死刑。法庭进行了磋商。诉讼持续约三小时。律师问他们最后有什么遗

愿，“没有”，他们一个个回答着。站起来时，齐奥塞斯库向法庭吼叫道：“历史会为我们申冤。”他们离开了审判大厅。大厅里很冷。留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张埃列娜放手包的小桌子，还有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召集在一起的法庭全体人员以及局促不安的电视摄像师。

埃列娜太紧张了，尼古拉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以使她平静下来。而他自己则是一副蔑视一切的神态。他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不是人民。他宣称：“我不是在押犯，我是罗马尼亚总统，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要在大国民议会面前回答。”

应该组织个行刑队。但沃坎没有足够的时间。管它呢，人民要复仇，如饥似渴。兵营的士兵们都打出了一梭子子弹，硝烟浓重得无法录像，瓦康解释说。

齐奥塞斯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历史上消失了。他和埃列娜在血腥与嘲讽的喧嚣中离开了人生舞台。对齐奥塞斯库来说，没有纽伦堡。

这结局，对这个共产党人的一生来说，是多么地一反常情。他相信革命，然而却在政变与人民起义的双重袭击下倒台。一反常情，还在于他以号召人民革命而离开历史舞台。人民为革命而起来，但这种革命却不是齐奥塞斯库的那种革命。

被《自由罗马尼亚》报称为“七头隼”的齐奥塞斯库把革命双手奉献给了他的审判官与新政权。

第二章

造反的农民

(1918—1939年)

童 年^①

1918年1月26日，在斯科尼切斯蒂村——罗马尼亚奥尔特河谷一个颇具规模的村子里，一个男婴诞生了，取名尼古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厚厚的一层积雪覆盖着广袤的大地，白茫茫、静悄悄，呈现一片单调色彩。整个农村笼罩在一片凄凉之中。只有酷爱田园风光的人，才能从中领略到它的魅力。村子里，齐奥塞斯库一家的房子是一座长方形的木屋，它像毗邻的房舍一样，挡雨披檐上也攀附着纵横交错的葡萄藤，并被大雪覆盖了。房子装饰简朴，但不寒酸；他们日子过得清贫，但并未衣不蔽体。齐奥塞斯库一家子女众多：七个男孩，三个女孩，尼古拉在男孩中排行第三。

这种类型的家庭在20年代的罗马尼亚比比皆是。因为，罗马尼亚这时进入人口增长的高峰期，而在几年之前，由于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很高，成年人也常常早逝。齐奥塞斯库一家没发生悲剧，孩子们都侥幸地活过来了。可是孩子们的父亲仅拥有3公顷土地，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显然是不够的。他属于人口众多、拥有10公顷土地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范畴。这些人常常提心吊胆，有时不得不长期借债。那时农业贷款还不发达，于是高利贷者乘机盘剥。一些民粹主义者以及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界、思想界人士虽然不断地揭露他们，但仍无济于事。尼古拉的父亲也像别家的父亲一样：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孩子稍大一些，便让他们给富农或被称为富翁的大地主放牧牛羊。那些富翁，人们几乎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住在布加勒斯特，只有狩猎期和夏天回来几个星期。他们通常住在黑海边康斯坦察市的旅馆或别墅里，以便避开布加勒斯特或奥尔特尼亚平原的酷热。农民与富翁们几乎互不相识。

尼古拉的两个哥哥务农，尼古拉自己也没逃脱这类工作。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官方传奇着意宣扬总统，说尼古拉曾为之服务的富翁当年就发现这个孩子聪颖异常，说少年尼古拉少言寡语，十分安静。他只默默地察言观色，从不多说话。似乎从孩提时代起，尼古拉便无可指责。当时他不过是觉得希望渺茫、日子单调而已。尼古拉的双亲安分守己，不善冒险。他父亲性情温顺，母亲虔诚善良。每个人都按着春夏秋冬的自然节奏和日历上注明的宗教节日年复一年地过日子。

斯科尼切斯蒂是一个古老的村子，它孕育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并以它古老的根而自豪。很久以前，流浪的茨冈人曾路过这里，用大篷车将他们脏兮兮的孩子和那些吵吵嚷嚷、勇敢泼辣的女人们推往别处。村民们都独善其身。他们居住在沙石路旁一幢幢带有小花园的木屋里。齐奥塞斯库一家像邻居们一样，也是受人尊敬的人家。孩子们都能自立了。大女儿尼古丽娜在工厂做工；二女儿埃列娜当教员；小女儿玛丽亚是布加勒斯特一个工厂的职员。她们也像兄弟们——弗洛里亚、马林、扬、伊利耶、尼古拉和安德鲁塔一样，一个个地离开了土地。大概是出于必需，也出于情趣，他们选择了社会地位更高的生活道路。

如果说齐奥塞斯库一家的孩子们出身小农家庭，而非名门望族，那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当时缺少在农村发展的手段

而不得不涌向城市。许多年轻的农民都走了这条路。在他们看来，城市似乎既为沉沦设置陷阱，也为发迹提供机遇。它是两者的混合物。因为，当时显得停滞不前的农村，正受到矿山与石油工业的推动与影响。正是这些工业向人民提供了就业与冒险的机会。所谓冒险，就是石油的开发和战后随之而来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外国资本的入侵。他们代替了1914年战前垄断罗马尼亚经济命脉的德国人。

东正教神甫与小学教员的论战

对斯科尼切斯蒂村农民来说，这种冒险无疑是遥远的事，然而它又是现实存在的。他们的东正教神甫无不正确地揭露了金钱称雄与石油巨头出现所带来的种种混乱。这些狂妄的外国人，异教徒，很快便打乱了他们传统的生活秩序。他们听人议论港口新城康斯坦察，它是按照1914年逝去的国王卡罗尔一世的意愿修建的。他想在黑海之滨建一座石油新港，以便打开罗马尼亚的海上大门。“过分的骄傲”，神甫这样评论道，“它将把国家引向毁灭。康斯坦察居住着很多外国人：希腊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已经在这儿修建了清真寺的穆斯林。这座城市本身甚至就是堕落的象征。”神甫的这些话引起了小学教师的反对。后者为这一进步而兴高采烈，他认为罗马尼亚人民在发展：他们只要占据首都就够了。尼古拉悉心注视着这一论战，就像斯科尼切斯蒂村牧场边界之外出现了一个新世界，轮到他亲自去发现的新世界。因为，在斯科尼切斯蒂村，未来的路被阻塞了。小伙子不能忍受父辈们饱尝的失望与幻灭之苦。他感到自尊受到

伤害，心内愤愤不平。“这就是生活。”母亲说，“这就是系于一线的生活。”然而，作为儿子的尼古拉不接受这句谚语。

20年代初期，两件异想天开的大事震荡了整个罗马尼亚。这是两次很快便夭折了的改革试探。一次是土地改革，一次是修订选举法。而后者比前者更朦胧，更无法指望。土地改革是罗马尼亚第一位国王卡罗尔一世的继承者费尔迪南国王应一次紧急请求而许下的诺言。当时每个人都被1907年扎克雷农民大起义留下的记忆所烦扰。这次起义造成的死亡人数不亚于1878年为反抗土耳其人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在斯科尼切斯蒂村，人们对这次战争也记忆犹新。关于1907年事件的种种残酷描述并没使年轻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无动于衷。奥尔特县以“我们要土地”而进行了群众动员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军队被调来镇压农民，他们在拉多米列斯蒂、斯托伊卡内斯蒂……留下上千具尸体后扬长而去。后来这些尸体被草草地埋在一个墓穴里。人们都还记得，富翁们高大的白色房屋，还有距村子几公里远的谷仓，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必须重建邻近村子的那些高大房屋的罗马式廊柱并粉刷整个宅邸。神甫一直强调指出，斯科尼切斯蒂人对此不承担责任。在别的地方，在摩尔达维亚，这一切又开始了，斯图尔扎¹⁾的大片房地产是作为地租交给一个犹太承包人的。农民运动很快扩展开来，“那是城里来的人搞的。”神甫这么说。“那些双手洁白细嫩的人不是农民，而是鼓吹社会主义的人。”神甫知道，社会主义者是要消灭私有制的。1907年，小学教师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有人指控他也是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他害怕了。

1) 斯图尔扎是罗马尼亚自由党的头目。——译者

1907年的事件导致了所有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保守党人、民粹党人）为维持秩序而团结一致，而在几乎波及罗马尼亚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推动下，费尔迪南国王于1917年许诺采取激进措施：重新审查农业契约，控制地租数额。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农民们企盼土地的热切愿望……必须大刀阔斧才能解决问题。战争结束了，革命在邻近的俄国生了根。罗马尼亚士兵疲惫不堪地从前线撤回来。1917年与1918年两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使他们精疲力竭了。罗马尼亚政府开始落实1917年的计划。政府首脑阿维雷斯库将军采取了具体措施。他是个深孚众望的人物。也许是命运的嘲弄，他曾是1907年农民大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知道怎样在战争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赏识与爱戴。人们相信他，寄希望于他。那些在喀尔巴阡山前线与他并肩战斗的俄国同僚们，直到离开战场返回故里时还一直在忌妒他。而他们的罗马尼亚同僚知道了大部分俄国农民将获得土地，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获此好运。

时运来了。阿维雷斯库将军行动起来，经过一番斡旋，他通过法令完善了原有的一系列法律措施。600多万公顷土地被征用。这些土地原属于王室、外国人或土地超过法定最高限量的人。法定最高拥有量为100公顷可耕地，500多公顷无法耕种的草原。这部分土地按1914年的地租进行估价。被征用土地的人将在40年内分期得到地价5%的赔偿金。分到土地的农民则必须在20年内偿清土地债务。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实际上农村没发生任何变化。两种弊端：农民负债与土地分散依然存在。土地总是养不了一家老小，农村贷款制度也还不适应形势发展。厄运，齐奥塞斯库的母亲说，孩子们太多了，尽管是上帝赐予的。还是厄运，

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依然存在，他们使不少可怜的农民破了产。尼古拉经常听到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对话。在斯科尼切斯蒂村，除了1917年和1918年公墓里增加了一些新的木制十字架，除了在送葬的日子里，人们悲哀地陈述这些灾难外，其它一如既往。年轻的齐奥塞斯库对这些不幸与悲哀感到厌倦。在斯科尼切斯蒂村，历史的车轮似乎停止不前了。

村里的气氛每4年活跃一次，即议会选举的时候。但活跃中缺少欢快，因为人们总是担心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打手来到村子里。从理论上讲，由于把大多数农民排挤在外的纳税选举制已于1919年取消，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此时，属于战胜国法、美、英一方的罗马尼亚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政治模式，确定了议会立宪制。新的政党增多了，而进行了错误选择的保守党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个党力主罗马尼亚忠于卡罗尔一世国王与柏林和维也纳1883年的结盟。该党瓦解后，其成员又参加到别的政治组织中。自由党人遭到人们的白眼，因为在维也纳和平谈判中，他们从大国那里所获甚微。1919年有段时间不堪回首，自由党人为未能赢得的和平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于共产党人，人们说他们受控于莫斯科，不过是“外国的代理人而已”。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中间力量：农民民主党与特兰西瓦尼亚^①民族党。后者由于略通奥匈帝国议会与布达佩斯议会的奥秘，习惯于耍政治手腕。1918年，特兰西瓦尼亚刚刚归属罗马尼亚王国，该党便为夺取大罗马尼亚选举权而四处活动。1926年，这两个组织，即农民民主党与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党联合并协调行动，为1928年的大选做准备。

^①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西北部地区。——译者

寻求强人

尼古拉当时 10 岁。在斯科尼切斯蒂村小学校里，教员经常评论时事。年轻的齐奥塞斯库由此而得知，自由党人是资产阶级、资本家、爱撒谎的人。他们高谈自由与进步，实际却控制着银行并在幕后操纵。他还得知，马尼乌——民族农民党的新领袖有一些宏伟的计划：帮助农村、发展人民银行网络、支持学校、对全民实行义务教育。小学校的教员政治上十分活跃。当然，马尼乌是特兰西瓦尼亚人。不能相信在奥匈帝国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人。这些人自视高贵，看不起摩尔多瓦——瓦拉几亚^①古老王国里的穷苦人。此外，马尼乌还是个合并教会^②教徒，也就是说，他承认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人们不禁要问：罗马有什么权力敢通过这些天主教徒对罗马尼亚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这些天主教徒一面从属于梵蒂冈，一面遵循着东正教的教会仪式。不过，马尼乌却真心实意地喜欢农民：他穿着白罩衫去议会，对着城市服装和目空一切的资产阶级，不是表示出不信任态度吗？其次，自 1927 年费尔迪南国王去世后，罗马尼亚迫切需要一个强人来统治。他的儿子卡罗尔二世宁可放弃与其合法妻子的共同生活而选择了流亡生涯。他要庇护自己的情妇，一个犹太女人，卢帕斯库夫人。以卡罗尔二世之子小米歇尔名义统治罗马尼亚的摄政者软弱无能。马尼乌可能正是罗马尼亚

①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地区。——译者

② 合并教会，指改信天主教，但仍保持自己仪式的东正教教会。——译者

非常需要的铁腕人物。在齐奥塞斯库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缄口不语。必须提防着可能会诽谤的邻居们。人们等待着对这次选举的指导：让神甫先把他自己的意见公诸于世吧。谨慎是压倒一切的，尤其因为这些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先生们从未带来过好运。齐奥塞斯库对于他不得不依存的周围的一切感到羞耻：母亲的沉默、父亲的弦外之音、村民们为避免当局找麻烦而发表的违心之言，还有关于一个所谓坏女孩的种种流言蜚语。因此，当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布加勒斯特去学手艺时，他暗自欣喜。离乡背井，到了城市却又眷恋故土，曾一度是一次大战后及两次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学的主要题材。然而，尼古拉不同，他没有眼泪，没有哀伤地走了。他不喜欢村子里平庸的生活，他对为别人放牧牛羊，对日复一日目不暇接的单调生活早已厌倦。

他喜欢的是姐姐常带他去的舞会。他喜欢看男人、女人们在村里广场上围成圆圈，看他们的手臂随韵律而舒展，脚步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那五彩缤纷的服装，那袖子宽松的雪白雪白的罩衣、红红绿绿的绣花裙子，简直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他太小，人家说他还不能到圈子里。舞场对他是禁区，他必须和孩子们一起呆在外围，在老人们身旁席地而坐。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边欣赏，一边津津有味地评论，甚至忘情地微笑着。然而，村子里没有让人高兴的事。马尼乌和他的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获胜。但1929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罗马尼亚。农产品价格疲软。不愿减少收入的大地主们要求农民增加生产。他们告诉农民必须多卖粮食，因为价格下跌了。怨声载道，谣言四起。有人说卡罗尔国王为扭转局势已从流亡地返回罗马尼亚并重用马尼乌。而后者则逼迫他与其合法妻子重归于好。人们还谈论政变。

一群年轻人在村子里号召革命，使村民们惶恐不安。他们说的革命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罗马尼亚将向何处去。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议员们腐败了，他们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了。

去布加勒斯特

年轻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去布加勒斯特找工作了。那是 30 年代初，他几乎没有理论修养。除了有限的几年小学外，他既没受到文化知识教育，也没受到什么政治训练。他来到了首都，照他以前所读过的、听说过的想象，这是一座充满社会斗争、罢工、游行的城市。的确，这儿经常可以看到游行队伍；左派人士与军团右翼运动的青年信徒之间也不时地发生纠葛、争斗。如果说，齐奥塞斯库对这样的一座城市保持缄默，那是因为它使他反感。布加勒斯特受到外国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既富有又贫穷。富，指它模仿西方的消费方式，亦步亦趋；穷，指它混乱而肮脏，使得刚刚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深感不快。在这座拥有 30 万人口的熙熙攘攘的城市里，贫富两极分化一目了然：一方面，几条主要的大街笔直而宽阔，两旁耸立着 19 世纪末的宏伟建筑和风格怪异的镶有仿大理石装饰的私人宅第，胜利大街街口广场上的国家剧院上演着使尼古拉厌恶的资产阶级法语剧，而王宫则被一位有外国血统的国王卡罗尔二世占据着；另一方面，有不啻一处的贫民窟、色彩暗淡的市郊、成片的简屋陋室，街道两旁拥挤着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与茨冈人开设的庭院破败的小铺子，他们的女人无所顾忌地把那些蓬头垢面、衣

着不整的孩子们放到外面奔跑喧嚣。

在胜利大街上漫步，你可以驻足有名的内斯托尔果品店，品一杯土耳其咖啡，尝几口东方式的甜点心或者一大块像在布达佩斯或维也纳才能找到的那种烤土豆饼。你可以去军事科学院附近的卡普萨餐馆，就着苏打水吃鲑鱼，喝白葡萄酒，或者坐在贵夫人中间啜茶，这些夫人们裹着剪裁合体的毛皮大衣。她们那些裁缝的珍贵地址可是私下里传递的。这个赋闲阶层，这个与昙花一现的石油巨头、无足轻重但口袋里有点钱的军人们打交道的有产阶层，对年轻的齐奥塞斯库来说，简直无法容忍。而齐奥塞斯库与之来往的那些女人大都腿脚粗壮，步履沉重，穿高跟鞋时行动笨拙。他的朋友们与他一样出身农民，身材结实，紧紧裹着大拍卖时廉价购来的服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布加勒斯特这种懒散、嘈杂的情景，对富人们附庸风雅、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以及这个群体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种种表现十分厌恶。凭直觉，他发现这个原本上气的阶层在白翎布加勒斯特是小巴黎，说它隐含着诱惑力，或者——其实是由于无力同西方竞争——具有典型的东方美。这个阶层的奢侈、豪华如同卡罗尔二世的王宫落成仪式一样，使他怒火中烧。保罗·莫朗，一个被引荐进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异常憎恶的宫廷的法国观察家曾经写道：“60年来，王宫与布加勒斯特一道长大。去年12月我来时它竣工了，1935年1月1日，它受到了教会方面的传统祝福。我参加了它的落成仪式。这是献给国王的多么好的礼物啊！这全新的宫殿是新年馈赠。那闪光的台阶，那辉煌的天花板！这等于同时献给国王一个五彩盒，一座舞台，一堆玩具，一组积木……”

那么，齐奥塞斯库与布加勒斯特有什么接触与联系吗？他

还没接触到共产党人。1924年以来，共产党的活动是被禁止的。它的某些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秘密活动，而且与农民没有联系。当时的左派政党，民族农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把赌注押在平等这张王牌上，在民主政体确定的法制范围内寻求平等。1928年，左派民族农民党在大选中的胜利对罗马尼亚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在斯科尼切斯蒂村人人都这么说。在布加勒斯特，人们不断地说：马尼乌使人失望。对局势无法做出深刻分析的齐奥塞斯库则认为改良主义无济于事。他不自觉地倾向了亲军团运动的、反议会制的右翼的主张。纳耶·约内斯库，他们的导师之一，是个对年轻大学生颇具号召力的哲学家，他撰文以平息人们的情绪。人们本来期待马尼乌领导革命，但他的表现证明，他没有这种能力。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与其他出身农民、社会地位低下、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以及正在寻找工作的青年们一起，重复着民族主义右翼的简单口号：自己不是一个西方人，不必因此而感到羞耻……对年轻的人民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做到的。

强大最可靠

资产阶级的西方已经衰老，而罗马尼亚却还年轻。当人们提到日内瓦、和平与国际联盟¹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¹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于1920年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有63个国家先后加入。英法始终占有“国联”的领导地位。“国联”表面上标榜以“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实行再分割的工具。

——译者

便冷嘲热讽。他不相信那些为资本主义效劳的假理想主义者发表的温文尔雅的讲话。他认为强大才是最可靠的。革命的苏联不是作为强国成功地迫使一些国家承认了它的存在了吗？1924年，这些英国人、法国人、殖民主义者，他们不是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苏联吗？历史告诉人们：惟有力量才使人产生崇拜。

在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一个失去了在社会中上升机会的前途暗淡的人，除了对建立在怨恨基础上的暴力的追求与复仇的渴望，他还剩有什么呢？在布加勒斯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企图加入某个组织。他深感一个人太孤单，太软弱无力。他在工会斗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自己直言不讳地描述了他的这段生涯：“必须指出，当时罗马尼亚形势恶化与席卷全人类的世界经济危机紧密相连，并且在我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加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又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1929年，我到布加勒斯特。自1930年起，我便投身青年人的工会运动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3年，我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员……1932年与1933年，罗马尼亚发生了工人大罢工，其中以普洛耶斯蒂大罢工和1933年2月布加勒斯特铁路工人大罢工最为著名。它们有力地证明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证明反法西斯斗争与争取民主的最有效力量是联合农民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是一切工人与民主力量的大联盟。必须强调1933年2月大罢工的重大政治意义，它是希特勒主义在德国生根后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

这便是乐谱的第一章。事实上，这个身材单薄、眼睛忧郁而明亮、棕发浓密而卷曲的年轻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大概

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常常缄默不语，偶尔发作，却又不善言辞，他到底干了些什么？1933年2月格里维察工厂铁路工人罢工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吗？有可能。当时，一方面工人运动初起——普拉霍瓦山谷与油井停工，另一方面官方开始镇压。继格里维察罢工后，约2000名工人被捕，同年8月，罢工的发起者受到了军事法庭审判，然后被遣送到克拉约瓦。1945年，工人领袖中有几位脱颖而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基伏·斯托伊卡、斯特凡·沃伊特克和乔治乌·德治，后者在战后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书记。

克拉约瓦诉讼案动员了一大批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社会民主党政治界和知识界人士、自由党左翼。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来了。有人说他来法庭作证，有人说他因散发传单而被捕。不管怎样，他投身战斗，迈出了第一步。同年9月，他又一次被逮捕，原因是：年轻的齐奥塞斯库参加了一次未经批准的反法西斯集会。年轻人受到审判并被遣返回斯科尼切斯蒂村。姐姐被尼古拉的勇敢深深地感动了，在她眼里，小弟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被警察押送回来，但毅然决定返回布加勒斯特，继续参加战斗。否则，齐奥塞斯库还能企望什么呢？留在村子里将会前途无望，等于接受贫穷与苦难。大概与政治化了的神甫接触了一次，齐奥塞斯库就被吸引参加了反对派的营垒，即那些声称要推翻假民主秩序，进而建立一个行会主义与以罗马尼亚族为主体的国家的军团营垒。

30年代，社会、政治气氛是如此地激烈，以至于人们难以想象可以置身于工业化大城市的“历史”演变之外而袖手旁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是一个一味冥想的人。他喜欢活动，尤其嗜好社会活动。对大自然的美，他往往无动于

衷。他很少议论农村，也难得描绘自然景色。如果他谈及农村，那是为谈农业生产；如果他谈论天气，那是要告诉人们：人的意志可以战胜气候条件带来的不利因素。所以，不满 20 岁的齐奥塞斯库毫无眷恋地离开了斯科尼切斯蒂，重返布加勒斯特。为了资助他，他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只羊卖掉了。

军团运动的发展

与他遇到的那些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斗士一样，尼古拉的经历也变得复杂了。当时的政治氛围严峻。国王及其被人们称为“玉党”的支持者与正在分裂的党派——它们内部意见分歧，领导者争吵不休——进行较量。意大利与德国的集权模式使国王从政党内部收买了一些人。自由党最终分裂了；民族农民党分成了从行会主义派别到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几个组织。而军团运动则利用政府对它犹豫不定的政策，乘机发展。政府对军团时而镇压、逮捕、传讯，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在诉讼案中军团的“被告”担保。于是，军团便深入城市、农村，四处招兵买马。政府对他们进行的镇压恰好为他们增添了殉难者的殊荣。他们受到了一些大家族和济济·康塔库齐诺将军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他们还到年轻的东正教神甫和修道院的学生当中煽动，那些人厌倦了宗教组织在权贵面前所表现的奴颜媚骨和过分的妥协。1936 年，被天主教会派往布加勒斯特的法国牧师克拉维埃对军团在东正教年轻信徒中的影响就深感不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刊物，如《思想》杂志，为军团依靠的一批理论家

辟了一个专栏。因职业关系，曾一度与卡罗尔二世国王十分亲近的哲学家尼希福尔·克雷尼克便在上面撰过稿，神学家斯塔尼洛埃亦然。尼希福尔·克雷尼克还起草了一项计划，刊登在名为《人权国家》的一本小册子上。他建议一党执政，实施行会主义经济，弘扬罗马尼亚民族精神，禁止非罗马尼亚族人担任公职。

为了站稳脚跟，军团的足迹遍及广大农村与城市，他们与知识界，与向他们提供经费的上层社会的某些人物频频接触。他们组织工作露营和假期旅游活动；他们参加议员竞选，以示争取平等的权利；他们还搞政治恐怖活动。1933年，内政部长被暗杀。军团还长于组织能够激发群众情绪的活动。为军团分子举行的盛大的安葬仪式曾震动布加勒斯特全体市民。那是一些在西班牙战场为佛朗哥^①战死在沙场的军团成员。面对强大的军团运动，知识分子与左翼党人行动起来。他们将民粹主义者战前创办的《罗马尼亚生活》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尼古拉对他们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参与了该杂志的任何活动。

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分子谴责军团运动迎合农民的迷信心理，指责军团运动加重了小资产阶级的恐惧感。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小资产阶级的收入与储蓄已经减少了。军团秉承当局意旨，否定劳资协定，而民主党人（左翼）则反对他们的理论根据。尼古拉没有参与这一论战。他当时刚刚20岁，既没受到过什么训练，也没有与他们接触过，当

^①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二次大战期间支持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译者

然也不可能置身于这种公开的对峙之中。他文化层次低，又缺乏生活经验，他只注意那些简短的或简化了的表达方式。他只能凭直觉判断是非，并决定自己的行动。比如，他能接受一个叫吕克雷蒂乌·帕特拉斯卡努的地下共产党人以下的说法与责难：军团的“铁卫团”与政治警察以及国王周围的政界人士关系密切。帕特拉斯卡努指出，自由党人的杜卡部长被“铁卫团”暗杀了，他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3个“铁卫团”成员向他开枪射击，而没受到任何惩罚。1936年春天，政府同意在一个外省城市特尔古穆列什召开一次由军团操纵的大学生代表大会，甚至给与会者派了一辆专列。与会者故意弄脏了纪念杜卡部长的标语牌，他们在上面涂抹污秽。而当权者在这一行径面前却无动于衷。对“铁卫团”诉讼案的审理只是走走过场。1936年7月16日，军团运动领导人科德里亚努的旧部米哈伊·斯特列斯库饮弹身亡，身中38颗子弹。被害前，他已经离开军团。更令人发指的是，斯特列斯库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杀害的。杀人凶手被判服苦役，但科德里亚努丝毫未被触动，甚至没有被传讯出庭作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朋友们对此义愤填膺，他们群起而抨击军团，抨击腐败的政府以及妄图掩盖这一暴行的丑角——议会。他们苦苦地寻找答案，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次党争的暴力行为。他们感到被愚弄了。军团成员行动自由，而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朋友们则总是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受到极右派帮凶警察的跟踪与威胁。1936年，近30种工会及工人刊物因经费困难而停刊，这对他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一种面对社会不公正的苦涩感时时压在他们的心头。当他们获悉，在西班牙战死的军团士兵不仅获准在国内安葬，而且政府还派遣专列供军团拉运遗体回国时，他们实在忍无

可忍了。布加勒斯特大主教米隆·克里斯蒂亚允许该市的教士参加有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官方代表出席的送葬队伍。军团士兵简直被当成了民族英雄，这是年轻的齐奥塞斯库无法接受的。他与他的朋友们感到被抛弃、被欺骗了。但他并未气馁，反倒增强了斗志。他一无所有，因而也无所顾忌。他是天生的斗士。他投身到现实的战斗中去了。

第 三 章

地 下 工 作 者

(1939—1944 年)

无名小卒^①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并不寻求逃避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有时无法避免的恐怖。他天性好动。他是个离乡背井的贫苦农民，其社会地位不会使他走上移民的道路。30年代与20年代初期一样，在罗马尼亚，每当出现民族主义的排外浪潮时，犹太人中便有一些人离去。尼古拉除了罗马尼亚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身。然而，正如一个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米隆·帕拉什沃斯库在他的日记中所指出的：“我从未如此清楚又如此痛苦地感到，‘铁卫团’的罗马尼亚简直是一座坟墓，一座人人都在挖掘死尸的坟墓。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挖出死尸，再统治死尸。这是一个死尸的国家。”帕拉什沃斯库又补充道：“先知只诞生于衰败的时代。无论身份如何，先知们辩证的思想意识终将使他们在昙花一现的众多英雄人物中出类拔萃，并引导人们走向新的未来。但在衰败的时代里，先知们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革命者……”

30年代末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尚缺乏远见卓识。他仅凭借感觉去判断周围事物，满足于日常的、几近执拗的活动。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好动的天性以及他的反叛情绪，都合情合理。他理直气壮，疑惑和苦恼与他无缘。但在罗马尼亚这个社会里，他孤立无援。没人举荐，没有后台，自己也没有代表性。他是个地道的无名小卒，因此，他选择了沉默，长时间地、默默无闻地投身于反法西斯的工人运动中。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在狱中，他则参与难友们的密谋策划。罗马尼亚的现代历史文献中记载了 30 年代末的群众革命运动，也记载了齐奥塞斯库的政治活动。翻开 1979 年出版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们的教科书便可以知道，当时的革命斗争正处于一个新阶段。一些资料性的图片表明，当时布加勒斯特的工潮与学潮此伏彼起。普拉霍瓦山谷的群众，由于共产党地方支部的发动，也都行动起来。邻近村子的农民不仅团结一致，而且与工人结成了同盟。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需要建功立业。这是现实主义的需要。他必须塑造自己，为自己谋取理想的社会地位，并确定要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从献身革命到被镇压，从自由到被监禁，这个年轻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他被盯梢、追捕，但他并不因此而烦恼。相反，他感到异常兴奋。1936 年，他担任普拉霍瓦山谷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由于有人出卖而被捕。在法庭审判时，他表现得既不胆怯，也不沮丧。相反，他欣喜若狂，因为他终于获得了放声呐喊的机会，他要发泄出令他窒息的满腔愤怒。一些为他辩护过的证人们都能回想起他当时的勇敢与坚毅。尼古拉不是懦夫，也不缩手缩脚。当然，他立即付出了代价。他不仅被判处 2 年监禁，而且因为侮辱法庭被判 2000 列依¹。

铁窗磨练

多夫塔纳监狱狱规森严，对犯人极其苛刻，其恶名远播

1 列依，罗马尼亚货币。……译者

法国。1926年巴黎出版的亨利·巴尔比斯撰写的名为《刽子手与囚犯》一书，详尽地描述并揭露了这所特殊的监狱。巴尔比斯呼吁广大公众警惕极右派民族主义者的暴行。参观多夫塔纳监狱给他留下了难忘的令人痛苦的印象：“在罗马尼亚，有一所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殊监狱——多夫塔纳中央监狱。它统统设置单人牢房。牢里的床铺是用螺丝固定在墙上的，白天一律翻上去，犯人全天不能坐下。伙食极坏，所有的犯人都挨饿……”尼古拉勇敢地忍受了这些非人的待遇。1938年12月出狱时，他被判押回斯科尼切斯蒂父母家管制，人们说，实际上，他没有回去。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的人，他也不愿意放弃从前的活动场所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地下联络网。他对地下工作非常感兴趣，甚至着了迷。他再也不想去奥尔特县的牧场，再也不想整天去做那些繁重而又乏味的工作了。而且，极右派的暴行也使他感到非继续斗争不可。他为改变自身状况而奋斗，也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事业而奋斗。

军团在1937年12月竞选中获胜说明，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军团通过合法途径在大选中获取15%的选票，而1932年却只有2.37%。因此，左翼民主党人同业已西方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实际上，军团的宣传建立在革命的理论基础上，他们立志推翻已经当选的精英们。军团首领科德里亚努把这些精英作为民主体制的产物加以抨击。他在1936年写道：“民主按照选举原则遴选国家领导人，从而犯下了一个导致一切邪恶、混乱与农村贫困的根本性错误。如果国家被那些最低劣、最狡猾、最腐败的人掌管，那么还用得着对它的衰落大惊小怪吗？”军团的胜利有可能引发一场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和唯灵

论¹的革命。卡罗尔二世国王觉得自己不得不做出反应。他对政权的民主模式的蔑视无疑使他与反对议会体制的“铁卫团”们心息相通，但他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和他要独揽行政大权的强烈欲望又使他与“铁卫团”们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决定结束与军团长期保持着的妥协关系，与军团摊牌。风险极大，卡罗尔二世对军团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一网打尽了正在营地集结的军团领导人。科德里亚努被以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审判并被判刑。监狱对军团首领进行了残酷折磨，卡罗尔二世国王则走得更远，他授意日拉瓦监狱于1938年11月29日夜里将科德里亚努杀害了。国王集一切权力于一身，开始了利己的专政。他中止了宪法，建立了专制主义体制，强迫政府官员宣誓效忠，加强了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控制，最终创建了单一政党：民族复兴阵线。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正值20岁，他毫无遗憾地目击了1914年至1918年战后进行的民主探索的最后结局。

左翼反对力量遭到了沉重打击。然而，共产党的某些地下成员与工会活动分子已经学会怎样进退应付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郊区，在工人居住中心都有联络点、藏身地，也有同谋者。相比之下，王权专制对传统的自由民主力量，对民族农民党和自由党左翼显得更加危险。这些党派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拒绝合并到卡罗尔国王创建的党，即民族复兴阵线中去。但他们又难以继续公开的政治活动。他们既不进行秘密抵抗，也不搞暴力活动。他们的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民主党。

¹ 唯灵论、宗教和唯心主义学说。主张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心灵，物质是心灵的附属物，只是表象，并不真实存在。——译者

尼古拉对这种动荡的局势并无不满。他看不起那些胆怯的、把实际斗争与口头声明混为一谈的人。他认为，以尊重人权与自由，以及宣扬用条约的形式维系和平为内容的演说皆空洞无物，缺少实际价值。他估计，某些左派人士为反对王权专制终将与极左派走到一起。他大概听到了莫斯科强加给各国共产党的指示发生了变化：为组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联盟；应该放弃“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策略。

在多夫塔纳监狱，齐奥塞斯库接触了一些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大概向他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这些与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经历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建党初期阶段。他们了解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经受过初期失败的考验。齐奥塞斯库终于获得了一些历史知识，并投身到颇能锻炼人材的论战行列里。

他的主要导师是乔治乌·德治。

尼古拉与德治相处得很融洽。两个人都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德治比他的弟子尼古拉大 17 岁，来自摩尔多瓦南部。尽管年龄与籍贯不同，他们却很默契。德治的父亲是工人。他自己只读了几年小学，11 岁便开始当工人，并卷入战后发生的工潮。他于 1921 年被捕入狱，因此，他被警察局当作布尔什维克记录在案，以致使他出狱后难以找到工作。德治 1929 年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地下组织，比尼古拉早 4 年。德治有一副可爱的长相。他身材魁梧、结实，高高的额头，厚厚的嘴唇。

乔治乌·德治给他的小弟弟齐奥塞斯库勾划了一幅最简单明了的草图：一边是地地道道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精华，另一边是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对纯粹的罗马尼亚问题，尤其对如何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

罗马尼亚边界不受侵犯问题不太感兴趣。齐奥塞斯库被德治的这种划分方式和莫斯科对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动摇了吗？大概没有。在他的心目中，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斯大林是无可争议的、惟一能把社会主义引向胜利的伟大领袖。只有苏联的富于挑战性的技术实践才是令人推崇与羡慕的。苏联人向世界证明了，他们完全能够把那些迟钝的、落后的俄罗斯农民改变成敢于打破一切记录的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些工人是钢铁战士，目光专注，面孔庄严，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苏联的女人们则面容圆润、目光明亮，常常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苏联人证明了人类能够创造未来，把握历史，并战胜大自然。齐奥塞斯库回忆起母亲的面孔，那是一副被命运摧残的满是忧伤的面孔。她一生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相比之下，那些在集体农庄里劳动的苏联妇女则春风满面，朝气蓬勃。齐奥塞斯库被深深地打动了，并决心勇往直前。

民族感情被伤害

不过，尼古拉有时因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而感到懊恼与遗憾。他与他的同志们只不过是弱小的邻国利益漠不关心的某一大国的工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认为，必须结束1920年至1930年这10年中阻碍共产党蓬勃发展的分裂局面。必须使苏联人相信，罗马尼亚共产党在致力于自己事业的同时，完全能够成为苏联的一支坚定不移、忠诚友好的同盟军。乔治乌·德治赞同齐奥塞斯库的看法，他对长时间以来的论战也厌倦了。论战期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们被当

局指责搞恐怖活动，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镇压。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共产党内部争吵有害无益。共产党应该从这一阴暗时期走出来。必须不计前嫌，求同存异。

有一件事让乔治乌·德治很伤心：1924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不是批评了1919年凡尔赛和会^①条约发表后出现的一些帝国主义小国吗？它还公然号召那些所谓受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希腊压迫的人民搞分裂。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②应该附属于苏联，特兰西瓦尼亚应该争取独立。苏联的同志们怎么能相信罗马尼亚共产党会接受这样一个与民族感情相悖的计划呢？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一致捍卫大罗马尼亚。1917年至1918年间，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了实现这一民族目标而英勇献身。

1931年，莫斯科总算使形势发生了一些转变，不过并未否定它评价民族问题的原则。苏联人主张共产党人应以团结为名，采取行动支持本国那些提出社会要求的群众运动。然而，他们接受波兰共产党成员亚历山大·什特凡斯基作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这一现实还是颇费周折的。必须指出的是，那时大部分罗马尼亚共产党员都是外国血统，他们是一些杰出的匈牙利和犹太知识分子。这一局面干扰并妨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发展。无论如何，乔治乌·德治还是十分乐观的。他调动了社会上的两个积极因素：1929

① 凡尔赛和会，即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会议，和约确立一些小国独立。——译者

② 比萨拉比亚曾属罗马尼亚，后来被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分割。布科维纳1919年从奥地利分出，为苏联和罗马尼亚分割。——译者

年组成的“统一工会”和 1933 年 11 月成立的由彼得罗·格罗查领导的“农民阵线”。它们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两支可靠的同盟军。

齐奥塞斯库、德治和他们狱中的同志们表现出的顽强精神与战斗力使人们感到，斯大林镇压方式首次被披露时，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共产党人那样惊慌失措。当时尼古拉还没有成熟，他绝不会想到在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发生政治偏差与官僚主义的错误。他对苏联坚信不移，以致于对斯大林的真实面目、对集体化道路以及肃反运动的种种揭露都丝毫不能动摇他，而且他正在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苏联的革命暴力并没有使他迷失方向。在他眼里，苏联的那些受害者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毫不留情的。齐奥塞斯库觉得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自己不就是阶级敌人的受害者吗？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大夫塔纳和口拉瓦监狱就是他的死敌管理的。那么，苏联也可以有集中营，以便挽救、惩罚甚至消灭那些类似在罗马尼亚企图毁灭他和他的同志们的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齐奥塞斯库既没有同情他人的时间，也没有同情他人的情趣（他认为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那时既幸运，又无奈。幸运，是因为思想意识上的彷徨、矛盾、冲突都与他无缘。无奈，是因为他周围的世界摒弃了他，留给他的道路除了暴力别无选择。

齐奥塞斯库对当时思想意识分歧的来龙去脉似乎一无所知。当他觉得了解这些事情对他个人的事业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时，他便无动于衷了。不过，他接触一些 1936 年至 1938 年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人。这是一些从前参加俄国革命、后来受到打击的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是国际社会主

义的活动分子。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们发现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在苏联诞生的社会并非最为理想。而且，这个新的国家继续实施秘密警察、官僚主义和强权主义政策。当这些人决心离开政治舞台，悲观失望的时候，齐奥塞斯库的战斗生涯才刚刚开始。他不听他们的劝告。他不理解对苏联发生的事情丧失信心的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不理解帕纳伊特对苏联现实的无情揭露。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 1929 年曾以《向着另一束火焰》为题撰文，既批判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又揭露了苏联政权的虚伪性。齐奥塞斯库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再说他根本不读书。两种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种人幻想终于破灭，另一种人刚刚执着地投入战斗；一种人认为奇迹没有出现，另一种人则逐渐相信自己，认为他们将振兴事业，有能力实现苏联可能不知道如何完成的奇迹。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信念。他为什么要反对苏联的模式与榜样呢？他需要激励与崇尚。西方的民主远不能激起他如此的热情。在他眼里，西方民主代表着虚伪、懦弱与衰落，总之，这已是过去了。右派与接近共产党人的左派人士都谴责巴黎和伦敦面对希特勒的挑衅而表现出的软弱无能，齐奥塞斯库也卷入了这一潮流。1936 年 3 月，希特勒公然践踏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军事占领了莱茵河流域。法国人做了什么？一无所为，他们在观望等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人相信民主主义理想还会唤起民心呢？只要有人耍点离间手腕，炫耀一下武力或搞点欺骗就可以迫使国际力量失去平衡的时候，怎么还能让人相信那些关于和平与正义的漂亮演说呢？年仅 20 岁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怎么能不蔑视那些不想冒任何危险而获益的民主党人的软弱无能呢？基于这种看法，他与失望的共产党人来往。

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等人既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又不能找到一个良好的替代办法，也不能期待西方民主。这些失望的共产党人步履维艰，而齐奥塞斯库则在努力为自己创造未来。他厌恶失败主义者，他要为胜利而斗争。

与埃列娜邂逅

1939年，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齐奥塞斯库显得很幸运。一项紧急任务将他动员起来：卡罗尔国王想把“五一”游行的准备工作交给劳动阵线和他亲自领导的行会运动。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反法西斯运动的战士们以及争取和平斗争委员会都行动起来了。“五一”游行应继续属于左派。只要把盛大的游行队伍控制在手，就把握了反对王权专制的机会。左派的目的达到了。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参加了游行。当时他刚从多夫塔纳监狱放出来几个月，一直未敢公开露面。但这一次，他决定向国王挑战：参加游行。他表现勇敢，自我感觉良好，轻松愉快。他在布加勒斯特大出风头。那天天气稍凉，但灿烂的阳光使人预感到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齐奥塞斯库被壮观的群众场面所激励。他并不指望这一行动给他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只不过是他斗争历程中一个重要阶段。但他必须向对手显示自身的力量，不能让对手占领这块阵地。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都担心便衣警察混进来。那时，官方的秘密警察和暗探太多了。齐奥塞斯库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一位年轻妇女，并为之倾倒。晚上，在群众舞会上，他又看见了她。这便是埃列娜·彼得列斯库，她勇敢果断，高声喊着：“要面

包，要正义。”这是一位褐发、圆脸、薄嘴唇的姑娘，齐奥塞斯库喜欢上了她，非常喜欢。他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漂亮、聪明，而且还因为她充满活力，言谈爽利。她直截了当地与他谈话，一点儿也不扭捏作态。齐奥塞斯库喜欢这种近于粗野的直爽。埃列娜·彼得列斯库进入了他的生活，漫长的休戚与共的历程也开始了。

然而，这一刚刚建立的关系很快就中断了。齐奥塞斯库受到通缉。他东躲西藏，但还是被发现了。当时举报之风盛行，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国王的警察们的眼里，齐奥塞斯库这类青年被看作危险的鼓动者、流氓和恐怖主义分子。1940年7月，当他致力于恢复共青团组织及其雅西、基什诺夫、加拉茨和克拉约瓦地区支部时，再次被捕。但这次被捕并没有将他击垮。坐牢是一个有逻辑头脑的战士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年轻的齐奥塞斯库不屈不挠。他被遣送到布加勒斯特南部的日拉瓦监狱。“这是一座活人的坟墓。”1926年巴尔比斯这样说。深10米的地下牢房全部用水泥筑成。监狱的制度也非常严酷。尼古拉被判3年监禁。他是一个狂热的宣传鼓动分子，在监狱里还小有名气。他甚至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狱卒。1940年11月，一队军团士兵强行闯入监狱，妄图消灭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据罗马尼亚官方史学家解释，当时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同志们因为受到狱卒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工人阶级的代表与国王的军队结盟，多漂亮的形象！

1943年8月，齐奥塞斯库离开日拉瓦，被送到特尔古日乌集中营。这儿的制度要比日拉瓦宽松得多。犯人们可以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并逐渐形成制度。

1940年至1944年这几年，齐奥塞斯库的同胞们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而服刑的齐奥塞斯库却好像被放进了保险箱。作为一名战士，在战争激烈，祖国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他一定难以忍受那种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的日子。那时，应该拿起武器为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安东内斯库效力呢，还是开小差，冒违抗命令受处决的生命危险呢？应该为保护自我而逃跑呢，还是设法去加入苏联军队，从外部进行抵抗呢？尼古拉是否因为被判了刑而置身于斗争之外苦恼呢？我们不得而知。他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努力不使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其实，几年的监禁倒是保护了他。齐奥塞斯库好像一个胆怯的讨人喜欢的小弟弟。那些比他年长的人斗争经验丰富，知道在思想、政治问题上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今以后，他属于一个集体了，而且也避免了因为缺少文化，行动没有计划性而容易产生偏差的危险。在日拉瓦监狱坐牢的共产党人对他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为他创造了活动范围，提供了盟友，使他借鉴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共同经验。齐奥塞斯库当时失去自由的不幸处境反倒救了他，使他不会做出一些愚蠢的、危险的举动。在日拉瓦监狱，尽管身体受到摧残，但齐奥塞斯库受到了他的难友们的影响、指导和文化教育。有人组织了教学小组：以实际斗争目标为主要课题，再辅以少量的理论知识。齐奥塞斯库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学了不少东西。他设法与监外的革命者建立了一些联系，得以不断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日拉瓦监狱为齐奥塞斯库提供了一个新天地，并决定了他的终身职业。日拉瓦标志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政治监禁使他获取了某种地位。他再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年轻的活动分子，而是“同志”了。

斯大林牺牲罗马尼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社会无声无息。如果说他在日拉瓦铁窗后面与特尔古日乌铁丝网里度过的日子，我们今天难以了解其详细情况，但这次坐牢的份量还是不难估计的：4年，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来说，是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段日子。在被监禁的生活中，齐奥塞斯库学会了忍耐。面对鲜血与死亡，他表现得无所畏惧。他少年时代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个人的遭际使他对别人的不幸已不那么敏感了。这段日子意义重大，他开始觉悟到：铁窗生涯把他的命运与集体的命运融为一体了。他个人的生活与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反法西斯战斗中千百万仁人志士创造的历史不可分割了。他一步跨进了敢于为集体英雄主义而夸耀的一代人的行列。他为此感到自豪。

这几年的生活对齐奥塞斯库显得单调，但罗马尼亚政治力量却发生了复杂的分化组合。1940年至1944年，罗马尼亚人民陷进了一场悲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真正选择自己前途的主人，而且被分割了。它在德国与苏联的双重压迫下挣扎着。在它的历史上，罗马尼亚人再次成为“被巨人们打垮的矮子”，正如他们的诗人瓦西里·亚力山德里在1878年罗马尼亚独立时曾经描绘的那样。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导致布加勒斯特屈从于柏林。国家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有不少信徒，而且由于居住在罗马尼亚土地上的一小部分德国人的推动，德国的宣传工作对舆论的影响也颇有成效。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则收效甚微。此外，布加勒斯特

对苏联向巴尔干扩张的梦想总是疑虑重重。至于欧洲其它地方的民主模式，已经濒于破灭了。卡罗尔二世国王把他国家的命运系在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车上。他认为，这样便可以找到确保罗马尼亚边界的途径。但他错了：1940年，柏林强迫罗马尼亚政府把特兰西瓦尼亚一片广阔的土地让给了匈牙利人。卡罗尔二世承受了这份屈辱不久，便逊位了。

面对使他的同胞们迷惘的事件，齐奥塞斯库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不可避免地会去评估自己祖国的软弱程度和对于大国的从属地位。可以设想，他当时怒火中烧。这种怒火不会令他沮丧，而会导致他采取旨在复仇的行动。1940年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来说，是暗淡的。因为莫斯科忠于1939年8月同纳粹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夏天尤其阴森可怕。6月26日，苏联人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罗马尼亚人撤离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乔治乌·德治要说服齐奥塞斯库相信斯大林有道理得需要怎样的聪明才智啊！必须拯救社会主义的故乡，使苏联免受德国的侵略。斯大林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必须相信他。德治就是这样向他的年轻的弟子解释的。对当前这场灾难，首先应该负责任的难道不是西方人吗？是他们在希特勒的武力进攻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是他们在1938年10月慕尼黑会议上采取了绥靖主义政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欣赏斯大林对西方人自命不凡的态度。斯大林的战术被理解了。但理解并不意味着接受，更不意味着接受者要改变自己。1940年，齐奥塞斯库对苏联老大哥的做法思想上持保留态度。不过他又时不时地发发牢骚。他说：“在关系到命运的困难时刻，罗马尼亚人民是孤立的，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它被欧洲的大国们抛弃了。”当共产国际谴责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对德国

抱着敌对态度时，齐奥塞斯库心中怨恨不已。这时，前途对他显得格外阴暗。

随着同盟国态度的转变，1941年终于出现了曙光。齐奥塞斯库放心了。拥有强大力量的德国向苏联宣战。从此以后，两派对垒是明显的：胜利必须属于20世纪发生重大革命的这一国家或另一国家。尼古拉因双方的全面动员而兴奋。不幸的是，当时的罗马尼亚被倒向德国人的安东内斯库统治着。他对罗马尼亚人民的背叛激怒了乔治乌·德治。这一背叛更可怕的后果是，安东内斯库被当成忠诚的战士，而且他很可能会忠诚到底。他没有征得罗马尼亚全体人民的同意，也没有同德国签订协议，便不负责任地投入了战争。

战争的年代

1941年6月22日，安东内斯库元帅命令罗马尼亚军队越过罗苏边境的普鲁特河。7月底，罗马尼亚军队解放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接着又越过第聂伯河。1942年与1943年，罗马尼亚人与德国人在克里米亚和斯大林格勒并肩作战。每次战斗都付出了重大代价。罗马尼亚方面伤亡惨重。齐奥塞斯库在日拉瓦监狱的同志们对这次强加给罗马尼亚人民的灾难性合作义愤填膺。他们听到了关于安东内斯库讲话的传闻，感到不可忍受。1941年6月11日，安东内斯库在慕尼黑说：“400年来，由于其地理位置与政治、历史条件，还有种族特点，罗马尼亚形成了一个阻挡斯拉夫人与土耳其人的屏障，将来她还要做出类似的贡献。今天，我决定继续沿着使轴心国走向胜利，使罗马尼亚人的权力得到承

认的道路前进。”在特尔古日乌，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忠于安东内斯库的文章。《思想》杂志就登载了充满激情的文章。比如1943年10月，斯特凡·约内斯库写道：“从全世界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沙皇主义的最高形式。”乔治乌·德治和他的同志们感到，这些话对他们的事业极为不利。

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在狱中谈论着未来，并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胜利上。他们认为，必须清除安东内斯库和支持他政策的那伙企业家及狂热的空想理论家。罗马尼亚人民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由卖国集团决定的战争。资产阶级先是把国家出卖给英法资本家，把它推向毁灭的边缘，现在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被监禁者们相信苏联红军会解放他们。他们满怀激情地期待着这一美好时刻的到来：摆脱安东内斯库的束缚，他们将为反对德国纳粹分子及其布达佩斯盟友而战。1943年末与1944年春天带来了希望。特尔古日乌的共产党人行动起来。乔治乌·德治开始整顿党的组织。人们不再议论关于1939年8月^①和比萨拉比亚的事情^②了。揪住过去不放手于事无补。必须与苏联结盟，因为别无选择。德治谈到了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并补充说必须准备一场旨在铲除安东内斯库政权的人民战争。齐奥塞斯库对此抱怀疑态度。人民起义？谈何容易。罗马尼亚共产党只有1000多名党员，力量太单薄了。但德治解释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抵抗力量，在解放祖国的进程中将得到苏联红军的支持。于是，齐奥塞斯库便沉默了。他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知道德治掌握着他

① 指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译者

② 指苏联要求罗马尼亚人撤离比萨拉比亚。——译者

无法得到的情报。

从德治的嘴里，被监禁者们获悉了以下情况：罗马尼亚军队中的几名军官，由于对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进行的大屠杀感到厌恶和对德国指挥官的态度不满而逃离战场。德国指挥官竟敢批评罗马尼亚人没尽到义务。这些军官决意对把他们引向大屠杀和屈辱的安东内斯库反戈一击。此外，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谣传：安东内斯库定期会见希特勒；军团人上到德国避难等等。在康斯坦察海港和普拉霍瓦山谷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些破坏活动，证明社会上还活跃着一批秘密的反抗者。必须吸收他们，并将其行动纳入党组织的规范之中。当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投降时，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开始感到罗马尼亚革命已迫在眉睫。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担心人民的大多数仍然继续服从安东内斯库政府。他们知道，历史是由那些最富于献身精神，最有头脑、有才干的人驾驭的。只要遇到强有力的领导，无知的人民群众是会紧密相随的。

莫斯科的命令

1944年春天，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急不可耐。他们日以继夜地沉浸在理论上的种种设想中，却没有实践的机会。他们密切注视着来自集中营外面的哪怕最细微的消息与信号。终于，4月4日那天，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监狱医务室突然涌进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是来自莫斯科的秘密特使。他大概带来了斯大林的信件。“要谨慎从事”，齐奥塞斯库心想，他有点不相信。然而，在医务室呆了几小时的乔治

乌·德治证实了。秘密特使叫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他带来了苏联人的具体指示。另外两名难友，毛雷尔和基伏·斯托伊卡也肯定了信件的内容。齐奥塞斯库很忌妒。他讨厌别人把自己当作缺乏经验的小青年，把他排除在秘密策划之外，简直让他无法忍受。

最新消息的内容是明确的：必须与已经成为反对派的自由党人与民主党人组成统一战线。这是不容迟疑的战术结盟。同盟国——英国人以更大胆的方式——与反对安东内斯库的密使在外国接触。如果让那些老牌政党的成员们各行其是，那么，苏联人用鲜血换取的罗马尼亚的解放就一定会对资本家有利。罗马尼亚的石油，属于人民的巨大财富，吸引着西方人。英国人明显地要控制希腊，如果他们再控制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那么巴尔干便会作为战略要地落进共产主义的敌对营垒。好像安东内斯库元帅在掩盖与英国人的某些接触。维绍亚努，这位在国际联盟说了很多蠢话的夸夸其谈的人，也在同英国驻埃及的外交官谈判，准备倒戈，他是罗马尼亚外长——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内心赞同国际联盟——的朋友。这些活动都是针对苏联人的。这些被揭露的诡诈行为使齐奥塞斯库清醒了。他感到，控制住这些极端危险的联系是当务之急。安东内斯库元帅善于玩弄两面手法，并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变卦，维护资产阶级旧秩序。德治睿智的分析以及苏联情报的可靠性只能使年轻的齐奥塞斯库满怀激情。但在估计罗马尼亚共产党所拥有的力量上，他又深感不安。党员数量不多和党员成分上的知识分子特点使他气馁。

春天一闪而过。夏天酷热难耐。人们在空气似乎凝固的木棚中感到窒息。有的人梦想到森林中去散步、或者冲个凉水澡。齐奥塞斯库则怀念布加勒斯特城郊的小咖啡馆。白葡

葡萄酒更是可想而不可及。集中营内部，被监禁的人不时地发生口角与打斗，看守们也经常殴打犯人。同盟国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振奋人心，但随之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罗马尼亚向何处去？推翻安东内斯库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据传，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在协调各个环节，并督促人们为将来的起义者们准备武器。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南线向前推进。苏联人节节胜利，受到了人们的赞赏。集中营中的某些共产党人幻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以便打垮匈牙利法西斯分子，追歼德军残部。不久，向罗马尼亚爱国者提出的口号传到了集中营：“把国家与剩余的军队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保护庄稼，保护石油！强大的苏联军队已准备好在摩尔多瓦战线发起反击。惟一安全的道路是把德国人赶出去并签订和平条约。”尼古拉在思考：怎样使罗马尼亚军队调转枪口站在红军一边呢？广泛的宣传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无法从集中营里发起。被监禁的共产党人焦急难耐。但他们并未试图越狱，他们等待着命令。

还有一个让他们深感不安但又不愿言明的问题：那些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滞留在苏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将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想到了安娜·普克。齐奥塞斯库很好奇，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经常听人谈论这位颇有威望的女战士，但还从未见到过她，一直没有机会解开这个谜。

1944年8月20日，集中营的看守们显得比平时紧张。这时大局已定：苏联人在罗马尼亚战线发起了全面进攻。电台每小时都有对战况的报道与评论。8月22日，人们获悉安东内斯库拒绝下令停止战斗，拒绝发出停战要求。8月23日，乔治乌·布勒蒂亚努以自由党与民族农民党的名义迫使

安东内斯库签署停战协议。这一消息传到集中营，大家意识到安东内斯库及其同伙的末日已经来临。德治称，所有的事件都是在波德纳拉希的运筹下发生的。齐奥塞斯库简直不敢相信。就在8月23日这一天，国王把安东内斯库召到王宫，大概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事情很快便解决了。在波德纳拉希的命令下，安东内斯库被捕并交给共产党人看守。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们也相继被捕。当天20点，国王在电台发表了声明，他向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宣布停战协定已经签署，并命令罗马尼亚军队停止战斗。集中营里的战士们激动万分，但依然保持安静。不久，乔治乌·德治对他们讲，当时失败的危险并非不存在。负责党与王宫联络工作的帕特拉斯卡努同志为了说服国王放弃他自己的计划，不得不谨言慎行。国王原本打算采取较温和的政策：向安东内斯库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因为他已失去民心，不得不将他免职。国王曾打算让扬·吉古尔图代替他，让反对派中的格里戈里·尼库列斯库接任外交部长职务。可怜的国王完全忘记了德国人在保护安东内斯库元帅，而且他们可能会对任何改组都采取行动。齐奥塞斯库与他的同志们都为波德纳拉希和帕特拉斯卡努的明智拍手叫绝。

第四章

宦海仕途

(1945—1965年)

走出集中营^①

1944年8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交了好运，成了自由人，但又忧心忡忡。说他交了好运，是因为他属于胜利者的营垒，历史判定他赢了。说他成了自由人，是因为苏军开进了罗马尼亚，打开了所有集中营的大门，集中营的看守们，或投诚，或失踪，或成了丧家犬，但心怀不满，发誓要卷土重来。说他忧心忡忡，是因为时局未稳，共产党人虽属胜利者，但是，国王米歇尔仍然领导着国家，他周围满是忠实的信徒。他们是一些反对安东内斯库元帅政策的分子，还有被卡罗尔二世禁止过的一些政党的党徒，以及看华盛顿、伦敦、巴黎眼色行事的民主党人。因此，尼古拉积四年之经验，仍然保持谨慎从事的作风。出于本能，他保持着沉默。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这是一个善于察颜观色的人在策略上的沉默，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在飞黄腾达之前自我保护、以屈求伸式的沉默。一些闲言碎语对他的这种态度提出非议。有人说，在多夫塔纳监狱时，他曾为共产党领导人擦过皮鞋，同他们拉上了关系。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被关进了多夫塔纳监狱，是因为他杀害了他的师傅。他曾在一名鞋匠门下当了几个月的学徒。对于这些风言风语，他并不去辟谣。别人对他的轻侮，他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人。他没有闲暇去套友情，也不相信世间还有互谅互让。在充满敌意和忌妒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他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对受到忌妒一点也不难为情。他沉默寡言是因为对别人没有什么话要讲，也懒得去随声附和。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完全曝光呢？见过他的人说，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得意忘形。

可是，与他阔别四年有余而又重逢的那个小个子女战士埃列娜·彼得列斯库却不这样看。他们之间的柔情蜜意又接续了下去。埃列娜看到了这个人的力量所在，同他一样，她对时局也极不信任。她出身贫寒，深知要获得成功就要奋力去抗争，在这个世界上，不付出代价的事是不存在的。尼古拉深深地爱着她。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可以说计谋过人，料事如神，很会审时度势。他毫不犹豫地将她娶为妻子。尼古拉很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他时年25岁，惟一的资本就是一名共产党人。在1944年冬至1945年春这场政治风云中，一切都得竭尽全力去获取。另外，还得抓紧时间，并遵循一条正确的路线。齐奥塞斯库深知，在他的国家里，共产党人或者掌握政权，或者被消灭掉，两者必居其一。取得政权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治理国家，而不是企图当反对派。为此，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人情入理地分析时局。齐奥塞斯库从不考虑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举例说，他就将苏军的一些野蛮行为，一些令老百姓惊恐不安的举动认为无足轻重。埃列娜则不无嘲弄地说：“布尔乔亚们是十分脆弱的，他们一旦离开舒适的沙龙，就会冻馁而亡。”人们看到，苏军士兵将他们从人去楼空的私人宅第中顺手牵羊扯来的宽大的绣花睡袍罩在他们单薄的军装上。也看到有的苏军军官手腕上戴了五六块贵重的手表。有人说，蒙古骑兵将卡罗尔一世建有避暑行宫的小山城西纳亚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然而，尼古拉却说：真是荒唐透顶，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苏军在罗马尼亚的存在。

站在红军一边

齐奥塞斯库的同志们个个精明过人，工作出色，他们实现了党的发展，又恢复了秩序。他们利用国王要求军队放下武器的声明，将一批军人俘虏过来并拒绝释放。至8月底，就有13000罗马尼亚人被关起来。这些人当中有危险的狂热分子，他们认定自己是被国王和最高指挥部出卖了。他们本来是要退守山林，以游击战来骚扰苏军的。苏军指挥部认为最好将这些人除掉。齐奥塞斯库赞赏苏联人的作法。可是，他并不真正了解苏联人，因为他从未离开罗马尼亚到国外去过。这是他的缺憾。他为此感到十分不自在。他担心自己被排斥在外，陷入孤立。他深感自己能力有限，眼界不宽，并因而十分懊恼。他发现，在他秘密走访特尔古日乌时，受到了波德纳拉希的冷遇。而乔治乌·德治、斯托伊卡和毛雷尔却出尽了风头。他感到十分尴尬。这种境遇可能使他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无法接触机密情报。然而，在一个极不稳定而又生命攸关的历史时期，拥有灵通的消息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因为不了解内幕而举止失当，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口 本 文 原 载 于 德 国 威 利 斯 的 报 章 且 一 四 五 日 而 五 日

切。在他的心目中，占压倒地位的却是罗马尼亚的革命事业。可是，没有苏联的帮助，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权衡利弊，终于拿起笔来，在1944年9月21日刚刚创刊的《火花报》上撰文，狂热地呼吁青年共产党人起来与苏联人并肩作战，为最后战胜亲纳粹的霍尔蒂匈牙利人而洒血疆场。他的话是十分雄辩的，因为共产党人需要苏联红军。

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人可以放心了。他们的党站稳了脚跟，并在不断地发展。为此，也要求党的先驱们改变观念和行为规范，应该走出英雄主义的地下状态，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将党的事业变成群众的运动。积极的活动代替了谨小慎微，公开的宣传代替了秘密的协商。厌世与宿命、坚定的信念与惊恐不安、苟且偷生与投机钻营、渴望正义与担心报复，这些复杂的、有时是水火不相容的思想，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1944年时，共产党仅有数千人，而到了1947年，他们的人数就一下子猛增为70万。深信生活将要起变化的工人们，为了脱离自由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老爷们，纷纷加入到这个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党的行列。可是，那些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左派人士，对于党的队伍的扩大和新党员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混杂，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对于党的队伍轻而易举地扩大，齐奥塞斯库并不十分欣赏。但他看到，由于党员人数猛增，党变得强大了。只有这样，过去的精英们才无法卷土重来。把这些新党员接收进来，组织起来，保证他们不失去控制，就是健康的治理。让那些知识分子们去评头品足吧！面对不符合他们理想的客观现实，让他们品尝苦涩的青果吧！像米隆·帕拉什沃斯库这样的真正左派知识分子所描绘的暗淡前景，丝毫没有影响齐奥塞斯库的抉择。帕拉什沃斯库写道：“我认为，

这些党员涌进党内并不是光辉前途的征兆，而是巨大破产的证据。”破产，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就是失去权力。齐奥塞斯库不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知识就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体系，就是他每日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让那些布尔乔亚出身的党内理论家去谈论所谓的“正确性”吧。有时，话是说得很漂亮，但其本质却并不见得正确。因为在当时，首要的是先赢得胜利，镇压那些压迫人民的人。进行大清洗是执政的一种方式，齐奥塞斯库乐此不疲，因为将新的正义升华为理论不是他之所长。

1945年时，吕克雷蒂乌·帕特拉斯卡努任司法部长。他十分胜任这一职务。在实践中，他作风严谨。他富有教养，风度翩翩，且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善于引起西方人士的注意。他是一位教授的儿子，本人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律系，曾留学于德国莱比锡大学。1937年至1940年间，满怀激情地投身到了反法西斯的活动中。由于他富有外交天才，所以1944年8月起义前几个月，他奉召在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共产党人、莫斯科以及罗马尼亚王宫三者之间进行斡旋。但是，乔治乌·德治却不大喜欢这个人。齐奥塞斯库当时正屈尊低就。他满足于静观事态发展，而不轻言可否。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那天，帕特拉斯卡努哭了。他的这种情不自禁的激情，使尼古拉吃了一惊，他并不放过这一细节。从帕特拉斯卡努的这一脆弱表现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十分靠不住的盟友。但在当时，齐奥塞斯库急需有一个靠得住的保护神。因而，他就将注意力转到了同德治的关系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条线，他才可能被亲苏派接受，并被视为知己。斯大林这时也在对乔治乌·德治进行试探。德治有极大的可能被提升到党的领导位置上，从而

压倒他的对手，即那些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齐奥塞斯库深感振奋，又满怀喜悦地重新开始了已于1940年中断了的工作。

呼 吁 投 票

1945年，最紧迫的事就是组织选举，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选举的准备工作的在彼得罗·格罗查政府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位盟友，他为党提供过很好的服务。这位政府首脑，因为在战争期间收买被流放的或失踪了的犹太人的财产而大发横财，也因而名声扫地。但他仍是有胆有识、不甘心受人摆布的人。罗斯福一再要求遵守斯大林业已接受的雅尔塔协定，即在被解放了的欧洲国家中举行自由选举，他也一再呼吁人们恪守道义，显现真诚。尽管罗斯福喋喋不休，格罗查仍寸步不让。共产党正在紧锣密鼓地宣传。通过普选，要建立起比例制的一院议会。议会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埃列娜早已急不可耐。女人们终于享有了与男人们同样的政治权利。齐奥塞斯库真是春风得意。女同志们也有了施展其聪明才智的可能，他的姐姐和妻子就是她们之中的佼佼者。

尼古拉信心百倍地来到康斯坦察，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在那里，他高兴地发现，到处都是苏联人。港口完全控制在苏联人手中。那里停泊着许多美国船只，但是，没有苏联人的许可，它们在港口里什么事也做不成。苏联士兵有时横冲直撞，将他们占领的大楼抢掠一空，连地板的木条也撬走。战前建造的海滨别墅和旅馆，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满目疮痍

的景象令齐奥塞斯库感到不安。因为，在埃列娜的建议下，他正考虑在那里组织一次优秀工人子女的夏令营。他在康斯坦察呆的时间很短。1946年11月，他被调往他的家乡奥尔特县，担任了那里的党委书记。这真是不同凡响的经历，他手中握着生杀大权，又回到了他曾受辱的地方。当地的乡绅们早已失去了保护，有几个人甚至从斯科尼切什蒂村逃之夭夭。有一个人则宣布，为了尽到一个天主教徒的义务，他准备将财产分给他亲爱的佃农们。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清瘦，但又不失风度的老妇人，双手戴着手套，在村中心趾高气扬地牵着一头母山羊遛来遛去。她是靠它的奶才得以活命的。因为，农民们什么都不卖给她。这些农民个个都是硬汉，对生活充满期待。齐奥塞斯库充分理解他们，但也明白，对他们不能操之过急。

长期以来，村民们都切望土地改革。但到了1945年，真的把土地当作礼物送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却又满腹狐疑了。因为，每一届政府上台时，都许诺会带给他们丰衣足食，到头来却都成为泡影，他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当然，司法部长帕特拉斯卡努向他们做了详细的说明，称这次完全不同以往。说这次土改与1917年至1920年间进行的土改毫无共同之处，那次没有产生任何实效，而这一次，土地将分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并成为它的主人。可是，农民们还在等待，因为眼见才能为实。最初，土改给人以似乎要夭折的印象。因为，富农们丝毫未被触及，而手中拥有大量生产资料的正是他们这些人。罗马尼亚的富农们——当地人称他们为“什阿布里”，再一次化险为夷。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如故。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这一次还应该让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先生们的甜言蜜语弄得威信扫地吗？齐奥塞斯库按捺不

住，发起火来。他威胁要将那些背叛被剥削者利益的人送上人民法庭。他经常态度粗野，暴跳如雷。有人建议他稍安勿躁，说那些人办事就是拖拉，因为他们也是心怀疑惧。尼古拉气愤之极，说这些农民真是不可理喻。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1946年冬天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因为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却又无法找到他们。食品极其匮乏，老人和儿童冻饿而亡者不计其数。死神笼罩着大地。从俯身小木棺的女人们布满泪痕的脸上，从双手抚摸身体早已僵直的儿子的女人眼中，无不透射出死神的淫威。

这一场场，一幕幕，都使齐奥塞斯库夜难成寐，因为这一切，都是失败的象征。人民已经精疲力竭，走投无路。但是，他仍坚信，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世间没有办不成的事。大雪纷飞，笼罩着罗马尼亚大地，朔风呼啸，卷起冰雪，令人窒息。无边的灾难，折磨着人们。全国各地都面临饥馑。在摩尔多瓦，农民们试图抢劫列车，或者爬车外逃，以便躲开死神。邻近的乌克兰也在闹饥荒，在党员中流传着一些极其可怕的谣言。有的说，农民们饥不择食，竟将他们亲生子女的尸体用来果腹。对于这一悲惨的情景，齐奥塞斯库并不感到惊恐，因为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反而从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更加坚定了同过去决裂的决心。他也不用担心被赶下台去。因为，当时德治任经济部长。同他的这位兄长一样，齐奥塞斯库将他的命运押在了这一事业上。他同这位兄长怀有同样的野心。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因而也有着不谋而合的想法，要用苏联人十几年前使用过的办法，即集体化，加上加倍的工作和生产，来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他们不了解，或者假装不了解集体化在30年代给苏联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何况，集体化也符合1880年代以

来罗马尼亚社会的传统。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先驱多勃罗雅努·格拉 1886 年在一份题为《罗马尼亚社会党人要做什么?》的政治宣言中早就提出过，对于他的国家来说，废除私有制是获得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齐奥塞斯库赞同格拉·德治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分析完全站得住。1946 年选举的结果使他充满了希望。

大获全胜

11 月 19 日投票选举那天，充满传统节日的气氛，当然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 68 个席位，彼得罗·格罗查的农民阵线获得 70 席，具有农民民主倾向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民族农民党，连同它的外围进步党，总共仅获得 32 席。彼得罗·格罗查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西方国家派了一些记者报道这次选举，对选举结果也表示认可。共产党人皮尔乌列斯库、基伏·斯托伊卡、乔治·阿波斯托尔以及多夫塔纳集中营里的老难友们弹冠相庆。斯托伊卡参加过 1933 年格里维察的罢工，他对德治充满了信赖。1945 年他成了党的中央委员，1948 年曾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对于德治及其同伴来说，这一年是成绩辉煌的：1948 年 2 月，罗马尼亚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受到威胁时另一方将自动军事卷入。2 月 11 日的《火花报》刊登了罗马尼亚访苏代表团的照片，乔治乌·德治处在显赫的团长位置上。几天之后，罗马尼亚党选举他为党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真是喜出望外，他赢了。

而立之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之所在。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于对他说他错了。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政权的峰巅，真像是一场梦。与此同时，别的一些人却被清洗掉了，他的心逐渐放了下来。别的人的确比他更为出色，更有知识，或者更具冒险精神，但是，他们却都倒台了。帕特拉斯卡努就是如此，1948年他就消失了。齐奥塞斯库感触颇深，可是他却不露声色。帕特拉斯卡努是栽在理论上了，实在无用。而他，齐奥塞斯库，却深明灾难原因之所在，而且有机会从灾难中走出来。战前地主阶级无情的盘剥，战争的摧残和破坏，是今天困难的原因。但是，他对困难深重的程度和为恢复经济而付给苏联的巨大代价，却只字不提。然而，他对大事并不糊涂，因为，与苏联谈判是乔治乌·德治的权限，不容别人染指。齐奥塞斯库长于自制，而在对苏关系上保持沉默则是生死攸关的。齐奥塞斯库在1949年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宦海老手；如果现实妨碍他的仕途前程，他就对现实视而不见，忘掉它。他尽力克制住，不能有反对苏联的念头，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故乡，绝不能与苏联作对，因为它为罗马尼亚提供保护，以抵御西方世界。

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为齐奥塞斯库施展其才能提供了大好的时机，也使他得以实现他为之倾倒的发展模式。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之后，就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明了什么是集体化。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所谓“改革”，而具有双重意义，即是经济上的，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它的目的的一方面是要养活广大农民，并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农产品，从而间接地为国家工业化出力。另一方面，通过集体化的生产将造就一代新人。集体化既是社会的合理化，又是生

产的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中央集权式的体制之外，还要有良好的宣传工作加以配合。1949年3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制定了农业集体化的具体措施和远景规划。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也预示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应该同时并举。

齐奥塞斯库自认担负了一项光荣的使命，他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加强宣传工作，一点也不难为情。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对那些漂亮的照片津津乐道，目的是要使集体化以及实现集体化的具体办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辉煌的前景，同苏联一模一样。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不久之后，这张照片就被选进学生们的教科书中。照片上是合作化初期的一组男女农民。为了拍这张照片，齐奥塞斯库要求农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站成一长排。为了保证效果，甚至将两个面带惊恐的男人从队伍中拉了出来。他们可能是两个酒鬼。农民们个个手牵着马，马拉着犁，走成一条直线，秩序井然，纪律严明。齐奥塞斯库松了一口气，他就怕出什么意外，怕出乱子。他冥思苦想的，就是如何使人们驯服。现在，农业改革进展顺利，他禁不住喜形于色了。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集体化的三种形式：土地方面要农田连成一片，大面积生产；技术方面要拥有拖拉机站；文化方面要有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拖拉机手都得是优秀的党员。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实质上成了工人。他们就是一代新人。这些属于明天的男女农工必将令过时的、腐朽的布尔乔亚们望而生畏。

埃列娜和尼古拉对这一代新人怀有无限的感情。他们自己也酷似这代新人，都有一副征服者的面孔，一触即发的脾气，为了不使旧秩序卷土重来，他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

切。埃列娜尤其钟爱这些人的孩子们。他们不分男女，个个着装整洁，一色的蓝色围裙，留着寸头，以免生虱子和得斑秃。锡纳亚和康斯坦察等地的海滨别墅早已变成专门接待优秀工人子女的场所，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是新罗马尼亚的希望。劳动模范们占据昔日寄生虫们的宫殿，在宽敞的休养地疗养，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那些怀旧的小资产者们对此感到不快又有什么关系！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认为，米隆·帕拉什沃斯基之流的言辞是难以接受的。米隆曾说过：“在马马亚，我有了一番前所未闻的经历。我被安排在一家过去叫‘雷克斯’，现在叫“五一旅馆”的饭店里，那里的房客大部分是突击队的工人，他们这些新生的布尔乔亚自私、冷漠、穷奢极欲，完全一副暴发户的嘴脸，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已失去了任何自然美，佩金戴玉、大吃大喝，随波逐流。入夜之后，他们个个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埃列娜听了这段话后大为恼火。她认为她有权身着考究的时装，描眉画目，梳上优美高雅的发型。她也认为，吃好穿好是天经地义的事。资产阶级消失了，而他们过去享用的肉质鲜嫩，香气扑鼻的鲟鱼却不应从餐桌上消失。

安娜·普克案件

乔治乌·德治的罗马尼亚没有想过要创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现在要疯狂地报复。50年代初期，齐奥塞斯库的生活既充实，又乏味。说充实，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正飞黄腾达，就要跻身于领导的最高层。说乏味，是因为他对世界的知识仅仅局限在三个领

域，他遵从固有的行动准则和礼仪，对一些固有的信条奉若神明。他像同村的人一样，是一个地道的农夫；又像他在多夫塔纳监狱的难友一样，是一个善弄权术的行家；他又像乔治乌·德洽班底里的那些人，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官场里手。

当时，他有意避开了对他来说有一定风险的关系。他曾尽力不同德洽政府内一位叫做安娜·普克的贵妇有过多的交往。她是雅西地区的一位犹太女人，一名老党员。她曾积极地参与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的谈判。她是权力、哲理的化身，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守旧，齐奥塞斯库对她敬而远之。此外，安娜·普克也有过悲惨的经历，她的丈夫马塞尔·普克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中被除掉了。当时，罗马尼亚还有别的党员和他一样消声匿迹。对此，齐奥塞斯库并非一无所闻，但他却未予过分关心。他对安娜进行静观。在1945年，她的声望是无可争辩的。她刚从莫斯科归来，在整个战争期间，她一直在莫斯科过着流亡生活。她手里掌握着罗苏关系的许多机密，对1944年8月政变的准备工作也了如指掌。1947年，她被安排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对她十分合适。可是，齐奥塞斯库却认为，她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罗马尼亚人，她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太长，国内的劳苦大众一点也不了解她。1933年至1936年间，当罗马尼亚的青年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及其帮凶时，安娜在干什么呢？

她徐娘半老，但姿色未衰。她面如满月，眉清目秀，身体虽略显发福，但行动仍轻灵敏捷，无论谁见了她都不会无动于衷。乔治乌·德洽在同她的交往中，一贯谨言慎行，他甚至有点害怕她。两人之间尽管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和公开的争斗，但却在暗中较量。为了弄倒普克，斯大林选择了

德治。1952年5月至7月间，他的目的达到了。她被迫退休了，不是出于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声誉，就是不愿公开暴露领导层早已存在的分歧，或是对普克表示最后的敬意，她并未受到公开的批判。与此相反，对瓦西勒·吕卡却没有这么宽厚。他于1944年10月与普克一起从莫斯科回到罗马尼亚，他们曾在一起过流亡者的生活。1945年，吕卡晋升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曾权倾一时。但后来，他受到审判，被判死刑，后来又被减为终身监禁。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在他看来，安娜·普克有篡权之嫌。由于当时流传着一些不利于他的谣言，如说他在1950年至1952年间领导集体化时曾逮捕过8万多农民，他打算轻而易举地将责任推给这个嗜血成性的女人了。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这是洗刷罪责的最好办法。然而，还是有人作证说，齐奥塞斯库甚至毫不犹豫地向不听话的农民开枪。必须尽快制止这些谣言，让普克当替罪羊再好不过了。这种事真是易如反掌，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又是犹太人，必定会施展魔法，加害于人民。

埃列娜的气也顺了。齐奥塞斯库的这个平庸而又权欲熏心、锋芒毕露而又貌不惊人的妻子，与那个令人难以捉摸而又光艳照人的安娜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埃列娜没读几天书，她对此耿耿于怀。在她看来，知识意味着权势。这位身材矮小的女人一直想出人头地。光彩夺目的安娜只能引起她无穷的妒意。齐奥塞斯库对普克夫人最为恼火的是，她同苏联同志的关系达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眼下，齐奥塞斯库最缺少的也正是同苏联人的接近，他正在千方百计地建立这种关系。

执掌国防部

任何一个人，只要游离在苏联人的洪流之外，他就不可能飞黄腾达。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当务之急是了解这个伟大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治理者们是如何工作的。他同许多罗马尼亚人一样，对苏联的了解仅限于斯大林格勒、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斯大林。他在1950年受命去国防部任职，到埃米尔·波德纳拉希身边工作了。他终于获得了与苏联人交往和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这项任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当时苏军还占领着罗马尼亚，他就生活在主宰者们的周围了。

齐奥塞斯库这时已是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首长了，已经跻身于最高决策机构之中。他对这个新的职位满怀激情，自认为是一名战士。因为，当时冷战正酣，而在朝鲜又重开了热战。他开始接触一些战略性的重大课题，过去，他对这些问题是无缘问津的。他也有机会了解中国的作用，认识到为了对付帝国主义阵营，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他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后来又被关进了多夫塔纳集中营，对于军人的世界知之甚少，十分缺乏实战的经验。军事生涯一开始，他就与苏联人打交道，这对他的前程是十分有利的。他的顶头上司波德纳拉希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交给齐奥塞斯库一项重要任务：清洗军队领导机关，建立起属于未来的民主军队。齐奥塞斯库将他在集体化时显露出来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同派到罗马尼亚来的苏联军官相处得十分密切，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这些苏联军官的指导下，遴

选军事指挥官。

齐奥塞斯库从不显山露水，波德纳拉希也是一个隐而不露的人，他们相互赞赏对方的魄力。但是，他们的出身却完全不同。齐奥塞斯库出身于农民，而波德纳拉希却与农民阶级毫无瓜葛。他生于1924年，有一半德国血统和一半乌克兰血统，好像曾在雅西大学学过法律，后来又在蒂米什瓦拉炮兵军官学校受过训练。1932年因为有反叛思想和触犯军规被判刑，似乎坐过牢，而且正是在牢中与乔治乌·德治不期而遇。波德纳拉希不大出头露面，很难寻到他的踪迹。齐奥塞斯库1944年4月在提格鲁乔集中营里见到过他。那年8月，他大概是在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而起义的发动则是在苏军移师罗马尼亚之时。后来，他就追随彼得鲁·格罗查，而且再也没有离开他，当时他已坐在秘书长的交椅上。他善于将十分复杂的游戏玩得十分自如，真是一个怪人。

齐奥塞斯库和波德纳拉希互为依存，他们都洞察了一个巨大的机密，即苏联对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和野心。齐奥塞斯库对此窃窃自喜。在同波德纳拉希的接触中，齐奥塞斯库韬光养晦的本事大增。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社交上，齐奥塞斯库都小心翼翼，循序渐进。有一小撮特权人物，天天围着乔治乌·德治转，他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但是，齐奥塞斯库却很少在他们之中露面。他谨言慎行，深知言多必失，尽力避免使自己出现在这样的场面。埃列娜也在尽自己所能保护着她的丈夫。她交朋友也经过精心的选择。无论怎么说，齐奥塞斯库已进入了不惑之年。因为他们工作刻苦，严守纪律，几年之内就赢得了各方面的好评。他们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只要稍有不慎，

几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他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罗马尼亚高层领导人中，谁都了解斯大林统治的手法。斯大林去高加索小住几日，常常在狂宴豪饮之后，兴之所至，他就可以将一个人晋升，也可以把一个人免职。为了躲开莫斯科那沉闷的空气，他时常到高加索去。他喜怒无常，轻轻松松的晚会，亲密友善地把酒对酌，海阔天空的神聊，都会让人感到荆棘丛生。

赫鲁晓夫上台

1953年3月，斯大林撒手归西。局势再次动荡不定，危机四伏。斯大林逝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或者说权力的过度充实。为继承这位“各国劳动人民之父”的位置，苏联领导层正在进行极其激烈的争权夺利。同所有的人一样，齐奥塞斯库也在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然，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被斯大林的逝世弄得晕头转向。他尽力将他的悲哀和焦虑掩藏起来，从波德纳拉希处探听一些有关莫斯科时局演变的信息。1953年9月，赫鲁晓夫被提升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这个人胆大异常。他不是知识分子。齐奥塞斯库放心了，因为苏联的同志们并没有丧失应有的理智。赫鲁晓夫资历很深，早在1938年就进入政治局，任候补委员，翌年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他亲身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卫国战争和1946年乌克兰的大饥荒，这一切他都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他知道如何取得斯大林的欢心，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最后几年中，他也一直在斯大林的左右，当时曾发生了一些十分异常的事件。在晚年，斯大林脾气十分古

怪，他为所欲为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他既多疑又健忘，令人难以忍受。赫鲁晓夫也在时时提防，免得引起斯大林人的猜疑。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他从1949年起就居住在莫斯科，一直生活在惊魂不定之中。乔治乌·德治、齐奥塞斯库和其他一些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当时的小道消息和谣言满天飞，而赫鲁晓夫的忍耐力极强，令齐奥塞斯库为之倾倒。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真是一个大行家，齐奥塞斯库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也在尽力使自己定下心来。

埃列娜也向他提供了一些材料，以便使他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有一条，就是党的肌体十分健康。当时，德治正在执行一条净化党的政策，尽力从靠得住的阶层中吸收党员，即吸收那些既有技术专长、政治思想又好的人入党，而那些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则被无情地清除出去。以这种办法，德治毫不费力地将那些始终具有寄生倾向的知识分子们排斥出去了。1955年12月，全罗马尼亚共有党员595398人，这个数量足够了。第二条值得肯定的是，赫鲁晓夫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同南斯拉夫和解了。苏联老大哥表现出了某些灵活性，给了兄弟党一定的面子。赫鲁晓夫抵达贝尔格莱德时发表了演讲，但是，铁托借口南斯拉夫人听得懂俄语，没有将他的讲话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对此，齐奥塞斯库感到欣慰。齐奥塞斯库夫妇认为十分有利的第三条理由是，乔治乌·德治聪明、清醒，巧妙地保持了正确的方向。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实行集体领导。在布加勒斯特，德治也如法炮制，他放弃了党的总书记职务，更有甚者，1954年4月他甚至将总书记一职取消，改设由四个人组成的书记处，其中一人为第一书记。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获得了擢升。同他一起组成书记处的，还有获得德

治信赖的阿波斯托尔，以及两位无足轻重的党务人员达利亚和法兹卡斯。但是，德治对莫斯科做出的让步时间短暂，因为1955年10月，德治再次担任党的总书记。

对自己被擢升，齐奥塞斯库十分得意。对于德治表现出来的策略，他感到欣慰。对于德治面对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爱国主义，他则受到鼓舞。德治坚定的爱国主义表现在：1955年8月庆祝罗马尼亚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11周年的时候，当着特意来进行正式访问的赫鲁晓夫的面，德治大谈特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8月23日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对此，齐奥塞斯库大为赞赏。他们又可以重温过去的光辉业绩了，这对齐奥塞斯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德治的讲话表明，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战胜了从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罗马尼亚自己的英雄主义升出了地平线，与莫斯科的英雄主义进行抗争。齐奥塞斯库十分钦佩德治的才能，对他十分敬重，因为德治虽处世谨慎，但也敢对权威挑战。罗马尼亚的这位领袖之所以如此大胆，是有国际国内原因的。在国内，他日臻成熟，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即使民族利益和苏联模式之间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他们也可处理得十分自如。从国际上来说，在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的领导下，召开了万隆会议，会议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对罗马尼亚领导人也不无影响。已经取得独立或者正在取得独立的国家，强烈地、坚定不移地要求自主发展。对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天赋和成就，齐奥塞斯库赞叹不已。从短期看，赫鲁晓夫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不再那样僵硬，德治一班人可以放心，不用怕受到报复。另外，他们也在国内强制推行了工业化政策，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许多方面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了。从长远观点看，德治和他的领导班子

正将眼光转向北京，他们也想发挥一些国际作用。

非斯大林化运动

1955年在严寒之中过去了。多雪的早晨，昏昏暗暗。这时，德治感到疲惫不堪。他刚刚主持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从领导机构中排斥了那些逼他推行非斯大林化的人。但是，齐奥塞斯库却站稳了脚跟。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历史将他推到了前台。华沙公约签了字，罗马尼亚与莫斯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军事上，关系都更加紧密了。斯大林的逝世使这些关系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种种事态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沿着原来的路线继续干下去。在危险和危机面前，他没有退缩不前，可是，混淆不清的意识形态和捉摸不定的局势却曾使他举棋不定。现在，他再次容光焕发，因为在他看来，赫鲁晓夫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已有成就的那种人，他预料1956年将充满阳光。

可是，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却出现了一声旱天惊雷。赫鲁晓夫事先未向各兄弟党打招呼，就通知在莫斯科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说他这天要发表一个重要讲话。他们被拒绝参加那次会议，后来，由于泄密及苏联人的通报，他们才对当时的情景略知一二。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赫鲁晓夫满脸严肃，要求人们对他的报告严加保密，禁止人们作笔记。会上散发了18份文件，都是列宁致当时党的领导层的最后一些信件。接着，他就对着死一样沉静的大厅发表了他那有名的秘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很快就落到西方人士手中。

不过，在报告文本捅出来之前，已是谣言满天飞了。美国国务院于1956年6月4日公布了报告全文，《纽约时报》一字不漏地刊登了这份报告。

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说斯大林自1934年以来犯下了种种罪行，诸如滥用职权、用过激的手段实行集体化，这不是在说疯话吧？批评过了头就有诽谤之嫌，在实践中，要驱除恶鬼就要冒风险。齐奥塞斯库感到迷惑不解。他也承认，党内确实有人以权谋私，意志消沉，忘记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清党整党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为了使党重新回到列宁的路线上来而去正面攻击斯大林，难道不是在冒险吗？芸芸众生需要那些享有特殊威望的领袖们来引导他们。在那些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最高领袖们身后去攻击他们，简直就是亵渎神明。与此相反，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对社会主义进程中一些伟大变革时期怀有崇高的敬意。

在布加勒斯特，乔治乌·德治保持沉默，他的处境十分不妙。不久以前，即1954年，他刚撤了帕特拉斯卡努的职，并将他处决了，因为他代表知识分子改良派，要求政府实行自由化。现在，是否会有人站出来，指责他草率从事，粗暴地干涉了司法程序，总而言之，是采取了斯大林式的做法呢？他预感到自己不得人心，就采取了防范措施，免得出现剧变。齐奥塞斯库坚定地站在德治一边。他认为，纠偏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且只有党才能领导纠偏工作，否则，人们就会随心所欲，局面就难以收拾。3月22日，党的机关报《火花报》发表一篇题为《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文章，阐明了党的立场：“根据列宁一贯的指示，党代表大会制定的文件中强调指出，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

文明、为了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有人说这是陈词滥调，但是，那些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具有较高觉悟的党员却从中看到了方向。将这段文字译成通俗一点的话，就是：没有生动活泼的宣传工作，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

齐奥塞斯库完全赞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正确论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十分脱离实际。群众当然需要激情，但这种激情应是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性的。苏共召开二十大时，波兰的贝鲁特刚刚在莫斯科病逝。应该悼念他，缅怀他，以此来教育群众。《火花报》全速运转，利用波兰人民因贝鲁特逝世而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机会，发动读者们接二连三地发表悼念贝鲁特的文章、信件。读者们也从报上读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例如赫鲁晓夫和雅克·杜克洛等人在贝鲁特葬礼上致的悼词。齐奥塞斯库发现，德治在小心地应付着。当然，罗马尼亚也不可避免地出了一点小风波。某些知识分子错误地理解了苏共二十大发出的信息，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即使斯大林个人犯了错误，但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无可指责的。他们对党进行了无端的责难，德治决定接见这些人，并让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陪同他一起接见，因为这个人的自由化倾向早已使他大为不快，他要拖住他，迫使他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知识分子们十分放肆，竟然要求党放松对他们的控制，其中有个叫亚历山大·雅尔的人发表了长篇演说，对党进行猖狂进攻。德治对此大为恼火，仅仅一星期之后，就对他进行了制裁。德治权衡利弊，于6月1日宣布将雅尔开除出党。于6月18日至24日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认可了开除雅尔的决定。因为，为防止由于错误地理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造成局势不稳，就得保持应有的清醒

和坚定不移的方向。

匈牙利的起义

1944年8月23日革命纪念日之际，全国进行隆重庆祝，组织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一切都很顺利。9月份，罗共领导又发动了一场肯定宣传工作的运动，将它视为成功的经验。一番政治说教之后，又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56年10月，大张旗鼓地举办了“罗苏友好月”，苏联老战士代表团于10月9日来到布加勒斯特，他们呆到10月23日，同罗马尼亚人一起庆祝友谊。当时，波兰陷入混乱，罗马尼亚的邻国匈牙利也闹得越来越凶，布加勒斯特的当权者不得不加强防范。齐奥塞斯库心里很紧张，但他却表现得很坚决，因为他毫不掩饰对布达佩斯怀有的敌意。当然，他对斯大林分子拉科西的统治手法十分欣赏，可是，他也不会忘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匈族人1944年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态，他们自认为在党内拥有强大的势力，从而使真正的罗马尼亚人相形见绌，十分压抑。值得庆幸的是，乔治乌·德治成功地将瓦西尔·吕卡排斥出领导层，更值得庆幸的是，执行发展党员政策的结果，使真正的罗马尼亚人党员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匈牙利的拉科西也在抵御着改革者们的压力，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地位在明显地下降。齐奥塞斯库完全同意德治对形势的分析，也赞成他采取的防范措施。

1956年秋，形势急转直下。匈牙利“法西斯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了。“叛徒”伊梅尔·纳吉取代了拉科

西，群众拥护纳吉，但是，罗马尼亚领导人却认为匈牙利的群众是受外国势力操纵的，是被外国电台蛊惑煽动起来的。赫鲁晓夫对此惊恐万状，决定采取行动，但为时已晚。罗马尼亚领导人出来帮他，主动提出同苏联人一起进行武装干涉，表现出华沙条约组织盟国间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牢固的团结。纳吉则向西方国家发出呼吁，并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德治和齐奥塞斯库对纳吉的背叛行为嗤之以鼻，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发生了流血事件。

齐奥塞斯库完全赞成赫鲁晓夫对匈牙利起义的判断，认为起义和纳吉政府都丝毫没有反映匈牙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心愿。但是，有一点却令他不快，这就是赫鲁晓夫不知深浅及他表现出来的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人的蔑视。他们向苏联人提供了军事支援，可是，赫鲁晓夫在马林科夫陪同下来到布加勒斯特时却开玩笑说：“你们罗马尼亚人啊，1919年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真是不合时宜的幽默。但是，罗马尼亚人出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对他并未计较，1956年11月3日的《火花报》告诉它的读者们说，霍尔蒂时期的军官，以及曾在希特勒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士兵和军官在源源不断地潜回匈牙利。11月9日，该报发表文章，庆贺匈牙利起义被压了下去。布达佩斯恢复了秩序，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牢不可破的团结。罗马尼亚可谓善始善终，它作出的最后贡献是，当伊梅尔·纳吉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避难被捕，押解到布加勒斯特时，他们把他扣了起来，一俟卡达尔恢复了秩序，就把他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罗马尼亚人得到了报偿：这一次苏联人很合作，他们承认了齐奥塞斯库的存在和权威。在罗马尼亚内部，匈牙利族人也不甘寂寞，10月下旬，特拉西瓦尼亚的

大学生在克卢日和布加勒斯特举行了游行示威。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罗马尼亚内政部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苏联军队假道特拉西瓦尼亚开赴匈牙利，也使匈牙利族少数狂热分子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齐奥塞斯库的立场是坚定的。同苏联结盟，留在华沙条约之内，对于罗马尼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对付外国特务分子和国内的阴谋家，必须同苏联团结一致。当时，罗马尼亚刚刚揭露了一起由布加勒斯特军事学院几名飞行员策划的阴谋。这些青年军官试图组织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并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对于这些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的异端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但是，乔治乌·德治却表现得较为宽容，只逮捕了25个人，他认为同这些人正面冲突是不明智的，要冒一定的风险。齐奥塞斯库对此是有看法的，但却不说出来。

深刻的教训

说到底，似乎还得依靠莫斯科，得同它保持一致，协调行动，因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布加勒斯特不能孤立无援。但是，也得处处小心。因为，1956年的危机之所以酿成大祸，也是因为苏联领导人优柔寡断，赫鲁晓夫胡作非为，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假如他再坚决一些，早点采取镇压措施，许多严重的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深刻地分析一下波兰的形势，齐奥塞斯库感到心里不舒服。1956年春秋两季的事件中，他对两点感受颇深。第一点是教会对工农群众的影响，它起了极坏的作用，因为它代表了迷信和旧体制

的遗风。作为一名唯物主义的信徒和东正教农民的嫡传子孙，他对天主教本能地予以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东正教的神甫们曾联合起来，反对罗马教廷通过少数天主教徒（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干涉罗马尼亚的内部事务。齐奥塞斯库为之不满并极力谴责的第二点是，1956年波兰的新闻媒介进行了错误的导向。他简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波兰新闻机构和宣传部门的官员控制不住报刊，不能禁止匈牙利事件的消息在波兰传播。

事实上，苏军在匈牙利进行镇压后，波兰的波兹南、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等地的工人们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齐奥塞斯库对哥穆尔卡的所作所为百思不得其解。哥穆尔卡于1956年10月接替奥哈布担任波兰党的领导之后，与苏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谈判，阻止了苏军10月底开进华沙的行动。11月14日至18日哥穆尔卡访问了苏联，对波苏关系进行了调整。波苏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拥有平等的权利，苏联免除了波兰所欠的全部债务，并允诺给波兰更多的经济援助。12月18日，两国又签订了苏军驻扎在波兰西部的协定，波兰的苏联驻军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但是，波兰也获得了某些保证，即没有波兰政府事先的同意，苏军不得随意调动。11月19日，哥穆尔卡回到华沙时，人民倾城相迎，这一天简直成了举国欢庆的胜利日。

齐奥塞斯库在思忖：哥穆尔卡一生坎坷，不可捉摸。在1947年，他就反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因为这个机构只会使苏联对卫星国加强控制。到了1948年，他又拒不谴责南斯拉夫。当时，乔治乌·德治极为不快，因为，情报局开会时正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对铁托横加指责。哥穆尔卡曾因此而丢了官。齐奥塞斯库对这点记得很清楚。哥穆尔卡是以“右

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被从党的总书记位置撤下来的，紧接着又被赶出中央委员会。1951年至1954年间，他甚至被投进了监狱。他为什么没有被处决，齐奥塞斯库就不了解了。只知道他于1956年7月恢复了党籍，接着就是再次的飞黄腾达，到10月份就获得辉煌的胜利。哥穆尔卡深得人心的正是他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一点必须承认。而乔治乌·德治这个人的腾达却是建立在对苏联的忠贞不二之上，哥穆尔卡的升降沉浮反过来能说明德治错了吗？

眼下齐奥塞斯库不急于下结论，他还要进一步思考。每天晚饭前后，他要抽出不少时间看他儿子尼库嬉戏，这个孩子当时只有一岁，胖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齐奥塞斯库的眼睛虽然盯着尼库玩弄的一只木制的大算盘，但脑子里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屋外，斑鸠凄厉的鸣叫，使他心烦意乱，他真想一枪把它们打下来，无奈在布加勒斯特是不准打猎的。对于时局的最新发展，齐奥塞斯库既感到厌倦，又有点为之兴奋。他察觉到民族主义分子与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殊死的较量，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他左右为难，十分费神，甚至感到力不能支。不过，不久之后他又振作起来，将思想理出了头绪。可是，他尚未了解到哥穆尔卡政治生涯中的真谛在于他善于处理共产党同人民的关系，十分重视同胞们的喜怒哀乐和疾苦。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因为，11月初，德治、斯托伊卡和阿波斯托尔就已签署了法令，决定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由于宣传工作卓有成效，有了这项法令，暂时也就够了。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的政治工作是无懈可击的。《火花报》9月25日发表了一篇报道铁路工人生活的上好文章，该报还在第一版上刊登了火车司机们的照片。9月26日又刊登一篇冶金系统斯达汉诺夫式工人

的报道，这位钢铁工人更是光彩夺目。齐奥塞斯库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将那些鼓吹无政府主义、散布享乐思想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在这方面德治是否顶得住呢？似乎不用怀疑。1957年7月，德治乘赫鲁晓夫一时阵脚不稳，从党内清除了两位妨碍他行动的自由化分子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和什西内沃斯基。这事真是轻而易举，将他们说成是安娜·普克的同党，说成是顽固的斯大林分子，就把事情解决了。大伙儿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从分析这个腥风血雨而又动荡不安的时期中，齐奥塞斯库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只要保持头脑清醒，循规蹈矩，有时又要毫不吝惜人的生命，就会成为铁腕人物。他要成为能驾驭时局的人物，经验教训有下列四条：

一、党应该明确地遵从苏共二十大制定的路线，也就是说，党是不该犯错误的。

二、宣传工作应该抓紧，使它深入到一切领域，因为它是保证政治、思想领导的工具。

三、只要苏联的内部危机不危及盟国的领导层，它就是可以信赖的。

四、西方国家不会停止捣乱，但是，它们无法直接干涉，只能像匈牙利那样，假手它们的代理人修正主义分子。

1956年，那些利令智昏的反革命分子以为美国人会出面帮他们，但是，他们的幻觉破灭了，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分子，只配被历史抛弃。倒是该好好考虑一下中国同志的作用，可是，在这一富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上，德治似乎时不时地有所忽略。

天伦之乐

1959年至1962年间是十分忙碌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日子过得很舒适，他们渐渐地习惯了不再担惊受怕的生活。可以说，6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尼古拉在事业上卓有成效，在家庭日常生活上平静安逸，物质上十分优裕，简直是无忧无愁。他们也认为，事情本该就是这个样子。孩子更为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尼库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卓娅也是她母亲的心肝宝贝。惟有1946年收养的瓦连丁（齐奥塞斯库当时收养他使他免于饿死）不甚引人注目，他当时就读于彼得罗·格罗查党的干部子弟学校。该校设在布加勒斯特市郊，环境优雅，空气清新，距居民区不远。那个居民区延伸到了奇斯列夫大街，现代化的住宅鳞次栉比，仅有三四层高，专供高级干部居住。这些高干们享有各种特权，养尊处优，而且习以为常，他们进出特供商店，那里商品充盈，食糖、巧克力等紧俏商品也应有尽有。他们还享有特殊的保健。

他们相互间迎来送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欢度着一个个良辰吉日。露天餐厅散发出烤肉的香味儿，绿树荫下酒桶飘逸出醇和的气息，都令人垂涎三尺。没有人胆敢对德治一班人治理国家的方式提出非议。在这优越的环境中，齐奥塞斯库夫妇为他们的儿子小尼库编织着光辉的前程。这个孩子精力过人。他母亲十分关注他的营养，按科学方法配餐，肉和水果每餐必备，进餐有固定的时刻，定期称量体重，对卫生也刻意追求，有时甚至爱洁成癖。埃列娜刻意对尼库进

行培养，似乎是为了对她自己那不堪回首的童年进行补偿。她的童年是在无情的年代度过的，时局动荡不定，她也忍受了巨大的屈辱。新社会里的这些孩子将同腐朽的资本家们的子弟进行较量，后者会因为被剥夺了天堂而对新社会充满仇恨，他们也会竭尽全力鼓吹西方世界的伦理道德。

齐奥塞斯库夫妇极重亲情。晚上无事，他们经常去看望尼古拉的兄弟尼库·安德鲁塔及其妻子。他住在离音乐家埃内斯库和卡利亚·维克多利亞过去的住宅不远处弗鲁摩萨路的一套极普通的公寓里。他们呆在一起，或者喝上一杯醇香的李子酒，或者喝一杯甜腻的咖啡，悠然自得，其乐无穷。尼古拉的这位兄弟当时相当清贫，甚至有点捉襟见肘。可是他妻子的人缘出色地好，邻居们会毫不犹豫地替他们付上所欠的煤气费。每次见面，尼古拉都会带给他们一些最新的消息。他们因而得悉乔治乌·德治在海莱斯特鲁公园那边的湖畔建造了一座宫殿式住宅，里面有一个宽阔的室内游泳池，有设备齐全的健身房。以此看来，罗马尼亚已堪称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齐奥塞斯库时常兴之所致，俯身餐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安德鲁塔的妻子则时常默默地打量着她的那位身居高位的妯娌，发现她又悄悄地发福了。埃列娜刻意追求衣着的华丽，却不大经心保持其身材的线条。这两位女人经常互诉衷肠。可以想象得出，她们谈论到雅克琳·肯尼迪时，话是不会很客气中听的。肯尼迪总统的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当时正大出风头，俨然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尼古拉绝口不谈他的前程，却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罗马尼亚的新伙伴中国的巨大作用，赢得其亲属的交口称赞。在这一点上，他显现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远大胸怀。

同莫斯科摊牌

当时，虽说德治还未同莫斯科闹翻，但已进行过频繁而艰难的谈判，齐奥塞斯库对此感到振奋。由于莫斯科在1958年撤退了其驻罗马尼亚的军队，布加勒斯特才敢于冒巨大的风险顶住苏联的压力。罗马尼亚领导于1960年开始公开与莫斯科对抗，并认真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建议。那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的五年计划与苏联希望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国际分工的设想发生了冲突。罗马尼亚人坚持要在加拉蒂搞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这与莫斯科的意图大相径庭，因为赫鲁晓夫要将罗马尼亚的经济导向农业，苏联人对这个项目大不以为然。

在这次党代会上，对苏联人不再信任的德治从意识形态方面寻求武器，进行辩护，说发展重工业是列宁早就确定的路线。赫鲁晓夫当时就在他旁边，他没有正面反对这个重工业项目，只是对该项目只字不提，表现得十分冷漠。对赫鲁晓夫的表现，齐奥塞斯库感到十分气愤。早在罗马尼亚实行集体化时，赫鲁晓夫就曾持异议，说它会遭到农民的抵制，从而造成生产下降。罗马尼亚没有妥协，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人则对这个五年计划大加赞赏。然而，德治却反应冷淡，因为他追求的目标是，在继续进行10年前开始的党的建设事业的同时，也要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思想意识与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上的。当然不存在倒退和改变方向的问题。把那些来自农村并已成为一代新人的工人再赶回农

村去是不可想象的。德治在大力吸收新党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人党就是全国人民的党。罗马尼亚对莫斯科不满只限于在千篇一律的讲话中流露出某些反常的迹象。比如说，1960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德治在讲话中不再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齐奥塞斯库未提罗苏友谊。

高级官员们夜晚活动频繁。是不是要出事？放心，不会出事的。德治老谋深算，不会大难临头的。1961年的时候，他还在尽力表现为一个赞成非斯大林化的顺民。11月28日至12月5日的中央全会上，又一次谈到对普克和瓦西尔·吕卡的处分，会上异口同声地谴责了普克和吕卡的斯大林主义行径，说他们损害了罗马尼亚的根本利益。《火花报》全文发表了每一篇讲话，以便教育广大党员。毛雷尔当时对普克尤其严厉，说她是一名反党分子，是在罗马尼亚推行个人崇拜的罪魁祸首。齐奥塞斯库也做了长篇发言，他则恣意攻击普克周围的人，说他们是一伙小资产阶级分子，是野心家、异己分子。他当时用拳头敲击着讲台，声嘶力竭。德治对此虽已厌倦，但却认为这位小个子齐奥塞斯库讲得一点也不错。

1962年，布加勒斯特与莫斯科之间的危机加剧了。6月，经互会召开会议，莫斯科变本加厉，制定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合作中要遵循的新原则，加强经互会的权威，扩大经互会的作用。这也太过分了。罗马尼亚领导动员了一切手段，进行反击：首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接着于1963年春天实行大赦，甚至连那些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也获得减刑；在贸易上向西方国家开放；在政治上向北京靠拢，因为这时中国人也与苏联人闹翻，他们公开大力支持布加勒斯特。但是，乔治乌·德治却表现得很冷

漠，他不想与莫斯科彻底决裂，只是想经过奋争让赫鲁晓夫知难而退。在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发的危机中，他毫无保留地支持莫斯科。1963年4月8日，《火花报》宣布罗马尼亚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齐奥塞斯库慷慨激昂，他也明白德治的作法是正确有效的。但是，德治那冷冷的口气却使他受不了。5月24日至6月5日，苏联领导人波德哥尔内来到布加勒斯特进行安抚，寻求妥协时，齐奥塞斯库表现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一表现异乎寻常，说明他对德治等人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感到不耐烦了。他在奋力抗争，有人说他正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寻求时机，以求一逞。他感到全国人民都支持他。当北京向莫斯科陈词，并在信中专门写了一段罗马尼亚，从而向罗马尼亚表示中国的友情时，齐奥塞斯库真是感激涕零。罗马尼亚的独立性终于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中国人用各国发展独立自主经济的合法要求来对抗莫斯科的民族利己主义。

齐奥塞斯库怀着极大的兴趣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事实确是如此，当罗马尼亚全心全意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莫斯科优先考虑的却是它自己民族的私利。苏联人退缩了，在1963年7月24日至26日的经互会会议上，他们不再提建立最高计划机构的事了。罗马尼亚的表现对于这个强大的邻邦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但是，齐奥塞斯库认为，这一时一事的胜利还远远不够。他要担当天降之大任，要为他战斗的生涯打下新的坚实基础。他正考虑将布加勒斯特的所作所为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他太需要一种教条了，因为，面对苏联的霸权，罗马尼亚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第五章

为国操劳

(1965—1969年)

德治病危^①

1964年春天，命运之神在向齐奥塞斯库微笑。这时他发福了，似乎全身心都获得了自由发展的余地。他正忙里偷闲，暂时处于松弛状态，但准备往更高一层冲刺。周围的人都发觉他友善随和了许多。以往，他对多事之春总是心怀疑惧，不得不随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习性，他是恪守纪律的。然而，这一年春天，他的日子却过得十分惬意，悠闲自得。中苏论战的升级使他既感到紧迫，又感到安全，因此才有了些许闲情逸致。罗马尼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使他有意无意之间感到十分解气。他或许正在摆脱过去的阴影，或许从过去岁月的平庸中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罗马尼亚人的特性。1944年8月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宣传人员和党员征集人，一个不甚显眼的角色，一个轮不到发表个人见解的人。如今，他急不可待地要利用罗马尼亚领导人的解放达到个人解放的目的。

这时的德治，已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他那宽阔的额头失去了红润，面部皮肤失去了光泽和弹性。他失去了大刀阔斧的魄力，不会再有大的作为了。他身边的那几个人，如阿波斯托尔和斯托伊卡也没有大的长进。他们养尊处优，享尽特权，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打打猎，游游水，满足于在喧闹的晚会中周旋，思想也僵化了。他们习性相同，忧乐与共，嚼着大鱼大肉，说着一些老掉牙的粗俗笑话。他们还热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衷于炫耀过去的业绩，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早已失去活力的革命历史。实际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把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理论化的工作，为齐奥塞斯库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遇。他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很深的造诣，但却很有战略眼光，也善于运用策略，不失时机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强大武器。这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它会让齐奥塞斯库跻身于现代化的行列。齐奥塞斯库一下子发现，他原来首先是一个罗马尼亚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这一发现使他精神振奋。过去一直认为齐奥塞斯库唯唯诺诺、冷漠无情的人发现，他也很有胆识，很有热情。

1964年4月15日至22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个理论性文件，阐明罗马尼亚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的地位。齐奥塞斯库坚持认为，文件应明确重申独立的原则，否则，罗马尼亚就有沦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德治则认为，通过这样一个声明只是一种策略，以免莫斯科与北京和好如初之后莫斯科再次控制布加勒斯特，而且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也给莫斯科一些必要的限制。两个人的最终目标一致：保证罗马尼亚有一个独立的发展战略。这一点是神圣的，毋庸置疑。那个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和各兄弟党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莫斯科与各党之间不应再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时期那种关系。只有党和人民、党和民族之间才应有这种紧密的联系。全会期间，齐奥塞斯库其人虽然远离他的故乡斯科尼切什蒂村，但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反映了罗马尼亚小农的意识，即希望社会进化发展、公平合理。他认为，工人党应该反映这些正义的要求。当时，罗马尼亚领导层正在竭尽全力捍卫多极化的理论。齐奥塞斯库的理论修养虽然不高，但也

本能地赞成这种多极化的理论。4月份党的全会上通过的那个文件，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提到，每一个党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自己国家建设的具体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各国不同的实践中去，创造性地总结研究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经验。文件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写道：“任何一个党都不拥有，也不该拥有将自己的路线和观点强加给别的党的特权。”齐奥塞斯库高兴极了，他认为，关键之关键是不能允许强权政治存在。他曾经远离权力的中心，感到倍受压抑、屈辱。只有承认、完善、强化党的独立自主，他自己的生命才有意义，才会获得应有的尊严。党是他的一切，是他的世界、他的社会、他的目标、他的生命。如果没有党，他至多不过是一个农家子弟，或者是巴尔干小国首都的一名小官吏、小工头、或者其他。就是在一个卫星党中，也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小党徒，只配提心吊胆，唯命是从，委屈求全，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1964年4月，齐奥塞斯库正在潜心钻研民族历史，心里渴望一鸣惊人。他热衷于开放，眼界更宽了，他周围的党的活动分子也庆幸再次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丝毫不留恋国际主义，因为，国际主义意味着莫斯科拥有一种凌驾于别国之上的地位，而他，齐奥塞斯库，只有唯命是从。1964年4月的声明正中他的下怀。他视执行独立自主路线为己任，因为，这样的路线将给像他那样的人带来幸福和社会公正。他再一次仔细地、不动声色地分析了形势。那些对他没有好感的人将他的沉默归于狡诈，而喜欢他的人则认为这正是大智大觉的象征，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在罗马尼亚，人们对神秘莫测怀有极大的崇拜，他们认为，越是少言

寡语的人，越蕴藏着惊人的意志。1964年末是一个多事之秋，人人都保持着警惕，互相防范。德治对时局也不大放心。他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他们大都是在1950年和1956年至1958年间被关押的，他们对党的宽大处理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到处诉说他们在狱中的遭遇，给现政权抹黑，甚至使政府丧失民心。德治在反躬自问：向人民的敌人提供攻击政府的口实是否值得？此举是否明智？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电台，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正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揭露阿尤德、格尔拉及皮特斯蒂等监狱内施行酷刑，虐待政治犯。齐奥塞斯库对这些指责充耳不闻，让那位铁腕人物，内政部长德拉吉奇去处理吧。他认为，只要有需要，监狱的大门随时都可以打开。他看到，因为释放了这些政治犯，一部分罗马尼亚人精神上负担大为减轻。要执行独立的、民族的政策，就要将那些还在观望犹豫的人们也团结过来。他也想到过，这些在铁窗后面度过了艰辛岁月的人们，即使重获自由，也会一直心存恐惧，对于重新获得的自由，他们会无比地珍惜，不至于再惹事生非。像以往一样，齐奥塞斯库对力量的对比又进行了正确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与其花时间去纠缠是否应该打开监狱大门这样的细枝末节，不如集中精力观察德治的变化。

继承德治之位

事实上，德治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1月份的病情报告说他的肺已受到感染，情况糟透了。他自感胸部憋闷，呼吸短促，连续咳血。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颂扬德治与疾病搏

斗的巨大勇气。但是，在内心里，齐奥塞斯库同其他人一样，都在等着他完蛋。他们达成了默契，对普通百姓封锁第一书记病情恶化的消息。他们任凭谣言四起，因为人心惶惶对他们十分有利，这可以让人们更感到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党政领导人都围着那个病人膏肓的人转，向他表示忠心。德治自己也非常想活下去，十分留恋到那时为止还属于他的那个奢华的世界：布加勒斯特豪华的宫殿，黑海岸边消魂的夏夜，金色的落日，卡尔帕特空气清新的行宫，还有那热闹非凡的狩猎场面。死神将把这一切都从他手中夺走，他对此十分气恼。他也知道一些对他的病情的传言，有人甚至恶毒地说他是受了苏联人的放射性照射。其实，医生已确诊他患的是肝癌，一种绝症，抗争也无济于事，但是，德治仍不甘心，还要抗争，拼尽全力去抗争。春天，死神就在招手；但他要维护他的尊严，面子重于一切。1965年3月19日，大国民议会开会，他没有在主席台上出现，但是，他向议员们写了一封满怀激情的信。德治要光荣地离开人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和国务委员会的另一位副主席阿波斯托尔出席了大会。当天，《火花报》刊出了一篇公告，说德治患了肝功能严重失调症。可是，翌日的报头上，黑色框框里出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德治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接下来，报上发表了讣告，同时发表的还有对德治丧事的安排。党中央委员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布：德治同志在身患重病久治无效后，于3月19日17时43分离开人世。人民群众终于获悉真相。国葬日定在3月24日。3月19日至24日为全国志哀期。负责治丧委员会工作的是斯托伊卡、德拉吉奇和波德纳拉希。国葬仪式组织得十分隆重、周密，寄托了人们对死者的哀思，

显示了对死者的敬重。自3月20日起，老百姓们就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举行悼念活动，还被允许去党中央委员会参观、凭吊德治用过的办公室。那几天中，进出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人都泪流满面，但心里却充满好奇，神经也高度紧张。德治用过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代表着他的遗愿。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为罗马尼亚工业化所做的贡献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办公室外，人们排着长队，静静地等待着。这一天显得格外漫长。但是，初春的天气，虽寒亦暖，放下每日例行的公事，到户外松松筋骨，换换空气，倒也不是坏事。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对于排队早就习以为常了。在整个治丧期间，最重要的活动要算3月21日至23日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宫向德治遗体告别。

在中央委员会驻地守灵的人当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垂臂肃立，双手笨拙地张开，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他就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站在斯托伊卡、德拉吉奇、阿波斯托尔和波德纳拉希之中。“这些人就是德治的继承人。”人们窃窃私语，一些了解内幕而又头脑清醒的人这样评论。继承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因为国家不能一日无主。事实上，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就召开了全体会议，在政治局的举荐下，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对于这一消息，广大群众漠然置之。他们所关心的是，自1964年以来罗马尼亚国内出现的轻松气氛能否继续下去。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斯托伊卡被任命为中央书记，辅佐齐奥塞斯库。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危机过去了，也未出现悲剧，现在可以隆重地安葬德治了。安葬仪式定在上午11点，地点是共和国广场。仪式结束后，送葬的人们缓缓走向英雄纪

念塔。该塔是为缅怀那些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们树立的。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参加葬礼的有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法国的代表是邮电部长雅克·马雷特。11时正，全罗马尼亚所有的工厂、企业停机3分钟，布加勒斯特市的交通中止，在全面静止了的城市中心，鸣放礼炮21响，向死者致最后的敬意。隆重的葬礼激励着齐奥塞斯库，他信心百倍，激动万分，自感完全有能力担负起新的重任。他没有在意同事们哭肿了的双眼。他心里明白，处在死了人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人们由于劳累、忧伤、紧张种种因素，控制不住眼泪是可以理解的。他虽然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在送葬的队列中，但内心却极不平静，“德治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新一页就要开始。”他想。

对于那位刚刚逝世的人物，人们又有何了解呢？几乎毫无所知，或者说知之甚少。罗马尼亚电视台现场直播了隆重的葬礼，千家万户都以好奇的目光观看了现场报道。那个蒙黑面纱，足登鞋跟像锥子一样的高跟皮鞋，费力地走在送葬队伍中的女人是谁？她就是德治的女儿丽佳，她曾以扯不清的感情纠葛而闻名于世。据说她嫁给了一位经济学家。丽佳的母亲又是谁呢？人们都在搜寻她的名字，但都茫然。官方悼念德治的公告里，对此只字未提。对于德治，人们只保留了官方的、公开的形象，即从他出版的演讲集、从在克鲁日和布加勒斯特市树立的雕像、从设在布加勒斯特市博物馆内用来缅怀这位革命战士和党的书记的丰功伟绩的特殊展室得出的印象。对德治的纪念是庄严的，但也是无声无息的。至于他的私生活，丝毫未向公众透露。

跻身于权贵之列

对于齐奥塞斯库，人们知之更少，只知道他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仅此而已。时至今日，在报刊上得到大肆宣传的也只有德治一人。齐奥塞斯库尚未获得受到推崇的机会。但是，他却早就是建党和征集党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了。德治作古之后，齐奥塞斯库及其家人可以放手大胆地干了。首先要改变的是他一家的生活方式，他搬进了专供权贵们居住的豪华住宅区，住在一座由白色大理石装修得富丽堂皇的花园洋房中。房前一字排开地停放着一辆德国产的黑色奔驰高级轿车和两辆美洲豹牌汽车。房子四周是宽阔宁静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栽种着整齐的法国梧桐和橡树，更衬托出洋房的华丽。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很少呆在家里，他得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至于埃列娜，这时正在科学院副院长西莫尼埃斯库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化学。她对化学简直着了迷，认为只有掌握化学，才能征服大自然。尼古拉的青云直上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因此，她处之泰然。可能是为了显得更加庄重，她刻意修饰起发型来，把垂在她那并不十分迷人的鹅蛋脸两侧的秀发也烫起了微微的波浪。

时值 1965 年，齐奥塞斯库对他手中的王牌了如指掌。他清楚地记得，他在国防部工作时，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人主克里姆林宫的年代里，他周旋于德治一伙和苏联朋友之间，当时用的就是这些王牌。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一旦核心人物消失，其追随者们就会进行无情的夺权斗争，这时，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运用自

已已有的地位，或借助于军队，或借助于工会，或借助于党的组织。在罗马尼亚，他的真正对手是阿波斯托尔和斯托伊卡。阿波斯托尔控制着工会，他喋喋不休地强调党要和工人阶级保持血肉关系。至于斯托伊卡，他始终以德治的继承人自居。当然，还有一个毛雷尔，他所依靠的是他早已拥有的显赫地位和十分好的人缘，西方新闻媒介十分看重他。而他，齐奥塞斯库，则很少被西方报刊提到。不过，西方报刊往往乱点鸳鸯。西方人不是曾将波德纳拉希看成是莫斯科的人吗？他们早就不这样看了，说他也放弃了斯大林主义，好像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说变就可以变。齐奥塞斯库发现，人们对他很了解。而对他来说，这正是极好的机会，可以加以巧妙地利用。他对那些贬低他的流言蜚语一笑了之。有的传言说他在集体化初期十分残酷，有的说他在多夫塔纳和特尔古日乌没有起什么作用，好像他被关进铁窗只是因为犯了普普通通的刑事罪。人们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恰恰是件好事。正是因为人们对实际情况知之甚少，或者干脆一无所知，他才可以完全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形象，确立自己不同凡响的使命，创立一种全新的工作作风。他被德治的追随者推上了党的第一书记这个关键性的岗位。但是，历史已发展到 60 年代，他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即在安东内斯库时代出生的一代新人正在长大成人，无论是他们投身于共产主义制度，还是摈弃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制度的真谛。这一代新人缺乏对 50 年代政治风云变幻的体验。他们所希冀的是，不要再回到他们父母经受过恐怖时代，而要生活在使他们可以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晋升和幸福

的国度里。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十分幼稚，而在技术方面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希望通过入党来达到升官和发财的双重目的。而这时候党的要求与他们的期望也是不谋而合的。他们对政治说教早已习以为常，曾十分顺从地上完了马列主义课程，显得顺理成章，毫无勉强之意。他们在各方面已经成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政府要求他们投入的国家建设与和平事业中去。从孩提时代起，人们就对他们灌输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残酷无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他们无论是当工程师、技术员，还是做政府官员，个个都野心勃勃，但又不会忘乎所以。政府完全能够控制他们，利用他们。假如他们一时心血来潮，想买一条牛仔裤穿穿，买一包肯特烟抽抽，或者买一块瑞士巧克力开开洋荤，他们完全可以在黑市从玩得饶有兴致的外国游客手中换到外钞，从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少数商店里购得这些奢侈品。他们大都出身贫寒，没有什么根基，但又不甘心终老山林。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会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个带给他们无限前途、帮助他们免遭过去的厄运的人去闯天下。齐奥塞斯库即将提出的宏伟计划很能迎合他们的胃口。齐奥塞斯库将使用一种全新的语言，设法将他们调动起来。在这样一种时刻，将自己的过去一笔抹杀，至少是进行低调处理，就十分有利了，更何况任何人对他的过去都不重视。齐奥塞斯库不是建党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实干家。投奔在他麾下的人们，忘记了充满陈词滥调的教条主义说教，被新任第一书记的热情所感染，都庆幸有了年轻一代的领袖。诚然，阿波斯托尔和斯托伊卡都比齐奥塞斯库大不了几岁，但就这几岁之差，他们就被划到老战士的行列。由此可见，齐

奥塞斯库很会以己之长击人之短。

作风革新，教条依旧

这时，齐奥塞斯库深感忧虑的是时间。留给他的时间不是很多，他得赶快行动。西方舆论将德治之死说成是罗马尼亚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这一点对齐奥塞斯库十分有利，可以说西方舆论在间接地为他服务。这使他有可能将一个换汤不换药的纲领说成是全新的纲领。齐奥塞斯库从未产生过放弃其政治信条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念头，他对自己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即便他想进行一些变化，那也是他认为有必要变化手法，才能使全国人民都赞同他的斯大林式的国家建设计划。他将这一点看成亘古不变的信条。他被授权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将在1965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自我表白的绝好机会，是一个进行试探的绝好机会。党和政府的班底将大会准备得井井有条，又有许多外国高级代表团将来参加代表大会，此外，大会还向西方记者开放。凡此种种，对他十分有利。西方的记者们表现得很是友善，因为西方的人士一直在追寻他们认为是改良主义，是共产主义集团裂缝的东西，他们认为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应归入这类。《世界报》特派记者7月23日强调说，允许资产阶级记者采访罗党代会是史无前例的。罗马尼亚党内对这一点也人人皆知，并且以此相嬉。

对于这一创举，齐奥塞斯库颇为沾沾自喜，他就是打破常规。他心里一激动，就会言阻语塞。过去就有人说他是

一个蹩脚的演说家，经常词不达意，加上嗓音沙哑，呼吸短促，经常断错了句子。可是，他又热衷于当众讲演，也爱玩弄字眼，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心里知道有些人看不起他，有些人对他充满怨恨。但是，他却有办法制服他们，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兴风作浪。只要这些人缄口不语，他就可以孤芳自赏了。党代会的主席台上，装点得五彩缤纷，巨幅标语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气氛烘托之下，他可以尽情地发挥了。只见他用力地挥舞着双臂，好像随时准备将想象中的敌手撕成碎片。他挥舞双臂的姿势富有特色，身躯和双肩绷得僵直，只有双臂上下舞动。这是一个进攻性极强的人，一发表演讲，就会忘乎所以，随时准备接受来自各方的挑战，并以此获得心理的平衡。这是一头政治动物，他尽力使掌声不断，掌声会使他振奋不已。他也在千方百计表明，现在已不再是一个过渡时期，他，齐奥塞斯库也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要打破德治创下的纪录，即统治的时间比德治还要长。党代会大厅里没有装空调器，实在令人闷热难熬。但是，齐奥塞斯库却尽力克服着，滔滔不绝地讲着，尽情地发挥他的思想。而在大厅之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布加勒斯特的公园里，老人们三三两两，悠闲自得；无忧无虑的少年儿童，追逐嬉戏；热恋中的情人们相视而笑，悄声细语，但却没有任何亲吻拥抱的举动，因为在罗马尼亚是禁止在大庭广众下亲昵的。在火车站，来自乡下的一群一群的农民，手里提着包袱，行动迟缓。整个世界好像都在那早已习惯的慢节奏中运转，谁也想不到就在几百米以外的一个大厅里，有个其貌不扬的人正挥动着双臂，在重新塑造他们的命运。

这位在不久前刚晋升为第一书记的中央委员讲了些什么

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是，大厅里的人们，却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通过他的报告，每个人好像都从中发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每个人又都好像明白了共产主义事业伟大之所在。其实，这些人早已被翻来覆去的宣传弄得麻木不仁了，随时准备为演说者鼓掌欢呼。他们个个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可能是因为台上的这个报告人没有违背他们的思维方式，不过，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报告人也把宝押在了这些人的意识形态背景上，并对这种意识形态注入新的活力。齐奥塞斯库手里拥有一件强大的法宝，即他可以使用胜利者的口吻说话，这与当时的经济成就相适应。由于有了这些经济成就，他才可以大夸海口。《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对于这种万众一心，不可一世的气氛颇有感触，他写道：“代表大会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罗马尼亚党的领导，这时比其他任何一个当政的共产党，甚至那些比它大得多的党的领导，更为团结，更为步调一致。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的党在总体上来说，也比别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党更有组织，有纪律。”

齐奥塞斯库的报告简明扼要，它从生产力新的巨大发展这样一个得到公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引出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全社会发展的结论。在此，齐奥塞斯库完全接过了斯大林的模式，当然是以其特有的语言赋予它齐奥塞斯库个人的特色。他以极其明确的语言说，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重工业。他的这个观点，一点也不使人感到意外。为此，他也提供了实例，比如1965年的发电量就是1959年的两倍。然而，一些研究发展前景的战略家们，对齐奥塞斯库的观点感到极度不安，因为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对这些意

见，齐奥塞斯库是一点也听不进去的。他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办到的。罗马尼亚农民梦寐以求的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可是，党不是也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化了吗？为什么要违背老百姓的意愿去搞集体化呢？因为集体化是合理利用土地和推广农业机械化必不可少的条件，集体化是科学推论的结果。正是依据科学的推论，党提出了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而实现这一计划的手段就是国家投资。因此，决不允许有些许的懈怠。听他讲话的口气，齐奥塞斯库俨然是一个铁腕人物。诚然，大力颂扬集体主义和忘我精神，颂扬敬业精神，并不是齐奥塞斯库的独创，但是，他却拥有将枯燥的生产计划变成激励人们的口号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的报告一气呵成，不容人有一时一刻的喘息，听这样的报告真不轻松。假如说，在他列举一连串的统计数字时人们还可以走点神儿的话，紧接下来，齐奥塞斯库开始批评指责时，可就得全神贯注了。当然，这些批评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因此，不必担心有人遭到清洗。齐奥塞斯库批驳一些错误思想，并不是要追究执行者的责任，而只是要使人们振奋起精神来。进行自我批评，或者集体检讨，不会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真是聪明绝顶，往往先声夺人，他说：“有的同志会说，我们既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什么还要谈论那些不足之处呢？是的，同志们，在所有的领域里，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向党、向全国人民坦诚地指出我们工作的某些不足，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齐奥塞斯库的态度十分诚恳，人们大可放心。当然，有个别党员对他的说

教有点厌烦，但是，恢复优良传统总是好事。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这位第一书记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他言词尖酸刻薄，口气十分强硬，谈到农村时，不乏刺耳之语，有的使人感到难堪，不过，这正是他追求的效果。他说，出身于农村的那些同志，应该抛弃愚昧迷信和陈规陋习。齐奥塞斯库早就获悉，那个不可一世的波德纳拉希一直在帮助其故乡布科温。但他认为这种帮助并不得体，因为许多物资钱财落入了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手中。所以，他才直言不讳地宣布：“只有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创造条件，改变千百年来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局面，缩小城乡差别，将农村的文化和观念提高到城市的水平上来。”为了使他的讲话顺理成章，齐奥塞斯库旁征博引，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是人民多年的愿望，也是历代进步分子追求的目标。他把自己标榜成1848年革命和19世纪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衣钵传人。谁胆敢说农村不需要现代化？谁又胆敢说农民心甘情愿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受疾病的无情折磨？他进一步解释说，只有外国资产阶级、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才希望罗马尼亚永远落后下去，以便它们掠夺它的财富，奴役它的人民。真是一语击中要害，代表们顿时个个义愤填膺。说到帝国主义，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被美国侵略军的战火夷为平地的越南村庄。由此可以推论出：爱国，就要反对外国对本国的统治，就要实现工业化，就要像劳改犯一样拼命地工作，而不去享受应有的假期。爱罗马尼亚的农村，就

要使农村实现现代化。齐奥塞斯库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参数，以便进行今昔对比，所谓的“昔”，就是1938年，就是同英、法结盟的时代，也就是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时代。齐奥塞斯库真是一名优秀的鼓动家，他许诺说，五年计划实现后，我们在24天内的产值就相当于1938年全年的产值。他又进行了横向比较，即拿罗马尼亚同发达国家比较，他不无自豪地说，在发达国家中，大部分的劳力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在罗马尼亚，1970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0%，而在1938年，它曾占78%。用过去同未来比较，用本国同外国比较，这一手用得很妙。为了实现从过去到未来的过渡，为了赶上外国，就得提高劳动效率，就得拥有德才兼备的干部。难道这是一些陈词滥调吗？是又要发动一次斯达汉诺夫运动吗？当然不是。齐奥塞斯库的这些话，是讲给知识分子听的，讲给工程师、技术人员们听的，他要取得他们的合作，他实在是太需要这个阶层了。

尽管会议大厅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报告人却仍然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听众们也聚精会神。齐奥塞斯库对一些陈词滥调运用得很自如，每提到一个情况，总要借题发挥一下，论证一番，紧接着话锋一转，便又回到正题。补充几句，是为了使论证更加完善。他的听众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对齐奥塞斯库描绘的宏伟蓝图，他们自然会全盘接受。国家制度的这项投资政策必然使重工业获得巨大发展，但其代价将是牺牲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不过，这些人都不会反对，因为，作为党的干部，他们有特供商店，他们的利益丝毫也不会受到损害。接下来，报告转入另一话题，也是人们久已期待的话题，即民族、国家和党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这位年轻的第一书记也大获全胜。德治的老战友们将身子埋

进了扶手椅里，有的人甚至漫不经心地掏出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珠。齐奥塞斯库使用了一种无可挑剔的语言，同1964年4月的宣言精神完全相符。他说：“民族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符合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与国际主义也并无矛盾。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国际主义，符合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对于德治的这位继承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论述了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能，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因为，这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得到了保证：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职位可以自由交流。到此为止，大会对他一直是支持的。齐奥塞斯库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要提交大会裁决。他建议更改党的名称，将工人党改成共产党，这样一改，似乎人们的政治觉悟一下子就提高了一大截。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因此，代表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齐奥塞斯库宣读的这个长篇报告，不是出自他个人的手笔。无论是对过去的回顾，还是对未来的展望，都是德治留下的一班人的杰作。这些民族主义的斯大林分子们已经成熟了。时值1965年，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提远大目标，以便对早已变得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人民群众，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并进而唤起他们的信赖。齐奥塞斯库本来就爱好别出心裁，这促使那些民族主义的斯大林分子们加快了步伐。他们认为，这位第一书记年纪轻轻、文化程度有限，可能便于驾驭。他们还认为，这个人能力不强，既缺乏毛雷尔的魅力，也缺乏德治的境界，更没有波德纳拉希的纯朴，因此，平庸的齐奥塞斯库就成了当时的最佳接班人的入选。那位与德治长期共事，并共同制定了1964年党的纲领的毛雷尔心里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德治的旧班底在1965年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这部宪法替代了1952年那部早已过时的宪

法。新宪法的关键是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赋予人民代表以更大的权力，加强大国民议会的地位。但是，尽人皆知的是，大国民议会议员的候选人是由党提名的，而且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有许多人同时又是议会议员。党真是无孔不入，早就渗透进了议会。齐奥塞斯库牢固地掌握了党的基层组织，甚至中级干部。在这个类型的民主化进程中，他如鱼得水。作为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他拥有足够的手段，在合法的外衣下将个人意见溶进人民参政的过程中去。

深入群众

1965年夏秋之交，他经过周密的策划，开始巡视各地，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目的是将工农群众、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团结在自己身边，这是实现全国协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段时间他很刻苦，有时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进行准备。他视察了特尔古穆列什的一个化肥厂，向工人们发表了演讲。他善于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他又来到克鲁日大学，那里汇聚着匈牙利族的许多头面人物。他的话言简意赅，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得很透彻，而且既富有哲理，又很实在，受到了听众的高度赞扬。在公众眼里，德治只是一个酒鬼，而齐奥塞斯库则是一个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人。他和他的妻子埃列娜都对科学崇拜得五体投地，渴望运用科学改造大自然，改造全人类。这虽然是出自他们的激情，但也富于理性。因而，于1965年12月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埃列娜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

齐奥塞斯库有一种强烈的统治欲。到全国各地视察很快

便成了他不可或缺的活动。他不大喜欢自己的同僚，却很喜欢群众，很高兴看到群众脸上露出的笑容，陶醉于向他伸来的——一只只粗大的手、被举得高高的孩子和一束束鲜花。只要置身在人群之中，他就感到十分轻松、惬意，就会暂时将猜忌、烦恼抛在脑后。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人们都说他很勇敢，又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事实上，他是热衷于游山玩水的，而且，每一次都做到了万无一失。他要经过的每一段路都进行检查，活动时间也经过精细计算。每次都有警车开道，他乘坐的车子在警笛呼啸声中飞驰而过。他的司机技术娴熟，而且全神贯注，但齐奥塞斯库还是不停地催他开得再快些。他的奔驰轿车性能良好，不愧为世界名牌，他对它十分满意。

只是在1965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对莫斯科的访问中，毛雷尔才看透了齐奥塞斯库的为人，他毫无谦恭的气度，也缺乏温良的品格，而是一个权欲熏心、贪图享乐，又十分工于心计的人。毛雷尔自认够圆滑的了，而站在齐奥塞斯库面前，也自叹弗如。他发现齐奥塞斯库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在那次访问中，除了莫斯科之外，罗马尼亚代表团还驻足伏尔加格勒和列宁格勒。当时代表团组成人员有阿波斯托尔、比尔拉德亚努、两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曼内亚·曼内斯库和尼库列斯库——米奇尔，还有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整个访问期间，齐奥塞斯库兴致一直很高，他在列宁格勒发表了演说，以纪念苏、罗反法西斯共同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伏尔加格勒，他却将他的对手阿波斯托尔推出来讲话，因为他深知，在这个城市里，再发表类似的讲话，在罗马尼亚引起的反响就会适得其反。因为，在二次大战期间，许多罗马尼亚人同德国人一起将性命送在了

那里。他的手腕真够高明，不过，这一点并未能逃过他同事们的眼睛。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1965年金秋，全国普遍加了薪，人民大众安居乐业，他们对第一书记那生气勃勃的形象早已适应，甚至有人说他品格高尚，只是有时显得不太热情，但是，这后一点可能是因他不苟言笑所致。各界人士对第一书记的表现均感宽慰：科学家们获得了进一步的许诺；爱国者们听到了他那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讲演。精心编排的出版物提醒人们牢记罗马尼亚民族历史上那些不朽的业绩。特别为军队创办的《军队生活》杂志出版了印刷精良的专刊，颂扬独立战争和1917年的革命战争，文章介绍了两次战争的背景，并附有插图。知识分子也感到满意，作家联盟内的气氛不再那么沉闷，官僚主义的控制放松了。可以创作和发表一些著作，介绍和研究新小说，也可以发表一些毫无教育意义的荒诞小说和梦幻小说了。作家们享受到了更优裕的生活条件，埃莱斯特拉乌湖边的俱乐部，山上的疗养院供他们尽情消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大学里，文学批评也十分活跃，不过，大学生们对自己的权利尚不明确，仍在论战的道路上摸索，这是在做梦吧？进步的、人道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道路真的出现了吗？那些头脑保持清醒的人们，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东方阵营，也曾出现过别的“春天”，但都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对苏联和其他国家非斯大林化幻想之后的残酷镇压，许多人仍记忆犹新。齐奥塞斯库也觉察到了这种气候，不过，他要任其发展下去，因为，为了实现他那宏伟的计划——把罗马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的样板，他需要全国各阶层的归顺。他正在惊涛骇浪中扬帆，必须小心翼翼，随机应变。对于知识分子，他并不担心，因为

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成不了大气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

道德秩序常在

气氛的缓和不等于放任自流，道德秩序还得维护。完全放弃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罗马尼亚国内形势的发展就连西方的某些观察家也未想入非非。1967年，《世界报》特派记者米歇尔·塔图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当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又使气氛变得沉重。”对齐奥塞斯库强迫人民劳动，米歇尔·塔图十分敏感。1967年5月，政府发布命令，严格劳动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上班铃一响，就有人到咖啡厅巡视，看看是谁还在浪费宝贵的工作时间，他们要受到必要的处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先签到簿上写下上班时间，再在班上大吃大喝，不过，对于那些偷闲耍滑和私下大发牢骚的人，当权者也另有办法加以严密监视。

政治上的这一严厉措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齐奥塞斯库是否了解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同僚们对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有时不过暗笑而已。他们心里很清楚，任何严厉的手段都不能将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变成勤俭持家的能手。看起来，齐奥塞斯库并不十分了解一个企业或一个机关是如何运转的，而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的阿波斯托尔对齐奥塞斯库的措施则不无嘲弄。但是，一旦涉及到社会风气，领导层还是一致赞同了第一书记的看法。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护人民，免得他们染上西方传过来的恶习，留长发，穿超短裙，伤风败俗。连从法国和联邦德国来进行文化交流的留学

生也被要求“着装整齐”。社会上的健康力量应该得到保护和加强。当然，领导人的子女拥有某些自由无伤大雅，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到了关键时刻，他们还是靠得住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吃喝玩乐时，当权者就眼开眼闭，视若无睹。然而，对老百姓，则必须加以引导。在道德教育这一领域，埃列娜表现得十分坚决。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她全力以赴地支持丈夫的这场不甚得人心的战斗。

1966年11月，人工流产也被明令禁止。尼古拉和埃列娜对于童年时期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记忆犹新。当时，女工们为了将不想要的孩子弄掉，往往不得不求助于那些医术水平低劣、环境又污秽不堪的接生婆，结果深受其害。从今以后，这惨不忍睹的种种恶行将从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孩子们是罗马尼亚民族力量之所在，罗马尼亚有能力将他们个个培养成人。更何况，如果罗马尼亚的小公民不源源而来，茨冈人就会繁衍成灾，而在齐奥塞斯库夫妇心目中，这些茨冈人无异于“狗崽子”，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真是讨厌透了。禁止流产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保护家庭稳定。离婚变得更加困难，花费也越来越大，使人望而却步。另外，为了保护健康，政府还建议人们少吸烟，还为此发动了一场运动，特别禁止在咖啡厅和其他公共场所吞云吐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他的这一系列措施很是自鸣得意，他正以人民的救星自居。他认为，即使当时有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过后，人们会对他感激涕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越战越勇。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正在走向权力的峰巅，他要追求更高的效率。他认为，一些十分重要的计划、措施，之所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因为党和国家的权力中心过于分散，

他简直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要想提高效率，就得一个人说了算。1967年10月，在党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这个问题终于提出来了。当时，基伏·斯托伊卡提议将党和国家的领导责任结合起来。只有齐奥塞斯库有资格担任党政双重职务。因为国务委员会是由大国民议会选举的，这就使他得以监督最高行政长官的任命、军事机构的设置、国际条约的批准。他领导的国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是由大国民议会任命的，这也至关重要。因为，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在最高层的合而为一，对基层政权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一般来说，每个市都有一个市长，而这个市长同时又是党的负责人。齐奥塞斯库被历史推拥到了政权金字塔的顶端，正是基伏·斯托伊卡全力促成了这一局面。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酬劳，相反，作为党中央的书记，他不无辛酸地发现，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从他手中飞走了。因为，不久前，在齐奥塞斯库的倡议下，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经济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同时受党和国家的双重领导，即齐奥塞斯库个人领导。

剪除异己

厄运正降临到齐奥塞斯库对手们的头上。首当其冲的是阿波斯托尔，他被解除了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因为他碍手碍脚，处处以德治的继承人自居，齐奥塞斯库再也无法与他共事了。另外，埃列娜对他也十分反感，认为他生活作风轻浮，因为这时他已同他的结发妻子离婚，而与一名歌星生活在一起了。他失宠了，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部长。

1968年4月，轮到德拉吉奇倒霉了。4月22日，党中央又召开全体会议，德拉吉奇就被怒潮卷走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出来吁请人们捍卫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矛头直指这位内政部长。因为在此之前，不少群众抱怨这位部长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来信从来都予置不理。齐奥塞斯库慷慨激昂，令人胆寒。他运用又打又拉的手法，牢牢地操纵着会议。当然，他也向大会介绍了各方面的情况，说青年们正在奋发图强，当然还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军队也在重振雄风，国防部长伊奥尼塔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齐奥塞斯库一年前采取的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罗马尼亚自己军火工业的发展、进口的明显下降说明了这一点。客观气候对齐奥塞斯库十分有利，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同德治划清了界线，为被他的这位前任残暴清洗的人们恢复了名誉，洗雪了冤屈。他宣告，爱国者帕特拉斯卡努是无辜的，他的死是由德治及其谋士德拉吉奇的错误造成的。全场欢声雷动，因为大家都清楚，帕特拉斯卡努并不是什么英、美特务，确实是因为德拉吉奇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才于1954年4月16日的夜里在日拉瓦监狱被处决了。德治过去的战友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齐奥塞斯库终于把他们镇住了。

清算德治，击败德治的信徒是一回事，让全党惧怕又是一回事。清除罗共头面人物的同时，齐奥塞斯库必须让全党对他俯首听命。好在党的中层干部训练有素，也就是说，他们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始终惟上司之命是从，因此，齐奥塞斯库根本用不着进行大清洗。全会结束的次日，他就决定亲自向布加勒斯特的党组织进行传达。他向他们讲解了为什么在德治的时代会犯下那些罪行，那个时代又为什么已经成为过去。他说，当时之所以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因

为有些人在耍阴谋诡计，他们密谋策划，制造出了种种假案、错案。齐奥塞斯库允诺，他将实施一种全新的领导作风，增加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党员们担心被清除出党，并株连到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失去上学和度假的权利，因而个个对他俯首贴耳。这位第一书记耍了个手腕，将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与那个他在其中干了将近 20 年的、犯下了累累罪行的领导班子划清了界限。但是，这个 4 月也不无苦涩，只是大家都缄口不语，默默地改换门庭。申请入党的人猛增，仅 1968 年 3 月至 1969 年 3 月的一年间，党员人数就净增 10 万人。党员中知识分子的比重也在增大，由 1964 年的 9% 增为 1968 年的 23%。

1968 年 5 月，齐奥塞斯库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在搞臭德治及其战友的时候，也造成了一种权力的真空，并进而将德治时代残留的精英们收罗在自己麾下，为己所用。他要大展宏图，让因在德治统治时犯过错误而忐忑不安的所有人转过来对他无限忠诚。他手里拥有一张王牌，这就是党早已渗透到国家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他地位显赫，又有了建立新秩序的资金，改朝换代的任务完成了。

知识分子的归顺

毋庸讳言，气氛是轻松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德治过去的亲信们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和权势，因为，一旦遭贬，一切就会化为泡影。德治的心腹和亲属都离开了政治舞台，德治的女儿再也未抛头露面，布加

勒斯特有传言说，她丈夫放弃了他的经济学家职位，虽说还上班，但却不大做事了，只关心杜纳雷阿餐馆附近的国营商场是否来了食糖和面粉。他也去皮阿塔安寨农贸市场排长龙，从来自乡下的农民手里购买一些质量低劣但尚可入口的水果。电影院里正放映一些法国影片，观众蜂拥而至，一睹弗内斯的风采。他扮演的圣特罗佩斯宪兵活龙活现，法国人可谓思想丰富。齐奥塞斯库正春风得意，当然也出了点小岔子，但这无碍大局，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例如，有一些大学生聚集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城，向中央委员会写信，抱怨他们宿舍拥挤不堪，又脏又乱，本来是两个人住的房间，却塞进去 10 个人。结果，挑头的一个“坏分子”被抓了起来，其他人也就老实了。

当权者对知识分子还是照顾的。一般说来，他们并不闹事，有的人甚至认为，该是投到党的门下，为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了。进步的社会主义难道不值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吗？从越南战争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是何等腐朽，面目多么可憎。一些富有才气的历史学家撰文庆祝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合并 50 周年，因为保卫祖国也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人们经常看到齐奥塞斯库笑容可掬，伸手拢着他那一头微微卷曲的黑发。毛雷尔也来恭维，一再说知识分子的归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支持的政权是不牢靠的。齐奥塞斯库还在寻求国际支持。在法国和意大利，当局默许一些人出面呼吁人们支持罗马尼亚，特别是它的拉丁属性^①。罗马尼亚的各出版机构也开足马力，大量

① 罗马尼亚语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同属于拉丁语系。

——译者

出书，其中布加勒斯特出版社用多种外国语出了几套丛书。以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的名字命名的历史研究所中，埃丽莎·冈普斯倾其全力研究一次大战后、二次大战前这段时间中罗马尼亚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他千方百计将布加勒斯特描绘成欧洲的中心。但是，这时齐奥塞斯库也获悉，在作家联盟之内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京城派与外省派在明争暗斗，匈牙利族和德意志族的作家们也心怀不满，指责罗马尼亚族横行霸道。齐奥塞斯库听后虽感不快，但也无暇顾及，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埃列娜也建议他暂且不予置理，让那些人自相残杀去吧，不要忘记，这些秀才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其实，她对这些人也恨之人骨，因为她只受过小学教育，他们对她经常冷讽热嘲。齐奥塞斯库则姑妄听之，他还要深思。

这时，他同毛雷尔正忙于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上考虑，他都得对西方开放。而无论是西德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出自不同的利害，都在执行缓和政策，这一点帮了他大忙。苏联人和美国人，除了在越南间接较量之外，也在设法谈判，以便达成一项控制战略武器的协议。那位即将卸任的约翰逊，因为将越南战争频频升级而遭到激烈抨击。继他而来的尼克松，立场则是十分明朗的，他要与苏联举行高级会晤。齐奥塞斯库对尼克松没有什么恶感，而且对他事必躬亲、处事果断赞赏不已。1967年3月22日尼克松对罗马尼亚进行私人访问时，齐奥塞斯库竟发现尼克松对他怀有不少敬意。

至于德国人，只要他们放弃统一两个德国的傲慢而又无理的要求，倒是十分好处的伙伴。1961年8月柏林墙筑起来后，华盛顿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从那时起，德国人就

发现，华盛顿不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大动干戈，因而，他们只有执行一种欧洲政策，才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1967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齐奥塞斯库接待了维利·勃兰特的来访。他应付自如。当然，两国间的贸易还相当有限，但它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从波恩获得了优惠贷款，而且，波恩还同意用西德马克赎回那些希望离开罗马尼亚的德意志血统的少数民族。这些人要走就走吧！当然得花些钱。作为回报，罗马尼亚对住在洲际饭店或北方饭店的德国阔佬们的招待也是无可挑剔的，那里的酒吧开至深夜，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充当招待。

与戴高乐合奏

法国人好高骛远。戴高乐将军就曾想消除由于雅尔塔协定而形成的人为的分裂状态，这无疑是乌托邦。但是，戴高乐的一些话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他说过要帮助欧洲各个主权国家和人民自由地发展，这条路线是十分正确的，它与罗马尼亚1964年4月的宣言不谋而合。戴高乐正致力于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他的主张可能导致西方联盟和华沙条约组织双双解体。齐奥塞斯库所向往的是一个中立的欧洲，这样的一个欧洲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和平扩展。法国的立场反映了齐奥塞斯库的理想，他受到鼓舞，因为，在1966年6月12日，他也呼吁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和希腊都有基地，可以说美帝国主义就在眼前，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对此简直无法忍受。尽管他们的特工人员早就同希腊的共产党人与和平主义者协同作

战，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像 60 年代初肯尼迪所希望的那样，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击个粉碎。法国的民族主义和独立性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但要处置得当，这可要动动脑子。尽管戴高乐和法国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所谓“民主思想”的基础之上，即腐朽的爱国主义，但还有利用一下的价值，更何况，法国人在高科技、信息学和军火工业上还是颇具水平的，这也是罗马尼亚首脑所特别钟情的领域。1967 年 2 月 2 日，罗、法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这曾轰动一时，可是，光有这点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开拓，深入到法国的企业之中去，毛雷尔就曾向齐奥塞斯库大谈特谈海市蜃楼飞机的优良性能。

戴高乐将军于 1968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双方都做了周密的准备。5 月 13 日，齐奥塞斯库出席了大国民议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教育问题。他在会上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会议决定将义务教育由 8 岁延长至 10 岁，规定高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法国的大学里一片混乱，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但也有点为戴高乐将军抱不平。罗马尼亚对戴高乐访问的准备工作无可挑剔，令将军赞叹不已：奔驰汽车重新检修过了，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弗罗雷斯卡区一所白色宫殿里朝向湖面的套间，准备供戴高乐下榻，法国典礼局长对房间进行了查看，一切都井井有条。为了迎接法国总统大驾光临，大学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安排将军向英雄纪念塔献花，尽管那里集中安葬了国家主要领导人，但是将军所到之处不会遇见普克和德治的坟墓。当然，也安排总统去法国公墓献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难烈士在那里安息。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将罗马尼亚对将军的接待规格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但

是，有一点却让组织者束手无策，这就是将军那高大的身躯使齐奥塞斯库显得更加矮小。

夏尔·戴高乐夫妇、顾夫·德姆维尔外长及法国代表团的到来，成了布加勒斯特市的盛大节日。那天是5月14日，星期二。天公作美，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市民们获准休假半日，便倾城而出，涌向从机场到将军下榻处的马路两旁，估计不下20万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打量着他的客人：将军看上去目光呆滞，茫然若失。但是，他也发现，尽管法国国内出现了大的动乱，这位将军仍然沉着冷静，泰然处之，毫无惊恐不安的表示。将军的坦然反而使这位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局促不安了，他对将军油然而生出一片敬意。将军在大学的表现也很得体，他祝贺罗马尼亚当局在选拔学生、组织考试方面取得的成功。在齐奥塞斯库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将军更是平易近人，虽未含糊其词，也未透露多少内情，他只是重申：“同你们一样，我们也认为，继雅尔塔划分势力范围之后的冷战，只会导致人为的分裂，这种分裂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消极的，与欧洲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为了统一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于欧洲来说，缓和、统一、合作比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霸权主义更得人心，更有价值。”

戴高乐将军在罗马尼亚政府大厦举行了盛大的答谢招待会，罗马尼亚所有的部长和各国驻罗外交使节应邀出席。将军在招待会上的表现也可以说尽善尽美，齐奥塞斯库十分满意。法国总统风度翩翩，言谈举止十分得体。他同苏联大使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对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则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国家的形势怎么样？”将军对以色列的大使表现得相当冷淡。他对自己言行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给齐奥塞斯库留下深刻的印象，获得了好评。但是，当这两个人面对面

单独会谈，旁边只有一名译员的时候，齐奥塞斯库就穷于应付，感到十分吃力了。他竭尽全力要求法国向罗马尼亚提供军事装备，戴高乐则闪烁其词，未置可否。他对毛雷尔讲述这位将军的态度时很费了一番脑子。但是，这次访问还是富有成果的，在外地的参观，特别是克拉约瓦那一站，是轻松愉快的。法国报刊对这次访问进行了大量报道，5月18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也对罗马尼亚十分有利。它指出，应当尊重欧洲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双方支持越南和谈继续进行，也表达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愿望。关于贸易和文化合作，公报使用的措词也令人满意，尽管齐奥塞斯库认为它应该更好一些。可是，对协议能否得到执行，他心里还没有底，因此，就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派出色的特工人员和科技情报人员到法国去扩大战果，也就是说，假如法国人自己不打开国门，我们就设法逼他们打开。对这次为期四天的访问，埃列娜也感到满意，因为戴高乐夫人平易近人，同她在一起是轻松愉快的。可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布加勒斯特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你听说过吗？当法国总统夫妇走下飞机舷梯，站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面前时，伊冯娜^①情不自禁地对夏尔说：‘我的上帝呵！’你猜，当时埃列娜对尼古拉说了句什么？她说：‘你瞧，他们叫你上帝呢！’”

^① 伊冯娜是戴高乐将军夫人。——译者

布拉格之春

法国总统访罗回国之后，齐奥塞斯库就将他的全部注意力转向布拉格的形势及杜布切克所处的困难境遇。他敢断定，尽管杜布切克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但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他预感到苏联人要采取过火行动。苏联人对其周围国家的事十分敏感，决不允许时局失去控制，到时候他们就要干涉。实际上，苏联人也分为两派，他们之中的鹰派主张进行干涉，采取强有力措施，关键是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即他是否认为，不进行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就会从苏联人手中飞走了。事关重大，齐奥塞斯库决定亲赴现场了解事态的发展。8月15日至17日，他对布拉格进行了匆忙的访问。他看到，捷克人特别不安分，而杜布切克的头脑还算清醒、冷静。但是，对于杜布切克允许学生和动乱分子在让·于斯广场上振臂高呼“自由选举领导人！”、“以色列万岁！”等口号，齐奥塞斯库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些狂妄之徒。他们头脑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策略思想，就凭那点浅薄的知识，就想玩弄政治！但是，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对这点他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尽管如此，他回到布加勒斯特后还是忐忑不安，就更加寡言少语了。由于心事重重，往往夜不成寐。为了松弛一下神经，他就来到黑海之滨。入夜，他身着雪白的麻纱便衫，找人对弈。他特别钟爱白色麻纱便衫，去布里俄尼岛见铁托时，身上也穿着这种便衫。在海滨，他也时刻注视着杜布切克的活动。杜布切克尽力劝说他的同胞们不要走得太远、太快，同苏联的结盟要善

始善终，他这样做似乎有些道理，并未失去理智。

8月20日晚23时，齐奥塞斯库担心的事发生了：苏军的24个师从四面八方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空降兵占领了首都布拉格机场。齐奥塞斯库得到情报说，杜布切克的地位在削弱，快要支持不住了，他声泪俱下地说：“我一生都在尽力与苏联合作，他们竟做出这等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齐奥塞斯库听后义愤填膺，莫斯科的这些领导人也实在太不像话，竟将各国人民看成手中的玩物。罗马尼亚的舆论也为之哗然。他感到人民正期待着他出来主持正义，他是他们的领路人，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他必须向人民表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更何况，他的声音将传遍全世界。罗马尼亚内政部向齐奥塞斯库报告说，各地青年人准备去边界战斗，以阻止苏军的坦克前进，甚至流亡在国外的罗马尼亚人也打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回国，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去。

8月21日，齐奥塞斯库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当时他站在共和国广场旧王宫的阳台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站在广场上，心情复杂，既恐惧，又怀着几分希望。齐奥塞斯库有点歇斯底里，声调尖利刺耳，一开口就谴责苏联人的干涉行径，说他们犯了大错，人们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惊呆了，青年们向他欢呼。齐奥塞斯库宣布：“我决定，从今天起，在全国建立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武装的爱国卫队，以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他又说：“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各个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布加勒斯特的人民，既受到了鼓舞，又感到焦虑。8月22日，齐奥塞斯库又在大国民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开始他就说：“大国民议会的这次会议是在社会主义各国以及我们大陆上其他各国政治生活特别严重的时刻召开的。我

们全党、全国人民一致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是极端错误的。”议员们对他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下去，齐奥塞斯库全面阐述了罗马尼亚政府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准则，这就是尊重各国的独立与主权。他论述得十分精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了屹然不动的形象，他已经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可以对全党发号施令了。齐奥塞斯库内心明白，他的形象在这几个月中升高了一大截，波德纳拉希和毛雷尔则相形见绌了，离开了他，这些人将一无所有，他们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

尼克松的点缀

齐奥塞斯库热衷于重大的国际战略问题，希望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苏、美谈判协调立场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他们的谈判最好由罗马尼亚充当中间人，让罗马尼亚发挥作用。尼克松是否了解罗马尼亚的地位和作用呢？齐奥塞斯库认为他是了解的。这位美国总统定于1969年8月访问布加勒斯特，此行的目标十分明确，尼克松曾这样对他的顾问基辛格说：“亨利，我看，只要我们不间断地去东欧国家访问，我们的莫斯科朋友就会感到如坐针毡。”基辛格说过，尼克松的主要目标是苏联人，因为他们一直疑心我们在耍花招。尼克松的另一名顾问说得更明白：“在谈判桌上，既要有王牌，也要有点缀。”但是，齐奥塞斯库并不甘心充当点缀，他要当坐在第一排的决策人，为此，他必须将对尼克松的接待做到尽善尽美，更何况，对来宾进行高规格的接待在

布加勒斯特早已习以为常了。

尼克松的座机在奥托佩尼机场降落，陪同他来访的是他的夫人帕特里希、亨利·基辛格以及他的另外两名顾问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齐奥塞斯库与毛雷尔、马内·曼内斯库等人到机场欢迎尼克松。摄影师为他们拍了合影，但是他刻意掩饰齐奥塞斯库身材矮小这一缺陷，让人们站成一个半圆形，以给人一种假象。只是埃列娜那两条粗短的腿，笨拙地叉开，使人看了甚觉不雅。但是，她本人似乎没有察觉。当天晚上，齐奥塞斯库在国务委员会的大厅里举行了国宴，欢迎尼克松一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举手投足都很有分寸。那天下午，帕特里希对埃列娜进行了礼节性拜访，还在毛雷尔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布加勒斯特市少年宫。对于前来向她们表示敬意的统一着装的少年儿童，埃列娜表现得慈祥、宽厚。

8月4日，访问该结束了，在离宾馆的路上，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决定走下汽车，来到欢送的人群中，一一握住伸过来的手。当时，越南战争正酣，尼克松受到反战者们愈来愈强烈的攻击，向他表示一下罗马尼亚人民如此爱戴他，是齐奥塞斯库的得意之作。给予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元首如此隆重的礼遇，可能使广大党员们迷惑不解，党报《火花报》为此特意发表文章，做出解释，指出欢迎尼克松是在向美国人民表示敬意，向美国人民无比的创造性、发达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表示敬意。可是，埃列娜的虚荣心却只获得了一半的满足，因为，她梦寐以求的是能被邀请去美国回访。

尼克松一走，齐奥塞斯库就投身到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去。大会将于1969年8月6日开幕，12日结束。大会的主要报告，即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由他负责

起草。波德纳拉希告了病假。毛雷尔负责向大会作关于1971年至1975年经济计划和1976年至1980年远景发展计划的报告。此外，他还负责外事小组的工作。齐奥塞斯库心情十分舒畅，事事得心应手。埃列娜则不时地提醒他，说：“他们”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有两个人可以使尼古拉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这便是国防部长约尼塔和文化小组的负责人，41岁的杰出宣传工作者杜米特罗·波佩斯库。伊翁·约尼塔代表军队向齐奥塞斯库表示了忠心，支持他对青年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政策。杜米特罗·波佩斯库则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指出基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已成过去，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曙光就在前面。他还不无夸张地宣布：“凡是探索人民心声，把握民族脉搏的人都会发现并且理解2000万罗马尼亚儿女对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忠诚。”这种夸夸其谈，齐奥塞斯库听了都有点不舒服。他扫视了一眼周围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因为，从内心说，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他觉得他们之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斗士，他看不起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掌声出自内心。

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也是党的首脑，真是权倾朝野，因为他同时控制了经济委员会和大国民议会的各专门委员会，但是，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要发挥世界作用，使之无愧于伟大的罗马尼亚民族和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对军队不甚放心，对知识分子也不满意，他批评这两部分人思想狭隘。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看着这些人，看得入了神，这些人对他满怀期望，而他自己却感到十分孤单。可能他突然惊恐地发现：他心里不踏实，甚至有些心虚。

第六章

以进为退的思想家

(1969—1987年)

埃列娜步步青云^①

齐奥塞斯库的日子并不好过。周围的人对他怀有敌意，环境对他不利。这个在五年之内爬上罗马尼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人，不允许别人有任何违抗他的行为，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党员都不能违抗他。对于老百姓，他不信任，而对党员，他只想制服和控制他们。埃列娜与他一个鼻孔出气，也是只种刺，不种花，他们感到人们在憎恨他们。然而，她正步步青云，在布加勒斯特进行有机化学论文答辩，听者寥寥无几。著名的专家康斯坦丁·奈尼特斯库在场。倘若他缺席，他实验室的经费就很可能被卡掉。为了将来，埃列娜正计划实施一批高分子化学项目。自从她在专为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工人开办的大学听课以来，对她真得刮目相看了。如果埃列娜没有察觉她周围奉承她的那些研究人员都有保留意见，对她进行着无声的、掩掩藏藏的对抗的话，她可能会感到满意。那班提拔她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前程，甘愿使自己的名誉受损。埃列娜是个不好惹的女人，她以攻为守，以羞辱那些在她面前点头哈腰、但又难以争取的男男女女为乐事。她迫使这些人强装笑脸，要求他们鼓掌欢迎。她说的罗马尼亚语文理不通，又不纠正，以便表现她对这些人，对他们的学识和所受教育的蔑视。

尼古拉对她也只能表示赞同。1970年3月2日，他们两人一起在共和国宫接见了美国阿波罗—农神宇航小组的宇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航天员查尔斯·康拉德、理查德·戈登和阿伦·比恩，并向他们颁发了一级科学勋章。几个月之后，即9月，齐奥塞斯库完全同意埃列娜的意见，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以“化学与进步”为主题的第39次国际化学会议，到会的有25个国家的代表。不久以后，齐奥塞斯库召见电子技术和信息论专家，要求他们制定罗马尼亚经济信息化纲要。当一两位专家表示，他们掌握的统计数字往往是虚假的时候，他勃然大怒。面对谈话人那种怀疑态度，他大发雷霆。这些自命不凡、思想水准极低的技术人员，显然没有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根本没有办不到的事。罗马尼亚国家元首之所以大动肝火，还因为五六月洪水泛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笼罩着全国，而这些闭目塞听、工作不能尽善尽美的情况更令人难以容忍了。

1500多处地方受到洪水的袭击。1700公里的铁路和近1万公里长的输电线遭到破坏。整个大自然都在与罗马尼亚这位国家元首作对。他不依靠大自然，他永远不屈服。他经常强调说，无论气象条件如何，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完成生产计划。1965年，他曾向农民说过这番话，这些农民，或者听天由命，或者不费气力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就沾沾自喜。面对洪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各个受灾地区。有些人说他干劲十足。5月15日和16日两天之内他走遍了克卢日县、萨图马雷县和雅西县，然后又到了罗马尼亚西北部。他在雅西宣称：“尽管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但我们看到了全体人民克服一切困难、战胜自然灾害的坚强决心。”面对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苏联的同志们显得漠不关心，与此相反，中国的朋友们却派来许多技术小组。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人们很容

易认出他们来。他们身着深蓝色布衣服，干净而朴素，总是二人同行，漫步街头。他们很守纪律，这是国家元首所赞赏的品质。

高技术只有西方人才有。无论是通过公开的外交谈判，还是通过间谍活动，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接触加拿大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利用他们，进而超过他们。罗马尼亚的研究人员没有出什么关键性的成果。齐奥塞斯库想，1970年1月成立的国家核能委员会没有发挥作用。法罗经济技术科学委员会倒是搞出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1月中旬签署了有效期为四年的交流与合作协议。这是挤进尖端实验室最好的跳板，最有效的办法。法国人生性傲慢，但只要能用地道的法语和他们交谈就足以使他们的心软下来。既然法国人很珍视法罗友谊，就要利用这种温情主义。

荣耀的美国之行

齐奥塞斯库1970年6月15日至19日访问法国证实了这一开放政策。法国成了罗马尼亚情报人员开展活动的好地盘。只要他们熟读马尔罗的著作并将它们挂在嘴边，就可畅通无阻。然而，法国是个过于有限的目标。他们的眼光放得更高更远，也就是盯上了美国那块天地。在美国，在战略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可以下更大的赌注，但风险也更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拥有一张去美国的有效入场券，即纪念联合国25周年大会。他抓住这个机会，在1970年10月13日至19日安排对纽约访问，并借机在美国游历一番。他的妻子埃列娜、中央委员会书记杜米特鲁·波佩斯库和外交部长

科尔内留·曼内斯库陪同他踏上了美国的土地。10月13日晚上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进行了首次会晤，会谈严肃认真，历时70多分钟。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参加了这次会谈。第二天中午，则是另外一种气氛，接触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宴请齐奥塞斯库。杜米特鲁·波佩斯库和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尔内留·波格丹出席作陪。宾客如云，个个地位显赫。齐奥塞斯库领略到了资本主义大千世界。席间他得以同休利特—帕卡德公司董事长威廉·休利特和旅游保险公司董事长多伊尔·德威特进行交谈。这样的交谈对罗马尼亚只会有益。当然，交谈的主题不外乎罗马尼亚和美国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无论在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界，还是在实业界齐奥塞斯库都获得好评。他们善意地将罗马尼亚看成一个被敌人包围、深受苏联霸权主义之苦、而且众志成城决心捍卫独立的国家。在这些天真的人们看来，反苏就意味着反共。齐奥塞斯库欺骗了庞大的对手，并被人视为一个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自己的国家逐渐引向接近民主制度的第三条道路的开明的国家元首，他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罗马尼亚国家元首要从这次访问中捞到好处，这个形象是必要的。齐奥塞斯库和他妻子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到加利福尼亚去了一趟。10月16日，他们在长滩“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的专用机场着陆。齐奥塞斯库如梦初醒。他心旷神怡，就像他前几次访问苏联期间面对那里的广阔天地时一样。他不无遗憾地发现，他无限钟情的黑海海滨，相比之下就太狭小了。

他后来去了迪斯尼，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成功，人们主动走上前来同他交谈，向他微笑。他惊奇地发现：做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是很讨人喜欢的！人们觉得他待人诚恳，热情洋

溢。与此相反，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则显得局促不安，给人一种从未见过人世面的感觉。这并不使美国人扫兴。洛杉矶一站，因为有在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参观的热烈场面，也相当引人注目。相反地，10月18日弗雷斯诺（还是在加利福尼亚）那一站就严肃而认真了。在那里，齐奥塞斯库全神贯注，对食品机械公司的冲洗技术发生了极大兴趣。下午，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圣克拉拉参观了生产电子计算机的“梅莫雷克斯”工厂。齐奥塞斯库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这种珍贵仪器的性能。10月19日，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很自信地、严肃而有力地、带有权威性地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表了讲话。罗马尼亚电台和电视台当然地转播了这个讲话。

国际声望日隆

齐奥塞斯库跨越了一个新阶段。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现在他的影响超过了铁托，他总是拿自己同铁托相比，比较他们所获取的成就。然而，虽说全国都跟着他走，但似乎并不明白为什么跟他走。看来，是埃列娜促使他这么干的。按她的说法，住在罗马尼亚的都是平庸的“狗崽子”，他们既迷信，又忘恩负义。只有儿童们，如果教育得好，是可以救药的，可以建设新的未来。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坚信的这一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人告诉她，孤儿院的情况很糟，破破烂烂，尽管充满滴滴涕的气味，但是还很脏。她根本不相信。她认为，卫生部门的领导纯粹是不怀好意。齐奥塞斯库锲而不舍。他坚定不移地要改变人的头脑，改造人的精神面貌。只有当人民都追随

他，他才算大功告成。埃列娜对这个目标表示怀疑，她不相信群众会赞同他们看不到动力的复杂战略。这些芸芸众生只关心吃饱肚子、想方设法少干活、多享受，他们绝对理解不了尼古拉的宏图大略。懒惰成性、无所事事的女人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愿生了。何必花力气去解释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的复杂多变呢？如果抓住两点，即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罗马尼亚的强盛，一个既是推动力又是典范的国家的胜利，这条路线就浅显易懂，一目了然了。首先一条是同莫斯科结盟，1970年签订的条约使这个同盟更加紧密了。这项条约加强并发展了1948年条约的各项条款。1970年10月国务委员会批准了新条约。

条约的第6条是最主要的，它成了布加勒斯特的宣传工作和提供假消息的基础。这一条的含义是通过一种安全体系来确保欧洲和平，更确切地说，是确保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区域的和平。苏联应允“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打退武装进攻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给予多方面援助”。没有必要大肆渲染这项协议。首先是在对外方面，因为西方对罗马尼亚的好感取决于西方认为它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然后是对国内，因为显示民族独立可以满足人民的爱国情绪。齐奥塞斯库1970年8月出访莫斯科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些基本问题。他是来参加华沙条约协商委员会会议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确认苏联对波恩实行和解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经过谈判，签订了一个条约，以便使欧洲的局势正常化。波恩方面倾向于接受1945年的边界，这对维护欧洲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实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非军事化和非核武器化。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和对应反击理论威胁着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对于巴尔干人来

说，在希腊和上土耳其这些西方的基地内部，和平主义的宣传反映了他们的心愿。这种宣传主要是由希腊共产党人搞起来的，他们大多数人是军人政变以后来到布加勒斯特避难的。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总体上说，布加勒斯特的立场是使自己成为主张全面核裁军建议的代言人。

在一片和平声中，罗马尼亚舆论界心里踏实了。东正教教会也在大念和平经，似乎成了罗马尼亚国家政策的传声筒。同华盛顿的关系也进入热恋阶段，因为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很好地衡量了布加勒斯特在国际舞台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东西方对抗的危机地区，如在中东和越南，它的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当时，尽管美国人有实现议和的所谓愿望，但他们仍在柬埔寨狂轰滥炸。在这种形势下，齐奥塞斯库都认为可以说得上话。在中东问题上，则是因为布加勒斯特没有中断同以色列的官方联系。这样一来，布加勒斯特就成了中转站，是进行秘密谈判的理想场所。在越南问题上，是因为布加勒斯特提供了同中国人、苏联人和柬埔寨人会谈的场所。总之，罗马尼亚外交上的离经叛道成了欧洲关系中的一张王牌。齐奥塞斯库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他暗中策划、操纵，自以为处在中心位子上，而不仅仅是敲边鼓了。现在，谁还敢把他看成一个无足挂齿的小小巴尔干人呢？日夫科夫问他，再也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他为什么还常常感到不满足，致使他更加频繁地外出狩猎以发泄他心中的愤懑呢？

埃列娜对此一清二楚，可以替他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在国内，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元首并未亦步亦趋。当然，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任何造反的迹象，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人人都惟命是从，但是也没有可以振奋人心的全民族的宏图大

志。技术官僚们不愿搞大的项目。原以为可以依靠的某些人士也溜之大吉了。杰出的数学家博泰兹刚刚成立了预测中心，便散布对工业政策前途的怀疑论调。杨·伊利埃斯库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共青团活动家，并且在苏联受过很好的培养，大家都认为他是党的美好希望，但他也开始反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制定的水利政策了。这些批评是不能容忍的。知识分子们也不老老实实地去做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而只满足于在作家协会闭门清谈。齐奥塞斯库火冒三丈。这个党正在变得墨守成规。在基层，人们只屑于琐碎的小事，变得保守、僵化，他得时时进行检查、督促。在他那辆黑色奔驰牌汽车在乡间道路上疾驰的时候，在他的随从人员大呼小叫地穿过被吓呆了的村庄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一会儿嫌路面坎坷不平，一会儿嫌村里的房屋破旧不堪，杂乱无章。应该不断奋斗，尽快改变世界面貌。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他简直不堪重负了。

亚 洲 样 板

摆脱所有这一切的时间到了。齐奥塞斯库强压怒火。他对苏联人不满，认为苏联人看轻了他。1971年7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经互会会议的时候，他忍无可忍，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去参加8月在克里米亚召开的兄弟国家元首会议。要让莫斯科及其盟友明白，齐奥塞斯库是一位思想家，是榜样，不再仅仅是个徒弟或普通的伙伴了。在这方面，埃列娜超过了齐奥塞斯库，她宁愿全家在黑海之滨有花园的府邸团聚，也不肯到克里米亚去旅行。俄国人不懂得什

么是舒适。美国人为使齐奥塞斯库夫妇感到惊讶，把所有的橱窗都摆满了食品和高档服装。尽管这么做未免有些过分，但他们仍是很好的东道主。看来，美国人以为罗马尼亚国家元首不能为他妻子购买按著名妇女时装店的样子做成的服装，不能为他妻子购买精美食品！然而，齐奥塞斯库没有必要使华盛顿信服他的生活水平一点都不比他们的总统差，他要操心许多别的事。不管怎么样，他拥有了罗马尼亚的，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全部财富。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这样的琐碎小事，让埃列娜去处理吧。的确，她在童年时被剥夺了一切，所以应该给予她某些应得的补偿。如果她喜欢鞋底略弯、鞋面柔软的系带皮鞋，那就让她买吧！

1971年夏天，齐奥塞斯库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但他仍准备更上一层楼，此前，他兴味无穷地回顾了这一年的历程。2月，他组织召开两天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提出干部教育和改造计划，起草了废除终身职务的干部轮换政策。4月，苏共召开24大，他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重申，他坚持1964年4月罗马尼亚的观点。他和埃列娜最近一次对中国的访问给了他力量，这是提出综合理论必不可少的力量。匈牙利人正在开展对所谓的“罗马尼亚领导自相矛盾”的批判，随他们的便吧。

对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的访问，以及最后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和柯西金的会谈，对他虽无新的启迪，但使他对纪律与权威所能办到的事更加坚信不移。这种信条应由一个令人敬服和崇拜的领袖提出来。三周的访问令人振奋。中国井井有条使他感到震惊：在北京，建筑整整齐齐，步行和骑自行车的群众很守纪律，他们不愿意闷在可笑的“达契亚”牌小汽车里，而罗马尼亚的小干部们却对这样的小汽车垂涎

三尺。中国群众穿着清一色的、简单而实用的服装。中国妇女与俗里俗气的罗马尼亚女人大不相同，后者浓妆艳抹，似乎过去与土耳其人交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有人向他报告说，有的妇女因为弄不到只能用外汇购买的香水就争先恐后去抢购保加利亚香水。这种香水是用浓缩玫瑰油制作的，散发着一股难以消失又有害健康的气味。另外，中国女人个个身材苗条，她们不吃对身体不利的蜂蜜蛋糕。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得心应手，万事如意。毛泽东不愧是一位英明的领袖。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成了生产者，从此就去掉了心腹之患。齐奥塞斯库简直着了迷。毛泽东用晚婚、超过两个孩子就罚款的办法控制了人口出生率。什么事都是可能办到的。齐奥塞斯库坚持要在罗马尼亚做出的规定，当然是建立在相反的目标上，是要加快人口增长。这有什么关系呢？然而，罗马尼亚妇女却加以抵制，她们与贪财的医生合谋，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进行堕胎。她们从黑市购买外国人贩卖的避孕药。这一切都是可悲的。

至于在朝鲜的那一站，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特殊荣誉。这个英雄国家像一个欢度节日的大兵营，给人一种兴高采烈的印象：盛大的游行和阅兵活动，穿着整齐制服的儿童，颂扬金日成的大幅彩色宣传画。埃列娜和尼古拉相视而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只要坚定不移地用铁的意志强迫实行就够了。社会主义是完美的，伟大无比的。尼古拉永远忘不了少先队员的形象，她们穿着蓝裙子，白上衣，戴着红领巾，正在秩序井然地打扫平壤广场。这一场面使他十分激动，他突然为在布加勒斯特做清洁工的年迈而肥胖的乡下妇女感到羞愧。她们衣衫褴褛，穿着后跟已经磨破的靴子，在

冬天打扫着首都堆满积雪的人行道。他梦想有一座干净、洁白、光彩夺目的城市，总之，一个与他自己和伟大的罗马尼亚人民相称的首都。

更上一层楼

中国人的接待，周恩来与波德纳拉希的良好合作及其杰出风度，北京和布加勒斯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合作的未来发展前景鼓舞了齐奥塞斯库。密切注视北京一举一动的日本人毫无顾忌地公布了北京给布加勒斯特贷款的数字：2.44亿美元！1970年11月和1971年3月在齐奥塞斯库之前到北京访问的部长会议成员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的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北京同意向罗马尼亚派遣技术人员。这是中国技术人员首次为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一个东欧国家而工作。此外，国防部长扬·约尼查将军1970年7月的访华成果和罗马尼亚民兵小组在中国为期四周的学习成果也令人欣慰。齐奥塞斯库有一个庞大计划，即拥有一支献身国防并对老百姓进行控制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人民军队。有的企业，借口没有先进技术，借口过于集权的领导发出的过死的指示难以执行，就办事拖拖拉拉。但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可以在这些工业联合企业里起有效的推动作用。

亚洲之行使齐奥塞斯库得以休息。他可以清醒地考虑那些早已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由国家任命的官员内部的问题。能保持增长速度吗？是否应该复核一下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否应该继续吸收那些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和科学院院士入党？一年多

来在《经济问题》杂志上进行的有关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应该允许吗？布达佩斯开始谴责北京—布加勒斯特—地拉那轴心，是否应该对布达佩斯回击？还有齐奥塞斯库尚未着手解决，但却引起他思考的其他问题。国际关系的两极化可能损害布加勒斯特的根本利益而有利于莫斯科和华盛顿。转向第三世界，而不只局限于向国际关系中的两极接近，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是否有利可图？

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的重新部署如何，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改组、开展全国性的思想教育，取得忠心耿耿、准备自我牺牲的亲信们的支持。埃列娜认为，只能在家族内网罗这些绝对忠实的男男女女。她经常对齐奥塞斯库说，他们多亏了你才有了一切，齐奥塞斯库对这一说法并非无动于衷。

齐奥塞斯库夫妇回到布加勒斯特，又处于7月的酷暑之中。在吃午饭的时间，首都的街上阒无一人。已经看破一切的埃列娜议论说：“他们什么都不干。”下午4点左右，人们就一窝蜂似地跑出工厂或办公室，拥向挤得满满的无轨电车，车子的电线都脱了钩。最机灵的、无所事事的人则坐车到终点站赫列斯特洛乌公园，在可以跳舞的小咖啡馆里坐在桌子旁边喝啤酒。天气太热了。怒气冲冲的埃列娜反复地说：“显然，他们什么都不干。”饭店里住满了外国旅游团，他们在布加勒斯特逗留两天，然后到黑海边的疗养地。那里安排住宿时，人们把他们按国籍分开。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很不乐意看见这帮穿得破破烂烂的意大利青年，他们穿着短运动裤，留着长头发，在胜利大街散步。离军事科学院不远的卡普沙啤酒厂厂长抱怨说，不管什么人都敢来吃风味菜，特别是有名的小牛肉烧蘑菇。必须敷衍这些令人讨厌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可以带来外汇。同样，还必须接待由老富翁们组成的

团组，在这些团组里有许多拉丁美洲人，他们到布加勒斯特市郊接受女医生阿斯兰发明的老年生命机能治疗。

齐奥塞斯库夫妇俩躲进他们的“长春”府，又高高兴兴地过上了恬静舒适的生活，又有了空调和高质量的服务，这都是紧张的工作所必需的。尼古拉准备好了，他决定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项振兴计划和一系列措施。必须进行教育，他重新作了一个关于党和国家各自职能的报告。但是，要使教育卓有成效，就必须更新方法。为了强调危机的严重性，他直截了当、态度蛮横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解释说，“某些积极分子可能会想，既然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为什么还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专门研究教育问题呢？”尼古拉挥了一下胳膊，强调说，“同志们，因为存在自满的危险，所以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这些自满的迹象只能导致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掉以轻心。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有些人低估了思想理论工作的作用。”齐奥塞斯库指出了争论的实质。1965年以来，全国进行的令人惊异的经济起飞导致了智力，尤其是技术智力的大发展。技术智力的发展提高了干部的专业水平。这种专业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必须伴随着思想意识的深化。1990年罗马尼亚将要更上一层楼，由“多方面发展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目前还缺乏这种思想意识。

只有一种哲学，只有一部历史

齐奥塞斯库使听众感到惊讶。他宣布，罗马尼亚人民的奋斗目标不仅是根据财富的增长而改进分配，即建立一个摆

脱不发达状态的更公正的社会，而是要创立一个坚定政治信仰甚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某些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信条或最终目的的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来说，重申这个价值体系令人恐惧。齐奥塞斯库是明确的：“共产主义伦理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理论问题。”他从教条又回到实践上来了。他颠倒了价值体系。他看到，“事实上，共产党员本身应该是个榜样，他应该懂得他们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组织原则，为新的生活原则而奋斗。”威胁笼罩着会场，人们紧张起来。“我不能说我们的思想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心。”

继之而来的是要纠正一系列消极现象，比如在经济方面，特别喜欢进口不必要的消费资料。参加会的人在想：“他要走到哪一步？”齐奥塞斯库环视他的听众，使他们安静下来。他给他们讲述从他亚洲之行得出的结论。他解释说：“这些交往将对罗马尼亚党有决定性影响。”听到这些话，有些人不寒而栗，在田间劳动的阴影使他们惶恐不安。其他一些人心想，同莫斯科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齐奥塞斯库干脆地说，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同苏联的友谊是永恒的。当他对自己制造的不安效果确信不疑之后，便提出了新的思想工作计画：结束争论，结束正在出现的知识分子关于多党制的争论。不能有多种道路，不能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教育中，在斯特凡·乔治乌干部教育学院的影响下，只允许有一种哲学，一部历史。“我们只能承认一种哲学，只能承认一种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在历史教学中存在任何其他的历史观。”总之，宣传工作应该渗透到各个方面。“许多地方的思想状况是贪图资产阶级的舒适安逸，追求小资产阶级的殷实生活，缺乏坚定性。”取消供娱乐用的工人俱乐

部！从今以后要把这些俱乐部变成教育和宣传中心。

讲话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与会者都鼓了掌，有的人为的是表示他们将要转弯子；另一些人则委曲求全，抱着观望态度；有的人想到他们的对手要靠边站或被清除，因此感到高兴；还有的人心有余悸，感到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寄希望于1968年的飞跃和改革思想，他们这辈子就算完了。一些知识分子立即拿起笔来为新政策服务了。在历史和语言学方面，强调罗马尼亚人民和语言源出当地的新论点占了上风。贬低拉丁来源而褒扬达契亚的原始基础。对斯拉夫语和拉丁语词汇的重视减少了，语言学家们争先恐后地在以前归入斯拉夫词根的词汇中发现达契亚词根。每个人都获悉，希腊历史学家赫罗多特曾赞美特拉克族的一个分支达契亚人民的勇敢精神。罗马人征服了达契亚，但殖民者被达契亚国的发达文明和团结同化了。学校的孩子们都强记硬背。时时刻刻都在动员的新时代，在“人民最爱戴的儿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开始了。

当苏联人和美国人在莫斯科最终签署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时，齐奥塞斯库高兴极了。他需要一个和平的时代来完成他的伟大使命，他需要一个缓和的气氛来发展他的反宣传计划和再现他对苏联的叛逆形象，也是为了更容易得到西方的技术和贷款。然而，他首先要做的是在罗马尼亚改组政权和整顿思想。1972年，一项新的军事法加强了军队—民族—党的团结。军事法明文禁止把罗马尼亚军队置于外国的指挥之下，因此使爱国者有了好感。然而，它和华沙条约组织并不矛盾，这个组织主张每个成员国的军队仍由本国指挥。齐奥塞斯库解释说，可能发生的战争只能是一场卫国战争，一场人民战争，一场在全民族的核心力量共产党领导

下、团结一致的全体人民参加的战争。这只能是捍卫独立和革命成果的斗争。

埃列娜显露头角

提出新思想的迹象增多了。1972年3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接待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来罗进行友好访问的古巴代表团。在同一年夏天，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制定了扩大同非洲国家经济和科技交流的庞大计划。罗马尼亚国家元首毫不犹豫地站在被剥削者一边，站在革命阵营之中。有些相信1971年7月论点严肃性的知识分子明白，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自由创作与研究的余地了。他们想离开罗马尼亚，正在寻找可以接待他们的国家。他们一方面等待移居他乡的时机，一方面试图从内部加以抵制。但毫无结果。依靠家族、帮派和亲信的齐奥塞斯库在思想上的惟意志论就像压路机一样滚滚而来，势不可挡。一个新的人物显露头角，这就是埃列娜，忠诚而坚定的埃列娜。她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新计划，认为耍手腕、模棱两可、妥协和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至于齐奥塞斯库这方面，他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他了解人们的卑鄙秉性、嫉妒心和残忍性。他对埃列娜表现出无限信任。他知道她性格刚强，爱他本人，爱他全家。埃列娜为尼古拉，为她儿子尼库，为卓娅，为她的兄弟格奥尔基·彼特列斯库什么事都会去干。他认为，协助她，给予她应得的、与她的活动才能和正确分析相称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她是贪婪的，但他也是贪婪的。他们两个都怕失去他们用了那么多年时间，做了那么多努力才得到的东西。她已

经成了他必不可少的人。所以他决定提拔她。波德纳拉希表示赞同。据说，继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之后将有一批妇女进入与她们的才干相称的行列。在1972年4月18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及后来的10月11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齐奥塞斯库一家如愿以偿了。当时有20名新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埃列娜。母亲又提拔自己的爱子尼库。1973年，他被任命为大学生联合会副主席。自从1971年以来，埃列娜的那位可靠的兄弟格奥尔基·彼特列斯库负责工会工作。齐奥塞斯库及其亲属们的升迁是理所当然的。控制所有国家机构的党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必须使党变化、更新，使党依附于他。因为错误是不能挽回的，所以必须洞察秋毫，灵活运用提拔与罢免的手段。1974年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前夕，齐奥塞斯库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是也可能会出现由于代沟而引起的不和。代沟又掩盖着所受教育差别。他预料到某些人会嘀嘀咕咕。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加以注意就是了。

在党所任命的全体官员面前，他以人民的合法代表而自诩。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唯一的共同代表，这在1974年已经得到确认。大国民议会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一致选举齐奥塞斯库为共和国总统。《火花报》急忙在1974年4月10日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改进措施》一文，称赞这个辉煌成就。文章强调1965年以来思想和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加强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国家的的作用。随着传播使用“有机性”(ORGANICITE)这个术语，具有现代风格的词汇出现了，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人民—党—国家通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个唯一的领导人物建立内在联系。

良 师

伴随这个阶段而来的是大量的宣传，并且号召进行宣传。1974年4月14日《火花报》报道说：“每个公务员都是政治工作人员，党的积极分子”。党和国家的领袖超过了积极分子，他是全民的良师。齐奥塞斯库是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他懂得如何去推动。他一方面排斥其他思想，进行新闻检查，另一方面根据简单的提纲炮制要别人归顺的讲话。这个提纲无非是要在传统礼仪形式中强加上新的程式。1974年，他在进行组合和操纵方面有了一个合适的替身杜米特鲁·波佩斯库。他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控制了1971年由齐奥塞斯库创建的电台和电视台的全国理事会。这是一个聪明而隐秘的人。他戴着墨镜，说话不多。受过他检查的知识分子都恨他。他不在乎。他依靠群众进行工作，他为群众而工作。从这个观点看，新闻法是个很好的工具。1974年1月在官方公报中公布的条文规定，要对所有报刊杂志和传播手段强行进行严密检查，禁止攻击党和国家要人、禁止扰乱公共秩序的新闻报道，禁止沙文主义的宣传和一切伤风败俗的出版物。报纸编辑部和记者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个法律。5月，借口纸的产量减少，报纸的种类、版面和发行量都减少了。

齐奥塞斯库亲自干预宣传工作。1974年4月21日，他接见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要求他们尽快生产大型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要在1977年庆祝罗马尼亚反抗土耳其人的独立战争100周年的时候搞出来。思想建设的激情完全吞噬了齐奥塞斯库。他组织了一个经常演出的大型节目，他是这个

节目的中心人物。罗马尼亚人民应该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听任他的领导。奉献给他的这场演出可以把现实的缺点、过去的沉重压力、现在和未来形势中难以预料的事一笔勾销。齐奥塞斯库 1965 年曾经有过使罗马尼亚现代化的计划。当时他还年轻，摆出一副朝气蓬勃、要大干一场的样子。1974 年他雄心未减，但他对时代的认识却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年轻了。他听别人一再地说，继续保持 60 年代中期达到的增长速度是办不到的。他遇到了恶化的经济环境，即石油冲击造成的经济环境。这种背景对他不利。但是，他仍固执己见。组织人们学习他的固定不变、一再重复、咒语式的讲话，发行他的经过修饰的画像（因为甚至连照片都不应该变老），以传统民间形式编写诗一般的颂词，这一切都促使他脱离时代和现实，使他囿于正在变成传奇故事的历史。齐奥塞斯库不是什么事都能立即办到的，但在想象中，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他随便运用传奇故事，把国家的历史和地理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他成了光辉历史的化身。他同时是多瑙河，又是高山……他将永垂史册，在颂扬他的材料中把历史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了。

1974 年，齐奥塞斯库焦虑不安，但没有认输。人们对他的崇拜使他放心，使罗马尼亚人民有了安全感。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一个。节口的时间表里有俄国革命的重大日子、罗马尼亚本国英雄业绩的纪念日和赞扬齐奥塞斯库个人功勋的周年日。把齐奥塞斯库描绘成“英明的领袖”，这使人们以为，正在出现的经济危机、能源和食品供应的紧缩只不过是教条般的胜利史诗中一段短暂的不幸的插曲。平均主义助长了崇拜。不论是青年人、老年人、知识分子，还是体力劳动者，所有罗马尼亚公民的待遇都一样。勃乌奈斯库和巴

尔布这样的天才作家也着手创作颂扬文章了，这些文章的主题作为指导性提纲来引导所谓的“自发性创作”。同时让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创作。有一首歌节奏容易熟记，把信条的主要内容都包括进去了，齐奥塞斯库认为这是一首优秀歌曲：

“在罗马尼亚大地上，
人人都听他的话，
溪流、树枝、岩石都能辨认出他那坚定的脚步，
因为从黎明到黄昏，
他是惟一不休息的人，
他是不知疲倦的国家建设者，
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新人。”

标 准 化

“新人”的提法具有许多齐奥塞斯库巧妙使用的涵义。比如，它可以通过强调政权的初创性来掩盖一次接一次的政治清洗，最终使得乔治乌·德治时代的领导人只剩下波德纳拉希和齐奥塞斯库了。毛雷尔 1974 年春天退休。齐奥塞斯库对此并不惋惜。这个人物温和的举止，与世无争的天性使他难以忍受。他知道，一方面他不同于古巴的卡斯特罗，不能吹嘘自己是革命英雄，另一方面，他也不同于铁托，可以吹嘘在战争期间和游击队员一起出生入死。他之所以决定开创新时代，那恰恰是为了开创不断革命的新时代，开创将罗马尼亚置于被压迫者阵营的战争时代，而这个时代是从 1974 年开始的，最早也只能从 1965 年开始。他在 1965 年以前和 1965 年以后划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是最基本的。当时，

他提出一个纲领，1971年他解释过这个纲领并且阐明了它的理论基础，1974年执行这个纲领。这个纲领是全面的，就是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每部分都与整体紧密相连。新人需要新的地理概念。他必须忘记城乡差别，他必须消除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火花报》1974年4月21日刊登的标准化法律草案就是“以科学为基础、合理而协调地组织我们祖国公民的生活和劳动”。第二天，《火花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列宁诞辰的短文，为的是明确指出“党非常重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培养新人”。

齐奥塞斯库越是操劳，越是不安，就越是显得粗暴。他周围的人由于怕惹他生气而感到压抑。尽管埃列娜显得兴致勃勃，人们却再也见不到齐奥塞斯库的笑容了。的确，埃列娜1974年3月成了罗马尼亚科学院化学所的一员，11月又进了执行委员会。她开始追逐这些使她着迷的称号和证书了。石油冲击留下的问题使尼古拉焦虑不安。面对这些问题，他一筹莫展，尽管在中东的战略是全方位的。罗马尼亚落后的技术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也使国家元首感到伤感和忧虑。他身边空有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顾问，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设局，他只是同他确认是完全可靠的一些人，如一个叫马尼亚·曼内斯库的人进行研究讨论。他免不了有悲观的、不抱幻想的想法。人们告诉他，要进口石油，贸易就有出现逆差的危险，那就得借债了。依赖他人的烦恼又来了，因而就需要做出选择。要不要依赖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受可以提供石油而要食品的苏联人的控制？在这两种情况下，生活水平都将要下降，工人会有什么反应？没有一个人敢告诉齐奥塞斯库，工人们根本不怎么干活，甚至暗中马马虎虎。他们不努力完成宏伟的计划目标，而消极抵制。

尽管人们极为慎重地提出不同意见，齐奥塞斯库还是听不进这些可怜的预言家们的意见。悲观主义者总是缺乏积极进取的信心。如果工人干活不够多，就必须根据他们的生产情况付给他们劳动报酬。形势恶化，那是因为有权霸的资本主义这个罪魁祸首。齐奥塞斯库提醒他的对话者注意他不久前在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阐述的内容。他看到国际生活中的三个新情况，即：世界上缓和进程的发展；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加大；在有关世界问题的决议中，特别是在裁军问题的决议中，各国参与国际生活的不均等。他再次提醒人们注意，他曾经提出过两个目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因此，任务是明确的。中、小国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所有怀疑者都应该确信，布加勒斯特采取的独立自主路线没有改变，用依赖和再次结盟威胁干扰布加勒斯特是不受欢迎的。应该最终证实，“在关于当代发展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绝对不应该影响各党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关系”。

以进为退

齐奥塞斯库要考虑两件紧迫的事：一方面要同各革命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以便置身于南北关系的中心；另一方面，为了得到西方的技术，要在西方保住难得的美好形象。因此，他出访的劲头有增无减。国内经济形势令人不安，罗马尼亚国家元首被迫以进为退。埃列娜顽强而勇敢地伴随着他。在布加勒斯特，有一班优秀的化学研究人员负责设计高质量的项

目，她只是一本正经地签上字。1975年6月，埃列娜和尼古拉飞往拉丁美洲。他们预计访问好几个国家，有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在巴西的三天访问获得了新闻界的广为宣传。1968年圣保罗新闻界曾经赞赏齐奥塞斯库谴责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举动，这一次，它们又老调重弹。《巴西日报》着重指出罗马尼亚在经济方面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对这类文章表示非常满意，这些文章让人了解了罗马尼亚和他本人的政策，正中他的下怀。应该很好地利用一下第三条道路和为独立发展而斗争的说法。在墨西哥，齐奥塞斯库对革命制度党的机制和运行很感兴趣。该党控制着整个国家生活，其主席于当年6月20日去布加勒斯特进行友好访问，同他再次相见。十几年前，戴高乐曾经在美国南部边界向美国人挑战，齐奥塞斯库是不是想在墨西哥步戴高乐的后尘呢？对此他本人未露口风。

1975年这一年他还进行了另外一次会晤。只有将来才能确定这次会晤的重要性。事实上，尼古拉和埃列娜访问了里斯本。尽管这座城市有其迷人之处，但是这座阴沉、颓废、居民区破败不堪的城市对他并没有吸引力，不过，扫除多年保守独裁的革命发展进程、军事政变和人民起义引起了他的注意。葡萄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它的大西洋海岸使它成为不可忽视的战略基地。某些西方专家在“石竹花革命”中看到了莫斯科的黑手。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正在取得独立。西方分析家们试图从这些事件中揭示苏联新的迂回扩张战略，即从南面包抄西方世界的阴谋。齐奥塞斯库在里斯本很活跃。然而，尽管他好奇（他参观了造船厂和国家土木工程实验室），尽管他慷慨大方（他给新政权一亿美元贷款），他还是使东道主不知所措。他住在里斯本近郊

的克卢兹旧王宫里，他疑心很重。稍有一点脚步声就会吓一跳。给他吃的饭菜，他让别人先尝，然后自己才敢享用。有些外交官员私下相互打听他的情况。

齐奥塞斯库玩弄的三重把戏把他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他向西方开放，1975年8月接待了美国总统福特。在尼克松两次（私人和正式）访问之后，这次访问就显得老一套了，只安排了一天会谈。美国人反而重视这次会谈。他们认为这些会谈，这些诚恳而坦率的会谈对于国际体制的顺利运行有着重要意义。齐奥塞斯库认为，这些会谈不会有什么成果，但由此而引起的报道对他则是十分宝贵的。齐奥塞斯库向努力在大国之间扩大自己战略影响的国家开放，他卷入中东的复杂事务。他接见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表。他喜欢阿拉法特，在他看来，阿拉法特为使巴勒斯坦国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他希望让阿拉法特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其实，齐奥塞斯库自诩对称他为“齐奥塞斯库兄弟”的那个人有一定影响，他不是早在1970年底就接待过阿拉法特吗？这次会晤是阿拉法特第一次同东欧领导人的接触。最后就是齐奥塞斯库认真处理同莫斯科的关系。这个工作远非那么简单，因为面对国内舆论和西方的监视，这个主要联系或多或少要隐蔽些，无论如何，不应该大肆声张。罗马尼亚人可能不理解他们的领袖正在和苏联人拉关系。

虽说双边会谈是未加掩饰的，那也只是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好像仅仅是一般性的会谈，不应予以重视。然而，1976年齐奥塞斯库还是冒着风险向公众说明了真相，抢在了外国新闻界，即他所憎恨的一些电台，如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之前，它们也会谈论罗苏关系重新热起来的情况。这类消息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的效果。人民的民族主义情

绪对比萨拉比亚问题是敏感的，这个省 1944 年和北布科维纳一起并入苏联。从 1976 年夏开始，西方人觉察出罗马尼亚同苏联关系好转的某些重要迹象。他们从 1975 年春开始注视着苏联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关于比萨拉比亚历史的争论。他们指出，争论在言词上变得温和了。美国分析家们由这种温和得出罗苏两国关系改善的结论。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在克里米亚度过美好的假期归来后承认，他们没有错。他实际上准备于当年秋天在布加勒斯特欢迎勃列日涅夫。

同莫斯科和解

为使这种趋势保持平稳，表明不再过高估计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斯拉夫成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9 月 4 日主持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特拉克民族学”国际会议开幕式。有关达契亚人始祖的考古和语言的工作并没有中止。11 月 24 日发表了齐奥塞斯库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罗苏联合声明。语言是明确的，但西方专家们照例尽量从中找出含糊其辞的话。然而，齐奥塞斯库宣称想“扩大思想方面的合作”。两党认为，为了协调立场，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的信息交流与协商是重要的。双方都心中有数，但是西方人继续抱着幻想，梦想着看到帝国崩溃。他们有这么一种怪癖，就是追寻两个相互谅解、有着共同利益的盟友之间失调的迹象。

至于罗马尼亚的舆论，它对这事是有思想准备的。1976 年 6 月 2 日起，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会上，齐奥塞斯库给定了调：在苏联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没有领土问题。让每个人都懂得，边界是不可侵犯的，任

何损害 1945 年所确定的边界的行为都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谁会疯狂到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好战分子呢？齐奥塞斯库是可以放心的。罗马尼亚人不关心战略问题。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教会用全面裁军的甜言蜜语哄骗他们。他们对思想的渗透性和震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对抗一无所知。除了斯特凡·乔治乌学院及其有名的图书馆培养的干部以外，谁还能揭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奥秘呢？显然，他齐奥塞斯库不能置身于这场争论之外。那么，他就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你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吗？”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概念本身并不说明实质，而根据各国的民族和历史现实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才是实质。”齐奥塞斯库只是随便说说。听话人心里揣摩着，进行反复分析，才能猜出罗马尼亚这位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元首的几分真意。他酷爱保密的特点是难以改变的。

他很需要保密，因为前景并不乐观。美国新总统卡特在潜心于道德主义时曾经自以为重新认识了救世主降临说。在美国舆论看来，应该忘掉在越南的失败以及把尼克松弄得焦头烂额的水门丑闻。卡特发动了捍卫人权的运动，同时又非常注意重新认真制订华盛顿对其后院中美洲的政策。齐奥塞斯库坐立不安了。美国人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活动、通过在慕尼黑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开始操纵罗马尼亚的所谓异教教会、教派。恐怕会有某些下流的知识分子出来帮助这些社会上的不良分子。他从保安部门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一批浸礼会信徒，基督复临论者和圣灵降临论者在秘密集会，抗议在罗马尼亚侵犯人权。他们这些受了复古和迷信之害的人有什么权利谈论人权？罗马尼亚尊重和保护惟一“真正的人权，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必须清除

这些异端分子，让他们无法危害社会。要让他们失去工作，要惩罚他们的职业过失，要把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无耻之徒关进精神病院！应该像对待疯子、刑事犯一样对待他们。要让安全部门照此行事，安全人员不乏创造性和想象力。这是他们的责任。不良分子应该消失，圣经应该用来擦屁股。

齐奥塞斯库发完脾气后并没恢复平静。在他看来，与赫尔辛基会议相联系的、正在西方出现的气氛是可怕的。必须分析新情况并做出反应。当然，有 33 个欧洲国家高级代表、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参加的赫尔辛基会议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这次会议最终就欧洲安全与合作达成协议。在讨论人员与新闻自由交流问题时，会议又重新提出一个西方人特别热心的问题，即一个外国大国对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监督权问题。齐奥塞斯库拒绝接受这种干涉政策，因为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隐蔽形式。1977 年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所有这些问题又要重新开始讨论。

地 震

自称受迫害、且获得救助受难教会援助组织同情的天主教徒以及像作家特塞比尼亚格和特纳塞这样的知识分子或 1956 年曾经被捕的保尔·戈马，这些人都是危险分子。2 月 17 日，齐奥塞斯库指责所有背叛国家的人，指责在欧洲新法西斯主义者帮助下进行活动的失去社会地位分子。这些新法西斯分子给他们提供各种手段和电台，让他们进行反对赫尔辛基决议、反对欧洲缓和、和平与合作的活动。然后，他决定结束这种状态。没有必要让这个企图组织保卫公民权

运动的保尔·戈马名垂青史。这位作家接待在他呼吁书上签字的人，收到了表示赞同的信。欧洲自由电台很快就把这些信透露出去了。几周过去了，戈马还在活动。必须对他们严惩不贷。1977年3月1日，有两个人在去戈马家时被捕，其中一个人是浸礼会的牧师。齐奥塞斯库勃然大怒。西方宣传工具根本没有注意罗马尼亚的人权事业，但某些报纸，如《世界报》，每天都提供戈马事件的进展情况。2月26日，一群法国知识分子竟敢在一封公开信中攻击齐奥塞斯库，甚至指责他言过其实。他们成立了一个捍卫罗马尼亚人权委员会。

这些棘手的琐事并不妨碍齐奥塞斯库继续他的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不出所料，他和埃列娜去拉各斯缔结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外出对他颇有益处。3月4日是很可怕的。21点30分，非常强烈的地震震撼了布加勒斯特、克拉约瓦和普洛耶什蒂。陪同其父母的尼库幸免于难。齐奥塞斯库命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立即回国。5日清晨，他从机场直接驰往首都受灾最重的地区。马杰鲁大街、伯尔切斯库大街和共和国大街的场面惨不忍睹。惊呆了的居民在倒塌的楼前沉默不语或失声痛哭。到处都是尘埃。齐奥塞斯库走遍了首都，埃列娜总是和他形影不离。她为了慎重起见，戴上了头巾和太阳镜。满身是血的人从瓦砾中走出来，遇难者还埋在瓦砾下面。由于有发生瘟疫的危险，必须让人迅速把推土机开来。死亡人数高达1300人，伤10500人，真是满目疮痍！必须高速度高质量地重建首都的中心区。

3月10日，齐奥塞斯库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丝毫不改变国家的发展纲要。他对人不让步，在地震面前更不让步。《火花报》在整个一周里都刊登了领袖的照片，他走遍全国

灾区，埃列娜总是不离左右。她到医院看望伤员，号召他们要勇敢，有魄力。如果说齐奥塞斯库不让步，保尔·戈马也是固执的。他不顾地震造成的冲击，仍继续以齐奥塞斯库不能容忍的那副镇定而坚决的神态进行着自己的战斗活动。厚厚的近视镜遮住了他的眼睛，齐奥塞斯库厌恶眼镜。在法国，支持戈马委员会的人越来越多。让—保尔·萨特和欧仁·约内斯科，还有伊莎贝尔·于佩尔和布里吉特·福塞这样的著名女演员。这些蹩脚的演员管什么闲事？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齐奥塞斯库传下命令。必须镇住戈马，切断他同外国的联系。这位作家被捕了，受了体罚。精神病医生维亚努曾经揭露滥用关精神病院的办法，现在被迫移居国外。

齐奥塞斯库精神紧张了。不过5月19日纪念罗马尼亚独立的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工厂，专家们向工人讲述有关争取独立斗争的各种情况。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组织了爱国歌曲比赛，但是，布加勒斯特全城怨声载道。居民们似乎泄气了，补贴问题过于复杂。尽管政府为了安抚人心而释放了19000名普通刑事犯，暗地里仍在流传着种种谣言。说杀人凶手夜里在布加勒斯特四处游荡，布加勒斯特笼罩着不安全感。为了减轻由于逮捕戈马而引起的国内外压力，齐奥塞斯库于5月10日命令释放戈马。最好还是让他走，让他离开这个国家。到那时他就失去了所有影响，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他不热爱祖国。相反地，关于人权问题的实质，根本不能让步。赌注已下，布加勒斯特丝毫没有改变建立在正确思想基础上的政策。人权属于经济和社会范畴，其余都是骗人的把戏。此外，西方人首先关心的只是保护他们的实业家。他们埋怨没有统计数字、年鉴，埋怨人们限制他们的贸易代

表。必须坚定地重申，事事要先为政府着想。齐奥塞斯库要求认真进行总结，清清楚楚地表明他对赫尔辛基和贝尔格莱德会议的立场。1977年10月1日，《罗马尼亚论坛报》发表一篇由科尔内留·波格丹署名的文章，该文论述了真正的进步寄希望于欧洲和国际缓和与合作这个主题。作者又在为全面裁军进行辩护。齐奥塞斯库的宏图大志就在于此，然而，它却没有实现。

罗马尼亚人食量大

齐奥塞斯库嘟嘟囔囔地说，让我们谈谈国际合作吧！自然灾害突然袭击了全国：当然是对某些企业有影响的地震，还有给1980年和1981年收成造成损失的恶劣的气候条件。罗马尼亚走投无路了。对外国的依赖、紧缩、国民收入再投资的比率下降，这与前20年的飞速增长和令人惊叹的活力形成的反差是令人难堪的。宣布罗马尼亚是发展中国家，1976年重新返回77国集团，这又有什么用呢？自从波兰人被卷入危机的漩涡以来，西方人显得更强硬，并且不再放手去冒风险了。他们的贷款政策不如以前开放了。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年曾经给罗马尼亚以贷款，但是条件很苛刻。然而，这时主要是得消除1976年以来的贸易逆差。齐奥塞斯库感到被卡住了脖子。但是，他不说他对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出口享受优惠关税率。他也没有再提把交流重新转向第三世界并对这些国家采取主动。这对罗马尼亚来说都不是坏事。苏联的盟友们表现得寸步不让，他对此也保持沉默。当然，苏联同意向罗马尼亚提供原油，但

要用外汇或高质量的食品补偿。

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宁愿坚持揭露西方人进行剥削，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罗马尼亚人民必将知道困难从何而来，必须知道他们是这个困难的受害者。同时，齐奥塞斯库解释说，必须更多地生产，更少地消费。在60年代黄金时代培养起来的年轻一代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省吃俭用，什么是吃苦耐劳。好，他们将要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至于党的干部，他们照例满足于利用自己小小的特权，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动员工作。经济斗争可以和战争相比，为打胜仗必须进行战斗。齐奥塞斯库相信他钢铁般的意志：他可以像渡过其他难关一样来渡过这些新的难关。1981年10月10日，国务委员会的一项法令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居民供应的措施。条文清清楚楚写道：“鉴于许多公民要求采取措施，惩办侵吞或毁坏属于公共财富的农产品、储存超过消费量的某些食品、干扰供应和影响消费者一般利益的人，国务委员会特颁布法令……”继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惩罚措施：黑市和囤积居奇者处6个月至5年监禁，号召人民委员会（市政府）让国营单位和合作社把糖和油只卖给在本地居住或工作的公民。任何侵吞农产品的行为都要处以5年监禁。人人都要监督并在必要的时候揭发他人。

另外，又强迫所有罗马尼亚人缩食。齐奥塞斯库一家人坚持着严格的饮食制度，他们讲究热量，吃东西都要用秤称。人人都可以这样做，要适量。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喜欢吃西红柿加洋葱和山羊奶酪……1981年8月21日的《罗马尼亚现状》写道：“按人口平均占有热量，罗马尼亚属于世界前10名。”追查罪犯的活动开始了。老百姓被告知说，罪犯就是从市民嘴里抢面包的农民，涉嫌进行非法买卖的商业工

作者，以及不称职的和腐败的地方干部。

这项法令引起阴森可怖的谣传，使人们惊恐不安。10月17日一系列新决定加重了这种精神状态。有人说，在布加勒斯特一些饭馆里卖人肉。布加勒斯特体育俱乐部已经不可能给柔道和摔跤运动员加餐了。甚至让未来的冠军、为这个政权争光的少年体操运动员把她们应得的那一份食物让出来。人们到处议论纷纷，说这些孩子受到了虐待。

一位“共产党国王”

齐奥塞斯库惴惴不安。必须制止这些谣传，结束已经形成的郁闷气氛。开始追查叛徒和敌人了。到处都是叛徒和敌人。内务部的保安人员确实可靠吗？齐奥塞斯库觉得恐怖气氛在发展，但他却拒不承认。他想笼络工人，不谴责他们。但是，由于一些居心不良分子的煽动，还是出现了罢工事件。1981年10月法令公布几天之后，奥尔特尼亚的莫特鲁地区就瘫痪了。露天煤矿停工了。平息事态的民兵和党的负责人可能被打死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愿意知道此事，他决定再采用1977年行之有效的办法。当时日乌河谷的卢佩尼矿工也罢工了。他们不同意每天工作6小时以上，嘘他们的干部。他们要和齐奥塞斯库谈，而且只和他谈。1977年8月3日，他到那里去了。他和工人群众协商，答应将减少工作时间，并且不处罚工人。但是，9月却开始镇压：带头闹事者被调走，其家属被遣散。逐渐非正式地恢复了8小时工作。齐奥塞斯库由于有前一次的经验，就乘直升机到莫特鲁去了。他到达的时候，人们以石块相迎。这说明什么

呢？说明有混进来的叛徒！有人想杀死他！

人民的敌人甚至非法监禁了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博布，他是齐奥塞斯库的亲信，齐奥塞斯库想用他来执行监督管理和招聘干部的政策。因为，忠实的人，真正忠实的人，坚信事业的人不太多。忠实可靠的人有斯特凡·安德烈、埃米尔·博布，应该把他们提拔到中央委员会来，还有奥普雷亚，尽管他在和尼库大吃大喝的时候行为举止欠妥。应该精诚团结，奋力抗争。

目标容易确定。首先要摧毁这个叫作“自由欧洲电台”的经常放毒的外国宣传中心。那些接近或为电台工作的人也应该和自由欧洲电台一起完蛋。这些罪魁祸首即使在国外也要抵罪。齐奥塞斯库本来很想引导法国知识分子热爱罗马尼亚，但是流亡到法国的戈马向他们进行反宣传。维尔吉尔·特纳塞刚刚发表了一篇反齐奥塞斯库的罪恶文章。他们该死！齐奥塞斯库向法国派遣了一名特务，其任务是：除掉特纳塞和戈马。但这个人变节了，把情报出卖给了法国国内反间谍局的特务部门。这是给齐奥塞斯库的一记响亮耳光，是他的一次惨败。特纳塞得到法国国内反间谍局的保护，他本人及其家属都受到保护，他隐藏起来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变得咄咄逼人了，他谴责布加勒斯特的行径。原定1982年9月法国总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被取消了。

《现实》杂志1982年1月发表的维尔吉尔·特纳塞的文章《共产党国王齐奥塞斯库一世陛下》给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形象造成了严重后果。自从1980年7月24日齐奥塞斯库上次访问法国以来，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尽管人权同盟和自由欧洲电台在巴黎的办事处竭尽全力揭露齐奥塞斯库的暴君制度，但法国对齐奥塞斯库还是尊重的，对他是热情

的。对罗马尼亚客人的接待周到而认真。在爱丽舍宫和朗布依埃的午餐，在卢森堡宫丰盛的酒宴，齐奥塞斯库注意到饭桌上用花做的装饰是罗马尼亚国旗的颜色。这个美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相反地，烦恼多起来了。在布加勒斯特，接近浸礼会人士的美国新任大使非常卖劲。这个戴维·芬德伯克是绝对令人难以容忍的。他接连不断向国务院报告，有可能损害罗马尼亚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不必除掉里根的这个“新手”，只要把他逼到没办法的地步，最后提出辞职就可以了。1985年，这件事总算办成了。

现在齐奥塞斯库受到威胁。但事业还是事业，这是不可动摇的。他继续他的思想教育运动。1982年6月1日，齐奥塞斯库向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提出要进行思想意识调整。事后回想起来，他还在为这次结构完美、论据充足、说服力强的讲话洋洋自得。他编造历史，强迫专家们不要再把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割裂开。他强调说罗马尼亚人民这个种族能吃苦耐劳，有英勇作战的能力和统一的动力。有这样的过去，这样的信念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条，埃列娜和他就必将取得胜利。他们值得回忆的光荣历史太多了，他们看到的场面太多了，他们听到的欢呼声太多了，因此，现在的困难阶段不会使他们沮丧。埃列娜记得1980年7月这个盛大的星期日吗？当然记得！她忘不了达契亚国2050年的庆祝活动。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来到共和国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群众的欢呼声和叫喊声，有节奏、有秩序的鼓掌声。她忘不了那些以在那里见到尼古拉和她而感到高兴和幸福的群众。她看到了，并且还可以准确地回忆起宽广的体育场。它的设计十分精确严谨，挂在中央的那块横幅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成三行的口号：“和平、主权、独立”。她又看到了穿着

白衣服、身材苗条的体操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少先队员以及在体育场中心组成方队的体育学院的学生们。在两侧，有民间舞蹈演员和歌手大合唱。这是极度繁荣、强盛和荣誉的形象。今天（埃列娜知道吗？）在布加勒斯特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患失眠症的齐奥塞斯库只有听着有鼓掌声的录音才能入睡。

第七章

千夫所指

(1987—1989年)

齐奥塞斯库老了^①

齐奥塞斯库老了。他知道有人窥伺他。他每次说话断断续续的表现，他胳膊和手的每次颤动，都被人抓住，用来反对他。他知道这一切。人们说他令人惶恐不安。说他的一双大眼睛滴溜转，他也知道。于是他挺直腰板，着意修饰仪表，把波浪形的头发往后梳。简言之，他自我克制了。有人期望着他末日的到来或失去权力，期望自己雄心如愿以偿。使所有这些人失望令齐奥塞斯库快慰。他想起乔治乌·德洽的最后几个月，阿波斯托尔拼命排挤他齐奥塞斯库，毛雷尔和波德纳拉希支持他。他深信，他的敌人和假朋友为了摆脱他，把希望寄托在一切可能的外国支持上，某些外国机构已经在做齐奥塞斯库之后的安排了。这些人不相信，再也不相信事业了。他认为，只有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才是惟一忠实可靠的人，是可以使全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最高统帅。

其他人，软弱的人们，显然要看着莫斯科的眼色。他们有转向苏联人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邻国正处于危机之中。齐奥塞斯库了解对手的一切。对手说的话都由他的特务向他报告。对手的一举一动，最深层的想法，以及他们想保密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都被录音、记录下来，加以分析。埃列娜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去听录有对手们私生活片段的录音带。如有必要，她会不厌其烦地专门研究别人最隐秘的私生活。齐奥塞斯库让人跟踪试图阴谋反对他的人。

①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首先是那些老人，那些因为破坏他的事业而被他赶下台的老一代人的幸存者。他们至今什么都未弄懂，有的人还留恋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另外一些人则迷恋向西方开放。乔治乌·德治已经抛弃了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至于向西方开放，它只能给人以干涉布加勒斯特内部事务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开放显然是个圈套。齐奥塞斯库庆幸让科尔内留·波格丹和科尔内留·曼内斯库靠边站了，后者以根舍作为朋友并以在同西方关系方面是专家而自豪。曼内斯库病了，的确不会有什么危害了。他还把希尔维乌·布鲁坎排挤掉了，这个人由于有从事地下活动的老习惯又有过去曾在《火花报》工作的那套宣传手法，所以太碍手碍脚。必须对阿波斯托尔严加控制，他已经估计到阿波斯托尔对他的怨恨和不满了，好像是他齐奥塞斯库篡夺了他继承乔治乌·德治的权利。所有这些人都是失去权力、地位的可怜的老头子。

还有那个可能成为危险人物的伊利埃斯库。他受人尊重，巧妙地赢得了才干出众的名声。他还炫耀自己于1984年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他不甘寂寞，四处活动。他1987年秋天在《罗马尼亚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责难调整的署名文章。他照抄苏联的作法，鼓吹在罗马尼亚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并且进入了完善阶段。因此没有必要倒退，没有必要争辩，也不会有危机。戈尔巴乔夫对罗马尼亚的发展一无所知。即便苏联的党没有活力，罗马尼亚的党及其400万党员并非如此。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多得很。齐奥塞斯库有办法检验和挑选他们。

戈尔巴乔夫去年5月来到布加勒斯特，受到很好的接待。从奥普托佩尼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欢迎群众秩序井

然。儿童和工人举着两位领导人的画像。戈尔巴乔夫阐述了他的改革措施的基本性质和彻底性。《世界》月刊曾向罗马尼亚人民解释说，苏联非常需要改革，可以学习罗马尼亚成功的典范。5月25日让苏联领导人参观了登博维察河的老河道充填工程、地铁和新居民区工程。他们向来访者指出，齐奥塞斯库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版了他们的著作。总而言之，再回到伊利埃斯库问题上来，他虽吵吵嚷嚷，但为人懦弱，不会贸然发难。

向埃列娜致敬

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家子都不会让外人得逞。如果尼古拉顶不住，或他遇到不幸，还有埃列娜。她很能干，而且吃苦耐劳。她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战士。她现在掌握所有行动手段。埃列娜笨拙地穿着后跟很细、有伤髌骨的鞋子。他看着她，注意到她已经瘦了。他在这张由于衰老而失去花容月貌的脸上又找到了当年曾经吸引过他的青年妇女的痕迹。现在，她细腻的嘴唇上已经有了辛酸的皱纹。他一直爱着她，并且要使她得到应有的荣誉。他决定关照自己的故乡。与他的出生地斯科尼切什蒂有关的事情已经办完。父母的住宅已经变成了博物馆，旅游指南已经出版。现在应该为登博维察县埃列娜那个村子彼特列什蒂干点事了。这是一个很贫苦的村庄，那里有几个农民竟敢在自由欧洲电台承认他们的贫困，这些农民肯定被外国人收买了。在齐奥塞斯库看来，这是在出国家的丑。于是，一项治理计划被提出。在大兴土木的时候，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以前的遗迹。同时，

以集体农庄为基础，经济方面也做出努力：模范养猪场出现了，家禽生产大幅度增长，奶制品生产打破了历史纪录。将来，如果有一笔财政支援，也可以使工业起步。埃列娜的兄弟组织了一个优秀的足球俱乐部。彼特列什蒂还缺少一个漂亮的低租金的住宅区，就像给斯科尼切什蒂增添光彩的高楼林立的住宅区。

1986年9月，埃列娜和尼古拉到村里去进行过一次热情的访问。埃列娜非常隆重地回到她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她喜气洋洋。他们经过戈埃什蒂市，禁不住回想起遥远的过去，即他们相会的日子。然而，这初次相会还是个秘密。他们曾任人评说1939年5月1日那段故事和他们在游行时一见钟情的罗曼史。真的还是假的？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庆祝5月1日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这可以突出爱国主义、反法西斯和反战示威游行的作用以及齐奥塞斯库同志的英雄业绩。

埃列娜是他的同谋。现在她和他一起平等地工作。她发表了一些关于科学及其作用的引人注目的文章。她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她还获得了许多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据说，她只上过3年小学，这几乎是真的。她的晋升表明了她的个人的能力，证实了罗马尼亚进行经常教育的成果。她和他以实例说明了未来共产党人的模范夫妻应该是什么样的人。齐奥塞斯库想，埃列娜具有异乎寻常的才能。她极大的耐心使她得以紧紧地控制党和国家干部的任用。她领导教育及科学研究委员会。她合情合理的抱负使她青云直上，登上了中央委员会干部委员会的领导岗位。齐奥塞斯库感到气愤的是，有人传播关于一个女人的流言蜚语，而他则认为这个女人令人钦佩。最恶毒的辱骂和揭发来自背信弃义的扬·巴切

巴将军。他是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近 20 年的负责人。他于 1978 年逃到西方，把罗马尼亚安全部门的秘密出卖给美国特务。他叛逃 10 年以后，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著作，败坏他的祖国和老同志们的美誉。这个卑鄙的家伙使齐奥塞斯库怒不可遏，他胆敢因为埃列娜喜欢妇女时装店的连衣裙（她有 100 多件）和皮大衣，特别是水貂皮大衣来教训她。一位安全部门的将军叛变，无疑是为了钱。他有权力教训别人吗？罗马尼亚一位强有力的国家元首的妻子就应该穿得像邈邈遐邈的女人一样吗？她为人民的福利耗费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他们是所有人的母亲！小孩子都知道这事，他们把在学校做的诗和画集寄给她。扬·克列安加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极好的书，《罗马尼亚儿童诗画集》。在色彩鲜艳的封面上，有他和埃列娜一起手挽手光芒四射的半身像。巴切巴无视人民对他们的热爱。

对他们的儿子尼库的攻击也使齐奥塞斯库气愤不已，在他看来，这种攻击是无稽之谈。他儿子喝酒过多是身体好的象征，罗马尼亚男人不是懦弱的人！至于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斯特凡·安德烈经常光顾的尼库大吃大喝的晚宴、尼库举行的奢侈晚会，巴切巴不应该对此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也参加了。为什么如此憎恨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尼库是个好小伙子，很成熟，精通事业。几年前，他曾批评过某些领导人无能。无疑他是对的……现在，他表现非常好，并适当地赞扬一些坚强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顶住了震撼苏联集团的改革。只有思想整顿才是重要的。群众憎恨尼库，把他称作“躲闪能手”，随他们的便好了，埃列娜才不放在心上呢。尼古拉倒是恼火他和“坏”女人混在一起招摇过市。尼库一点也不控制自己。他粗暴地对待一些妇女，并且毆

打有嫉妒心的丈夫，以致引起一些流言蜚语。必须制止这些流言蜚语。

瓦连丁则不那么可靠，他牢骚满腹，附庸风雅，热衷于打桥牌。他喜欢剧烈的体育运动，这也使齐奥塞斯库不高兴。瓦连丁自己去观看斯蒂亚乌亚足球俱乐部的比赛，可以，但是不能要求他尼古拉，不能要求埃列娜去发奖。因为，那里充斥着噪音、汗臭、脏乱不堪……而且还流传着比赛弄虚作假的闲话，这难道不会招致对罗马尼亚国家的攻击吗？

家庭相互保护

不管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秉性如何，都应该加强家庭关系，相互保护。对于卓娅正是如此，当然，也很难过问。她是脆弱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认为，她本来会比那些利用她的优越地位和关系的平凡男人更有成就。齐奥塞斯库曾经试图清除其中的一个，他是《世界》周刊的一位记者。但卓娅与他总是藕断丝连。安全部负责跟踪她，以便适时进行干预。为了避免烦恼，齐奥塞斯库夫妇躲进他们的避风港，即那个又漂亮又安全的家：在“春天”大街松柏掩映着的一座白色住宅。这个区由军队和保安部队严密警卫着。外观很漂亮，大门的圆屋顶闪烁着各种灯光，非常奢侈，有凝结人类天才和创造性的豪华地毯。齐奥塞斯库欣赏这地方的整洁，在浴室里，埃列娜弄来的一件奇妙的东西——天鹅形的金质水龙头令他百看不厌。这使他想起他夫人在湖边喂养的那些天鹅，她以此为乐趣。

斯纳戈夫的小别墅也很优雅。全部由汉白玉建造，面向一片纯静的据说是滤过的湖水。在小憩之时，他们可以乘游艇徜徉。埃列娜和丈夫穿着白衣服，驾着小艇游玩。有时也进行一些更加刺激的娱乐活动。捕猎狗熊可以使人大大放松。尼古拉在全国有十几个随时准备迎接他的围猎场。他可以不期而至。人们立即会把皮毛油光闪亮的黑狗熊放出来，他开枪，看着狗熊原地打转，然后沉重地倒在地上。他喜欢看着浓浓的鲜血展现在湿润的兽毛上。埃列娜在远处遛着漂亮的狗。警卫人员已在她前面驱赶开散步的人们。

为了保证自己生活得舒适安逸，齐奥塞斯库对自己的财产管理得很严格。总之，这不是他工作应得的果实吗？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存放在瑞士。家庭相互保护着。有的下棋，有的聊天，瓦连丁的儿子达恩在埃列娜的双膝上玩耍。尽管对育龄妇女强制进行妇科检查，这位奶奶仍然认为，罗马尼亚还是缺少像达恩这样漂亮的孩子。齐奥塞斯库对他们家庭的成功感到满意。男人们由于接受了尼古拉交给他们的任务而在职业上获得成功。在维也纳的马林则离宗亲集团稍远一点。人们不透露他真正的职务。官方讲，他在罗马尼亚驻维也纳使馆负责商务工作。其实，他领导着对西欧特务工作的总部。马林有时不讨尼古拉喜欢。两个兄弟近在咫尺，伊利耶和尼古拉—安德鲁塔控制着党和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机构，前者在国防部，后者在内务部。党和国家，军队和安全部门协调得好极了！尼古拉—安德鲁塔曾在基辅当过罗马尼亚的领事，在那里度过一段时光。伊利耶长期住在布加勒斯特。他1964年毕业于历史系，1975年进国防部当顾问。这是一位军事问题专家。全家都承认，他的爱国之心经得起任何考验。他以自己的书和文章而著称。他乐于赞助关于罗马

尼亚军队历史和在华沙条约国中的罗马尼亚一类集体著作或者为它们作序。罗马尼亚军队的任务是明确的：忠于联盟，控制巴尔干半岛、海峡和土耳其。齐奥塞斯库从未对属于历史斗争传统的这一任务表示疑问。总之，这条战线上的变化是积极的。齐奥塞斯库，接着是尼库，都发展同帕潘德里欧领导下的希腊的密切关系。支持希腊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抗议运动是罗马尼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又交给军队其他工作，任务的分配就尽善尽美了。1987年10月25日，《火花报》曾作了准确的陈述：人民军队就是要为实现宏伟的经济目标提供干部、监督大企业的发展，如有必要，帮助进行农田收获。然而，某些军人却发泄不满。他们工资不高，吃得不好，装备很差。齐奥塞斯库从这些传言中看出，这是某些怀有敌意的人造成的后果。罗马尼亚可以为拥有极好的军事装备感到自豪：罗马尼亚能生产高精尖武器，发展了自己的军用飞机。这些项目始于1965年，即齐奥塞斯库时代，它们耗资巨大。齐奥塞斯库极为高兴地说，有朝一日，全世界都会对罗马尼亚所能做的事感到惊讶。

学习游击战

然而，为了自己的安全，他更喜欢依靠训练有素而又忠实可靠的私人卫队。他在与中东一些人和卡扎菲这样的人接触中听说，受过很好训练的、人数有限的小分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制造恐怖。他的东方朋友应该非常感激他帮了某些忙。罗马尼亚生产向利比亚、伊拉克和朝鲜出口的武器，当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运用苏联的专利，不是尖端武器，但

这些武器还是实用的，需要时，布加勒斯特可以提供装备的维修和保养。伊拉克损坏的装甲车可以在罗马尼亚得到修复。他的朋友们都相信可以在高水平的秘密训练营地内培养出合格的恐怖分子。他的朋友们甚至借给他几支别动队。他的朋友当中当然有经常到罗马尼亚去的阿拉法特。布加勒斯特也安排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秘密会谈。1986年，会谈是在黑海之滨的科斯蒂奈什蒂进行的。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卡扎菲。他在1982年和1986年之间经常去布加勒斯特。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问题的彼特鲁·埃纳凯1986年8月至9月在的黎波里受到隆重接待。

齐奥塞斯库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出于必要性才学习游击战，他不是一个军事家，而是一个组织家。他害怕，他迫切需要秩序。他给内务部安全部队设计工作方案，然后把这些方案推翻，再设计新的、更好的或至少他认为更可靠和设计得更好的方案。他信任尼古拉—安德鲁塔，但为了排除一切意外，他感到需要借助另外一个人的监督，即更多地专门负责安全问题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扬·科曼的监督。安全部队有10万之众，配备有装甲车和直升机，编为17个营，分散在全国各地，可以直接进入战略要点，负责警戒他的住所。罗马尼亚人害怕，他感到高兴。阴森可怕的传说盛行，有人说安全部队的人可以往井里下毒药、毒死反对派，毒打才华横溢的人，让他们暴死街头，安全部队的人藏在车里拼命跟踪过于好奇的外国游客，纠缠这些游客，迫使他们惊慌逃遁，这些谣传真真假假，齐奥塞斯库认为非常好。罗马尼亚是一个受敌人包围的、有内奸的、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然而，齐奥塞斯库仍想改变这种现状。他喊着他特别喜欢的壮丽口号：强大、高尚的人民，自己命运的主人。他的

著作不断续加。他不久前写出一篇关于经济问题和减少消费的文章。他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而工作。他是铁人，他总是有理。冬天又到了，这个西方宣传工具称之为“罗马尼亚冬天”的冬天又到了，好像罗马尼亚人民住在气候恶劣的地区是有罪似的。寒冷、早早降下的夜幕，还有从东边吹来的刺骨寒风。齐奥塞斯库一家龟缩在白色的“长春”宫里。齐奥塞斯库一家和这个家族的几个亲朋好友在一起生活。比如有博布，他老了许多，晃动着他那张肥胖的、皱折宛如一头老象皮肤的臉，埃列娜的母亲年近百岁，她那虚弱憔悴的黑影游荡着，总是追寻着她的女儿，好像埃列娜随时都会消失似的。过去，在霍亨索伦王朝老国王时代，宫廷脱离市井，宫廷与市井之间绝少来往。在普鲁士受过教育的老国王卡罗尔忍受不了特权贵族大家庭举行的狂乱舞会、维也纳乐队和茨冈人的音乐，就躲进他在锡纳亚的豪华夏宫里，在用收藏的兵器装饰起来的客厅里呆上整整几个小时不出来。齐奥塞斯库一家不知不觉地也过上了有些像国王退隐式的生活。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的宽敞的住宅里，与世隔绝，住在赫列斯特洛乌公园那边一座真正的“紫禁城”里。

摧毁古老的布加勒斯特

齐奥塞斯库不喜欢布加勒斯特。这座城市既不是一个现代化首都，也不是一块风景秀丽的宝地。他对这个充斥旧公寓、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现代建筑物的大杂烩很不以为然。他要改造首都，把布加勒斯特变成与未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相称的城市。摧毁古老的布加勒斯特和将该

地区治理得整齐划一，是他的重大抱负。1985年出版了旅游图，确定了新的政治—行政中心的位置。建设宏伟的共和国大厦的工程正在迅速地进展着。还要开辟一条社会主义林荫大道，宽120米，通往可容纳50万人的广场。在这条大道两旁要修建豪华大楼。有一天，齐奥塞斯库将在共和国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这条林荫大道然后穿过市区通往登博维察河，河那边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广场。1983年开始的这个计划是宏伟的。那么，可不能让别人用这样的闲话来纠缠齐奥塞斯库。传说被勒令在24小时之内搬家的居民有人自杀，吓呆的老头子们像阴森可怕的幽灵一样在他们被推土机推倒和铲车铲平的旧房子周围转来转去。齐奥塞斯库想彻底清除这些房子。不幸的是，自从1977年以来，受外国操纵的团体出来阻止和妨碍他的革新和净化政策，这已成了常事。现在他被迫让人偷偷拆除这些房子了。齐奥塞斯库想，真是岂有此理，人们应该是自家的主人。

在戈尔巴乔夫1987年5月访问的第二天，他让人一夜之间拆毁了圣星期五教堂。连一个叫勒内·于格、一个叫让·奥尔梅松的法国人士叫苦连天并且进行威胁，现在他都得忍耐。1988年2月，这些人土向他发出呼吁。国际文物古迹中心居然也想监督布加勒斯特的“家长制社会”。这座16世纪建造在一座小山上俯视首都的教堂使齐奥塞斯库大为不快。他已经成功地拆除了18座教堂，将4万草民驱出他们的那些妨碍交通的矮小破旧房屋。齐奥塞斯库自认有权做梦，有权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他怀疑那些指责他像法老一样狂妄自大的西方人，是不是存心迫使他只拥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巴尔干地区的不怎么迷人的首都。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他这些创造性计划。他可以忍受这些庞大工地的景象，推土机

铲地的震撼、飘落在布加勒斯特的可怕的灰尘。乌弗埃·博瓦尼曾经在他的故乡为自己建造一个堪与梵蒂冈教堂相媲美的大教堂。他认为，自己有权利做得同博瓦尼一样好，甚至更好。他讨厌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他感到四面受包围。苏联这个邻国忘了二十大的教训，非但控制不了自己的危机，还在罗马尼亚的调整问题上，对他喋喋不休。匈牙利人由于受到新法西斯分子的毒害，又恢复了他们的扩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野心。西方非常乐于支持欧洲的反动势力，利用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国际讲坛，用污辱性的语言揭露他。国内迷信的人们，宗教小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像中世纪教徒那样行动起来传播《圣经》。齐奥塞斯库已经厌烦了，不得不做出过火反应。防御不见效，他要有反攻了。他有几张王牌：他在东方阵营有几个可靠朋友，昂纳克和保加利亚的口夫科夫；中国人对他有好感；他有一个强大的党，埃列娜和他休戚与共，尼库对他忠贞不渝，还有将来在经济上的胜利，因为罗马尼亚正在偿还债务。而且，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有把握可以依靠爱戴他的人民，相信“罗马尼亚属性”的命运。面临匈牙利的侵略，他将渡过这场危机。他将取得胜利。不久以后，充满喜悦的人民将向着共和国大厦的阳台发出欢呼……最高统帅转入反攻了。

冬天又一次来临，伴随而来的是缺吃少穿和叫苦连天：物资匮乏、天气寒冷。17点以后，城市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布加勒斯特，人们常常摔倒在没有人行道的裂口里。空空如也的商店门前，排起了条条长龙，人们在那里等着运货来，人们为了在民兵冷漠的目光之下保住一个位子而相互殴打。寒风不停地袭击变红的眼睛，简直可以说，所

有的罗马尼亚人都在哭泣。到处都是寒气袭人，到处都是打扫图书馆、候车室、旅馆大厅的消毒剂滴滴涕的气味……

布 拉 索 夫 事 件

1988年11月，在巴黎、华沙、布达佩斯，示威者们呼吁庆祝一年前的布拉索夫事件周年纪念日。齐奥塞斯库气急败坏。别人不得插手“他的”工人阶级。布拉索夫怒潮无疑是食物分配不当和关于劳动组织的解释工作做得不够而造成的。现在局势已经正常。布拉索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财政部长被罢官，党的政治执行委员会为了更好地分析事件，把党的全国会议推迟了一周。齐奥塞斯库在审时度势。那么，布拉索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西方媒介竟说是一场革命？

事件是从“红旗”汽车制造厂开始的。几百名工人离开工厂到城里去游行，洗劫了党委所在地和干部专用食品库。他们高喊反对“一揽子协议”。这个协议建立在虚假的数字之上，又没有更新使工人做出所要求成绩的设备。即使计划实现不了，也要把工资和执行计划的情况挂钩。布拉索夫事件，就是在这个30多万人口的城市发生了一场很快被镇压下去的暴动。肯定有些人和蒂米什瓦拉的人串通一气，按齐奥塞斯库的说法，就是那些无所事事、高喊“布拉索夫万岁”，要面包、要肉的学生。严冬并没有使局势缓和下来。国家元首甚至听说农民在偷偷挖树根来烧火取暖。取暖、照明……难道他们不知道1985年就宣布发电厂处于紧急状态并由军队控制了吗？齐奥塞斯库还听说有一个民兵在布拉索

夫被示威者打死了，并且听到有些人喊“米沙^①，快来救我们”。

英明领袖从布拉索夫暴乱中得出好几个结论和推论。他的第一个即时反应，就是镇压和扼杀反对派知识分子的游行示威。他们煽风点火，并且获得外部的各种国际同盟和组织的支持。在西方人大吵大闹的时候，苏联新闻界保持了沉默，这是有功的。西方人将一个反对派、过去克卢日的教授多伊娜·科尔内亚看成受难者。她女儿在法国定居并结了婚。1987年11月，这个女人胆敢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的采访时攻击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她在11月19日被捕，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她的手稿和个人证件全部被没收了。

他的第二个反应是要结束对西方的依赖关系，这些关系严重影响了罗马尼亚内部的行动自由。1987年美国决定中止最惠国待遇条款。反罗马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在华盛顿忙碌起来了，这个院外活动集团得到由里根右派分子投资的“遗产基金会”的支持。这没有什么关系，布加勒斯特1988年2月宣布放弃最惠国条款，想以此避开意见听证会式的“控诉”活动，避开那些在美国国会所做的充斥着侵犯人权提法的演说。1987年12月28日齐奥塞斯库让人宣布：罗马尼亚1988年将不再需要外国的信贷。有人为暂时贫困而悲痛。这是对他们的一次重大胜利。罗马尼亚在经济上是不受约束的国家。

布拉索夫事件一年之后，1988年11月，虽然齐奥塞斯库没有息怒，但他还是可以感到欣慰。他没有退却，没有让步。司法机关进行审理，判处26名暴乱分子徒刑，约60人

^① 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米沙是米哈伊尔的简称。

下落不明。多伊娜·科尔内亚和她儿子、拉杜·非利佩斯库、费罗利安·卢苏和马丽亚娜·博泰兹因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而被捕。几周以后，在雅西有一位39岁的知识分子唐·彼得列斯库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齐奥塞斯库气还没消，还没软下来。1987年到1988年整整一年中，他把精力都用在罗马尼亚的人民革命总动员上了。不能允许人民受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愚弄。党的官员认为，他在1987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会议上的报告好极了。他又耐心地解释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作用，解释了一代新人树立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他论述说，因为“在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思想工作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更大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齐奥塞斯库一如既往，忠于职守。另外，他也为1988年春去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访问提高了罗马尼亚的威望而感到自豪。采访过他的记者们获悉，柬埔寨是他同越南最高领导人会谈的中心议题。关于齐奥塞斯库是否带去了他朋友西哈努克的口信这一点，他未做任何答复。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向胡志明的陵墓献了花圈，并肃立默哀。革命和战争之风，革命胜利之风使他得到片刻安慰。齐奥塞斯库喜形于色。《新河内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布加勒斯特，日新月异的城市》的文章，齐奥塞斯库想，他们对罗马尼亚首都的改造工程做了应有的介绍，对这项巨大工程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齐奥塞斯库访问归来时心满意足，但他一回到布加勒斯特，又要面对没有陪他出访的博布的抱怨，重新看他那张胖胖的愁眉不展的脸，听那些一直流传到小集团内部的悲观主义谣言。知识界的反对派旧病复发，匈牙利族人正在策划反罗马尼亚的运动，整齐划一的城市建设计划未被群众接受。

齐奥塞斯库在教育上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布拉索夫事件一年之后，应该把事情弄清楚了，社会主义非但不能放弃，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不能接受西方人根据人权哲学进行的指责，这不是他的哲学。不能因大胆消费而损害出口，不能因恢复借债而使争取经济独立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能对某些追求个人名利的知识分子有任何姑息。齐奥塞斯库不理解这些人，他认为他们碍手碍脚，认为他们是疯子和野心家。他想竭力摆脱他们。由于他们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保护，这就越来越棘手了。重要的是孤立他们，禁止他们同人民有任何联系，不让他们毒害人民。这些人是多伊娜·科尔内亚、唐·彼得列斯库，还有米尔恰·迪内斯库，不管他们是文学家、哲学家，还是诗人，这对领袖来说都没多大关系。他们被看作是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们不承担1965年提出的、1971年进一步肯定的、对群众进行宣传 and 思想教育的工作。

好人与坏人

让顽抗者不得安宁、孤立无援，进而垮台，这就是安全部工作人员的任务。切断多伊娜·科尔内亚同西方的联系，再也不能让西方人到家里去找她了。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同样，他也不理解西方人所说的人权。在他看来，这些反对派所维护的道德标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仅是语言上的伪善，这种伪善掩盖着对名利的追求。当多伊娜·科尔内亚这位退休的法语教授以下述言词反思：“我们这个社会完了，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自由、勇敢、爱的价值、信念和牺牲精神都受到践踏。但是

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谎言已经深深地进入个人意识。”齐奥塞斯库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只感到她出言不逊。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真理是简单易懂的。1989年4月30日，《火花报》在关于劳动权利的长篇文章中宣称：“劳动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劳动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每个公民都投身于祖国的发展与进步之中，人人受教育保证了人人具有创造力。劳动使男女平等。”这两种论调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不可能有相融之处。在“英明导师”看来，解决办法就是排斥和清除一些人，而使另一些人俯首归顺。1989年3月17日被法国《解放报》采访过的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不同意齐奥塞斯库所做的好人与坏人、健康分子和不良分子的划分。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在同《创世纪》争高低，要在罗马尼亚创造新人。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群众还都是对饥饿和寒冷敏感的旧人，他们适应不了齐奥塞斯库实验室的苦修和严寒，但这却是成为“齐奥塞斯库”新人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新人是由意识形态养肥，由华丽词藻熏陶出来的。只有领导人恢复了已经失去的、对现实的判断力，抛弃党的神秘主义，才会使自认为是古老欧洲公民的所谓老一代人焕发精神”。

1989年春天，齐奥塞斯库发出了庄严的声音。4月29日，《火花报》言过其实地加了这样的标题：“党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彻底的科学性”。报纸又说：“在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情况下还清外债。”这个集团的积极支持者、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尼亚·曼内斯库在头版用了两栏赞扬齐奥塞斯库时代。说尼古拉和埃列娜的革命活动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如果没有反革命分子，齐奥塞斯库的革命就会一帆风顺。1988年春以来，即齐奥塞斯库

为激励可以起动员作用的力量和重新告诉他的人民什么是正义和平等而实行农村标准化的时候，出现了反对派的大联合。他必须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在内部，要和纳入标准化计划而又拒绝执行这个计划的某些地方的消极对抗作斗争。在外部，要同支持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并煽动西方一起支持罗马尼亚匈族的匈牙利舆论进行斗争。然而，自1974年以来，策略并没有改变：在齐奥塞斯库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今天席卷全国的反抗活动是受人操纵的。

标准化方案涉及到全面改造罗马尼亚人的居住条件，这个方案从1990年至2000年分三个阶段实施。在齐奥塞斯库看来，这是最基本的。齐奥塞斯库又回到了恩格斯的论断，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历史表现。齐奥塞斯库认为现在应该超越这个阶段，朝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新社会里，不应再有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文化的差别。为了达到这个清一色的和谐，只有一个办法：把乡村改造成农工城市中心。具体地说就是摧毁和重建。摧毁过去的见证物旧的中心，建设起清一色的低租金住宅。齐奥塞斯库想这样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屈服于共同价值标准体系，即共产主义和民族价值观的清一色群众。齐奥塞斯库用这个标准化伤害了农村的感情。他不怕。他以前不曾是集体化的领导者吗？集体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他又准备付出代价了。然而，标准化，齐奥塞斯库进行的标准化却在很想保留自己特点的少数民族那里碰了钉子，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近200万人。

同匈牙利的思想战

标准化的赌注关系到共产主义、民族观和东欧集团的未来，因为这预示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个兄弟党之间开展一场思想、外交战。这个悲剧从1988年就开始了，1989年达到了顶点。齐奥塞斯库并不想竭力避免这场悲剧。他毫不妥协，他要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他会完成这项使命。他想到有可能失败吗？肯定没有想到。他进行斗争就是为了胜利。他确实认为，1956年危机中的某些事件又在重演。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曾谴责匈牙利修正主义是新法西斯。20多年之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又向布达佩斯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他想在他那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匈牙利那个变质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划一条界线。

到1988年5月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下台为止，齐奥塞斯库一直没去冒险。几年来，在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某些人士的鼓动下，匈牙利舆论公开指责他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对此不屑一顾。在齐奥塞斯库看来，公众舆论是可以左右的。然而，不久之后，在这个要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时推进民主化进程的舆论压力下，布达佩斯政治当局要求齐奥塞斯库也顺应潮流。于是局势迅速紧张起来。政治局委员伊姆尔·波兹盖于1988年6月21日在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匈牙利城市久洛把标准化计划说成是一场恶梦。几天以后，6月27日，在布达佩斯发生了一次约有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反对布加勒斯特政权。人群中喊出了“齐奥塞斯库—希特勒”一类的口号。这一步最终迈过去

了。齐奥塞斯库甘冒使自己受到欧洲共同体和西方世界鄙视的风险。20年的外交心血，向西方开放的工作在1988年至1989年两年的转折期间丧失殆尽。在齐奥塞斯库看来，危机达到了不能缓和的程度。他投入了战斗。他要站在全世界受苦受难者一边进行战斗。

这一抉择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它导致了1989年2月、3月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设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会议对布加勒斯特的谴责。在日内瓦，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引起公愤。齐奥塞斯库反而聊以自慰。不能妥协，他掌握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真理。他在日内瓦的代表多尔古发言宣称：“再一次表明，有人明目张胆地粗暴地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对别国施加压力，强迫别国干这干那……他们顽固地用完全错误的、主观的观点提出罗马尼亚的民族问题，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所有的民族都有保持他们文化特性的法律保证和相应手段，他们可以充分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还用齐奥塞斯库的分析解释标准化。他说，“在我国实行的单一化是社会的单一化，而不是某些诽谤者们所说的民族单一化。把村庄集中起来，目的是把居民稳定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阻止他们流向城市。”他甚至更进一步，质问在场的人说：“在西方，是否为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做了这么多工作！”他说过头了，人们觉得在这些话里充满被惹恼的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极大怨恨。“在塞纳河畔，在布列塔尼，在科西嘉，在巴斯克地区，在新喀里多尼亚或在法国其他海外属地，都找不到我们这样的范例，在英国的城市和北爱尔兰也没有。”最后，他干脆对法国代表进行辱骂，重提1985年7月法国在奥克兰的暴行，生态组织“绿色和平”的一艘船“彩虹勇士”号在那里被法国情报部门炸沉。齐奥塞斯

库通过多尔古的讲话进行了报复。事实上，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2月6日已经要求人权委员会把“不幸的罗马尼亚人民的”处境看成是自己的处境。一位政府首脑在人权委员会发表意见，这还是第一次。一位政府首脑点名指控联合国的成员国，这也是第一次。

有关思想意识和政治的争吵在继续。齐奥塞斯库的性格就是不肯后退。1989年3月9日通过表决，罗马尼亚由于“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而受到谴责。对此，他是感到局促不安，还是稍感宽慰呢？统计一下朋友，反对谴责罗马尼亚的有7票，其中有古巴和埃塞俄比亚。背叛者投票赞成提案，其中当然少不了匈牙利。还有弃权或不参加投票的虚伪国家，其中有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匈牙利代表霍恩明确指出，布达佩斯和莫斯科未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任何政治磋商。

指控在继续升级，布加勒斯特予以强烈反击。持不同政见者多伊娜·科尔内亚是有精神色彩的慈善人道主义的象征，总之，是齐奥塞斯库所畏惧的一切象征。她重新受到安全部门的威胁和粗暴对待。西方舆论对这位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表示愤慨。她在克卢日的自己家门口受到一个值勤警察的拳打脚踢。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谈判在巴黎继续进行。夏天将是炎热的，布加勒斯特好像是社会主义班级里的坏学生。罗马尼亚代表虽然受到交叉火力的进攻，但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离开会场。齐奥塞斯库象征性地笨拙而又带有挑衅性地开始在罗匈边界上拉起铁丝网。法国新闻界群起而攻之。1989年6月24日，《费加罗报》写道：“在匈牙利继续拆除它与奥地利和西欧之间的铁丝网的时候，罗马尼亚却在罗匈边界上建成了铁幕。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邻国之

间前所未有的现象。”

铁 人

在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比以往更加以铁人自居。他不停地工作，不再顾及他的身体状况了。他工作，隆重庆祝6月23日少年先锋队日。他用生硬的声调说：“亲爱的朋友们，最亲爱的朋友们，劳动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进步、发展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学习，学习，只有在工作的各个方面学习所有新东西，我们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优秀建设者，你们才能有良好的条件下为祖国和党的政策服务。”根据《火花报》的报导，少先队员们对埃列娜和尼古拉表示感谢。他们向新型国家的开拓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致以热情的敬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们能在具有不愧是人类知识最高成就的现代化学校里受教育，这都应该归功于齐奥塞斯库夫妇。260万11岁到14岁的少年儿童就这样向他们夫妇表示敬意。这些孩子无愧于人，他们年复一年地增加着对爱国主义劳动的热爱。

7 齐奥塞斯库喜欢有数字的总结。这些少先队员们在1988年回收了6.8万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3.01万吨废纸、3.7万个瓶子……齐奥塞斯库心里感到失望还是信心百倍？他手里摇晃着统计表，一点都没显露有什么怀疑，而埃列娜则嘴上带着微笑，梳着漂亮的发髻，从一个9岁的少先队员手里接过花束，这孩子激动得脸都红了。口号使孩子们兴奋：“大家齐向前”、“我们是英雄人民的子孙”、“祖国罗马尼

亚是英雄们的土地”、“我们为祖国、党和人民争光”。有人告诉齐奥塞斯库，说他在让这些可怜的孩子服苦役，但这是徒劳的。他反驳说，300个夏令营可以接待6.5万少先队员，有150万儿童参加旅行游览活动。齐奥塞斯库只在数量上做文章。

1989年7月14日，工会全国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为了使广泛的民主讨论顺利进行，博布负责安排发言。齐奥塞斯库在讲话的时候受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我们工人革命的民主更加强大有力了，我们应该更坚决地反对那些践踏我们社会主义秩序和法律的人。”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受到热烈欢呼的同一天，《火花报》谴责了美国粗暴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内政。在华沙和布达佩斯进行访问的布什正在就援助波兰和匈牙利一事进行讨价还价。齐奥塞斯库洋洋得意，他无求于人。他接待美国总统，如尼克松，那是因为美国总统有求于他。8月初，齐奥塞斯库继续奋斗。尽管天气炎热，他还是视察了一些农业单位和特列奥尔曼县的水利枢纽工程，目的是检查一下政治动员。《火花报》8月4日发表了他给阿拉法特的生日贺电。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在庆祝60大寿。他没有忘记朋友。此后一段日子报纸天天发表文章，准备庆祝8月23日解放日，主题是“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的45年”。

最后一个夏天……

1989年夏天齐奥塞斯库忙个不停。他把这个夏天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一个最早的夏天。他的最后一个夏天突出的是胜利，是以进为退。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定于11月召开。齐奥塞斯库想，在罗马尼亚周围，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无耻叛徒们在乞求西方的援

助。欧共体国家在布鲁塞尔进行关于向波兰提供贷款问题的谈判。在南斯拉夫，对少数民族间冲突的镇压造成了流血事件，春天和夏天，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起来造反，有人死伤。在邻国苏联，戈尔巴乔夫再也控制不住沸腾的人民了。而他齐奥塞斯库却在准备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

谴 责

尽管齐奥塞斯库在国内取得了他认为是显著的成就，尽管他感到他成了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典范，并因而兴奋不已，但他并不坦然。这年春天他就知道，反对派正在密谋策划。这个反对派当然是由一些老家伙领导的，但这些老家伙活动能量相当大。他又控制了形势。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日夜受到监视，但是埃列娜一看到这些反对派的某些名字就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也传染给了他。一些幽灵在困扰着他：曼内斯库的幽灵，埃列娜讨厌这个人的老婆。布鲁坎的幽灵，他一边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对政治感到厌倦的可怜的退休者，一边还在暗中策划，并到美国去了一趟，因为他在那里有亲属，他在美国散布有关齐奥塞斯库的谣言。阿波斯托尔，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但他还不甘心无声地死去。1989年3月，有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极大地伤害了齐奥塞斯库，自那时以来，他成功地控制了局势。然而，作为党的老手，他知道，在幕后一些胆大妄为者，什么事都会干出来。他反复思量，越想越感到不安。他把事实重新想了一遍，又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3月10日，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收到了罗马尼亚共产

党六位老头面人物签署的材料。这对他不只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份材料的形式是给他的一封信。这份东西竟转给了外国新闻媒介。怎么搞的？材料的内容和签名者的知名度使他不寒而栗。材料系统地揭露当局的弊端。实际上不是全面抨击“英明领袖”的暴戾，而是全面抨击他的政治哲学。齐奥塞斯库气愤过后，也不能不注意到这封信的写作技巧。作者们开始说由于孤立于欧洲之外而感到遗憾。他们这样做真是万无一失，因为所有反罗马尼亚的新闻运动都强调说这个国家几乎像孤岛一样孤立。接着就逐条地据理进行批判：不遵守赫尔辛基协议；在农村推行标准化；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公民中心；无所不在的保安人员的职责；对书信及电话的检查；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灾难性的农业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强制同化政策……这些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人们最后为罗马尼亚在国际上的处境还流了几滴鳄鱼眼泪。最后，他们得出了带有威胁性和谴责性的结论：“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个欧洲国家。作为欧洲国家，应该根据赫尔辛基会议确定的框架发展。你开始改变国家的地貌，但是你永远也不能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

这些叛徒们竟敢指控他这个给人鼓革命干劲的人使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他气得浑身发抖，特别是他完全了解签字的这些人：阿波斯托尔、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希尔维乌·布鲁坎、亚历山德鲁·勃尔勒迪亚努、康斯坦丁·波伏列斯库和格里戈列·扬·勒恰努。虽说西方记者能立即确定曼内斯库、布鲁坎或阿波斯托尔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要找到另外3个人的踪迹就得求助于专家了。齐奥塞斯库在追忆。勒恰努1958年被清洗，他是一位地下党时期的活动分子，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收养的儿子米尔恰在莫斯科受过教

育，然后在布加勒斯特的外交部干得很出色。他曾在华盛顿和加拿大任职。齐奥塞斯库为给他父亲施加压力下令把他逮捕。还有出生在比萨拉比亚、在莫斯科度过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亚历山德鲁·勃尔勒迪亚努。他是乔治乌·德治开始实行向西方开放政策时的出类拔萃的活动分子，但在齐奥塞斯库眼里，他变坏了。1965年以后，他开始支持下放经济权的主张。1969年，齐奥塞斯库终于把他革职了。勃尔勒迪亚努被迫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还有属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康斯坦丁·彼伏列斯库，他是一位真正信仰革命并投身于革命事业的人，他1918年和赤卫军一起参加过奥德萨战斗。他在苏联受过训练，在两次大战期间曾旅居苏联多年，同时秘密回过几次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1957年罢了他的官。齐奥塞斯库给他恢复了名誉，但是彼伏列斯库从来不为此而感激他。就是这些人今天全盘否定他的工作。把他们消灭吗？不可能。他们狡猾地给西方发了信，使自己得到了保护。西方保护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989年3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停止骚扰这些人士。西方人急忙声援老一代共产党人，齐奥塞斯库大怒之后不是向他们报以蔑视的微笑吗？尽管密特朗这么做，但是对这些抗议者的控制还是越来越紧了，这些抗议者又沉默下来了。

齐奥塞斯库的一代

假期过后重新开始工作，形势好了一些。秋天使罗马尼亚首都的空气凉爽了。齐奥塞斯库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上来了。他要把这次大会开成成功的大

会，胜利的大会，使之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新的决定性阶段。他是热衷于活动主义^①的思想家。他认为党是人民的化身，在党之外他什么都视而不见。然而，秋天又预示着一个不安的冬天，即饥寒交迫的威胁。齐奥塞斯库并不知道，在11月潮湿寒冷的布加勒斯特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学生们疲惫不堪的面孔上流露出厌倦和冷漠的情绪。尼古拉和埃列娜受到党的干部和令人生厌的小集团的吹捧，而“齐奥塞斯库的一代”却对齐奥塞斯库为他们演的好戏很不以为然。这一代人再也听不进50年代的光荣历史，当时大型拖拉机和工厂机器的轰鸣代替了英雄主义的说教。这一代人再也听不进60年代的光荣历史了，当时激动的小个子动员他们的父母去保卫罗马尼亚边界。他们想不慌不忙地越过边界，背着旅行袋或搭便车在欧洲穿梭，在布拉格、柏林和布达佩斯，他们的同龄人正在震撼全欧洲。如果齐奥塞斯库要求他们鼓掌，他们就鼓掌。他们可以排成队，但是他们的心却跑到别处去了。罗马尼亚青年听说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有人游行示威。他们借助“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罗马尼亚青年已经厌烦了人们反复向他们讲述光荣的历史，他们甚至也不屑于去争论。因为他们是局外人。然而，齐奥塞斯库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些青年身上。他们是他黄金时代的产物。齐奥塞斯库使他们有了文化，给他们提供由他作序的书籍和经过认真挑选的教师。把可疑分子、不怎么安分的人安排在研究中心，不让他们进行教学。这些年轻的罗马尼亚人必须根据计划的指令创造国家的伟大历史。

^① 活动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它注重实际活动甚于理论原则。——译者

齐奥塞斯库听到一个持续不断的小小谣传，说如果他不在，一个叫伊利埃斯库的人可能出来收拾局面。这个谣言传得很广，连法国罗马尼亚研究会都知道了。齐奥塞斯库极不情愿地看到从东面吹来的风席卷他周围的国家。昂纳克倒了，他的邻居、年老的日夫科夫也被赶出政府。齐奥塞斯库的眼光超越欧洲这个地方而投向古巴、投向北京。他的眼光和他的人民不一致了。为了那些一直追随他的日益衰老的权贵们，他仍顽固地颂扬罗马尼亚革命。而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坚定的信念，有的是担心发生变化，担心人家迫使他们退休，去过一种平凡的生活，他们热衷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豪华和排场。

11月24日，法新社电脑终端屏幕上显示出了该社在布加勒斯特的特派记者让·夏莱的署名文章：“拥挤在布加勒斯特王宫广场上的10万多人向领袖齐声欢呼。齐奥塞斯库第六次被一致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他在闭幕式上讲话时受到30多次欢呼，“齐奥塞斯库——共产主义”、“齐奥塞斯库——英雄主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东欧最后一个斯大林国家的强有力的人物在他夫人埃列娜和新政治局委员们的簇拥下走出大会会场。这是一次与50年代共产党大弥撒相称的会议。面对采访这次活动的众多外国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维持秩序的警察们表现得异常紧张。某些摄像和摄影记者甚至遭到责骂。

在外面，混杂的人群在刺骨严寒中等了几个小时后，按职业团体排成行，青年们站在官员们经过的地方。

人们摇晃着赞扬总书记业绩的巨大标语牌、挥动着小幅罗马尼亚三色国旗或红色共产党党旗，拼命地喊着口号。齐奥塞斯库经过的地方人们都喊着同样的口号。

领袖头戴黑色礼帽，身着深色大衣，和他夫人一起往前走，向各个团体的青、少年们露出微笑，拥抱其中一些人，从另一些人手中接过花束。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甚至和民间舞蹈团一起翩翩起舞，然后才到国务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长篇演说。他再一次重申，“在幸福与福利的道路上”，他为罗马尼亚设计的惟一道路就是“在他国内实行的那种共产主义”。

在阳台上，他妻子埃列娜和通常一样站在他身边。阳台上有一条巨大的红底白字的横幅写着：“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未来。”

齐奥塞斯库刚刚冒了一次重大风险。他的讲稿长达 140 多页，连续念了 7 小时。20 多年来他都忠于边界不可侵犯原则，而这次讲话中竟然对它进行了触动。他攻击德苏结盟，攻击莫斯科 1940 年实行的、1944 年和 1947 年确认的领土兼并。“英明领袖”下了大赌注。在自己的人民面前自封为民族英雄。塔斯社斩钉截铁地反驳说，苏联和罗马尼亚边界是不容置疑的。又想起 1968 年了吗？齐奥塞斯库是否又想起 1968 年 8 月 21 日和 22 日这胜利的两天？代表大会一结束，他就去打猎了，这次打猎会非常成功吗？

结 束 语

一个世纪的悲剧

1989年12月25日，自由罗马尼亚电台宣布“伪基督死了”，并告诉人们已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妻子处决了。

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快：12月16日和17日蒂米什瓦拉发生暴动；21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被人喝倒彩；22日他乘直升机逃跑，但几小时以后就被抓获；25日就因侵吞公共财产、在国家核心部门安插亲信而被判决处死。

在布加勒斯特，革命持续三天：从12月24日起，革命宣布胜利。新政权对有关事实的说法是清楚的。自由新闻的喉舌《世界周刊》在1989年12月底出版的第一期中叙述说，“我们的革命有一种独特性。这场革命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它表达了多年来积累的不满情绪。把它看成是受外部势力支持的有组织势力采取的行动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还是根据《世界周刊》的正式说法，被推翻的政权也可以简述如下：这是由一个集团支持、由一些恐怖团伙保卫的、庞大的国家机器。

因此，在四天之内，45年的共产党政权、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有4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直属内务部指挥、有8万多人的安全部队就土崩瓦解了。

革命的参加者，青年学生、爱国军队被看作英雄。人们忘记了，这支军队曾经向人民开枪。新政权12月23日宣布，整个过程有5000人死亡。这一点人民也忘记了。至于如此迅速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这可能是由于害怕有人攻打

关押他们的兵营。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说法，而且有些自相矛盾。如果说连名字都已经在新政权的词汇中消失了的安全部队只剩下几个恐怖分子，那么危险又何在呢？

1990年1月上台的人们对民主作出了新解释，说这是一种有待创造的、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民主，一种被称为“先锋队”的民主。人们似乎忘记了，“先锋队”就是齐奥塞斯库曾经用来形容自己政治纲领特点的用语。这里可以看出明显的政治连续性，人们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但愿在这令人怀疑的时刻，民主化的活力能给这种“先锋主义”以真正的意义。

还是根据同一刊物，即《世界周刊》的说法，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是很好的。这个政策是马济鲁和布鲁坎制定的。齐奥塞斯库窃取了这项政策。只要把欺世盗名的人除掉，就可以恢复这项政策的本来面目了。

为了实地了解罗马尼亚革命，新闻界、政治界和知识界，总之，整个巴黎都动起来了。开往布加勒斯特去的班机暴满，旅行社建议采取“周末加班”的办法。

这些突然云集在布加勒斯特的来访者在寻求什么呢？他们在寻求感情冲动和某些宽慰。因为是救济和我们如此相似的欧洲人，所以这种救济似乎更加合乎情理了，更令人感到宽慰了。罗马尼亚儿童是贫穷和不幸的，但是他们不像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那里没人要的孩子那样，也不像累西腓和巴伊亚^①村镇居民那样肚子鼓胀，而又瘦骨嶙峋。罗马尼亚发展迟缓或贫苦尚在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许多匆忙去罗马尼亚的人都是赶去看热闹。诉讼牵涉到

① 累西腓和巴伊亚系巴西的两个州。——译者

与齐奥塞斯库亲近的人，他们今天是可怜的老头子，昨天却是肆无忌惮的小集团成员。对这些人的起诉是一场真正的悲喜剧。第一个被告放声大哭，第二个被告自我谴责，第三个被告认罪后表示愿意去死。他们肆虐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没有别的，只有怯懦了。至于齐奥塞斯库一家，齐奥塞斯库的孩子们，据说他们的表现还像是自命不凡的继承者。他们的女儿卓娅要吸美国香烟；儿子尼库自封为俘虏的首领，俘虏们也还真听他的话；养子瓦连丁只是感到懊悔。

齐奥塞斯库的尸体在我们中间腐烂。被形容为“七头隼”的那个人物现在和过去一样使人震惊。1968年他使自己受到欢呼，并且持续10多年之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使我们沉浸在德拉古拉的神怪故事里或沉浸在《喀尔巴阡山的尼禄》^①这类古老故事里，甚至使我们陷入这样的幻觉，他的野蛮程度和博卡萨（的确，中非皇帝的一个妻子不就是罗马尼亚的女间谍吗？）不相上下。

我们西方观众对这场戏并没有表示不满。我们在头号新闻里看到了死人。看到了真正的死人，我们曾经哭泣。我们也听到过谣传，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不需要这些谣传就可以使我们相信齐奥塞斯库独裁在人的思想上造成的恐怖了。由于有这些虚假数字，我们觉得受人愚弄了。我们现在想尽量分辨真伪，但是，我们忘了基本问题：从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人民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抱负、为什么又失望呢？1968年曾经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20年后又给他喝倒彩的人们，我们了解他们些什么呢？

① 尼禄，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译者

齐奥塞斯库的一生载入 20 世纪暴力的历史，这是一部流血和恐怖的历史。60 年代的特征是缓和，80 年代既有无可辩驳的西方现代特色，又存在着有破坏性的古老民族主义。同 20 世纪一样，齐奥塞斯库的一生具有悲剧的特点。

流血太多了，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对顺从的群众进行的欺骗太多了，这些群众希望听到暴君受到惩罚的美好故事。这完全是使人不去琢磨奴役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小故事。

1990 年 1 月于巴黎。